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1
第1期

2021年3月 第1期(总第89期) 第23卷
Mar.2021 No.1 Sum.89 Vol.2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一年三月第一期(总第八十九期)第二十三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1年春季开学典礼

3月15日上午，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1年春季开学典礼。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徐彬，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智出席并讲话，台盟云南省委主委杨晓红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省级有关统战团体致辞。各民主党派省委、省民宗委、省工商联、省台联、省侨联、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中华职教社领导，省社院领导班子成员出席开学典礼。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蔡勇主持开学典礼。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专题研讨班（第1期）、2021年全省宗教界代表人士践行“四条标准”研讨班全体学员，省委统战部机关各处（室）、直属机关党委、各事业单位处级领导干部，省社会主义学院全体干部教师共200余人参加开学典礼。

徐彬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和省两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好全国和省两会精神，是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学院今年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国和省两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云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坚持“社院姓社”的正确办学方向，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全力以赴做好今年的教育培训工作。

徐彬要求，一是要把握大局大势，凝聚发展共识。要教育引导统一战线各方面的代表人士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国家发展的大局大势，主动融入我省“十四五”发展大局，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形成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二是要适应时代要求，提高工作本领。在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士履职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要不断加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培训，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三是要聚焦目标任务，强化担当作为。



进入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肩负的使命任务越来越艰巨，这就要静下心来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多思克难奋进之策，多谋提质增效之计，切实增强敢为人先的精气神、披荆斩棘的攻坚力、善作善成的真本领，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为云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省社会主义学院要在省委统战部的指导和管理下，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关心支持下，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精神，努力在我省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中形成核心竞争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培养统战人才的新路子，力争

实现到2025年建设成为全国省级一流社院的目标。

刘智指出，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先后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和社院工作提供了方向引领和制度保障。不久前，中共云南省委印发了《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为我省全面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和社院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刘智要求，一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成员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发展改革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这些都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二是要全面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水平。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升科研工作水平，打造统战理论研究主力军；办好中华文化学院，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广泛开展联谊交友，共同画好最大同心圆。三是要从严从实加强社会主义学院自身建设，坚持严以治院、严以治教、严以治学。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努力开创新时代全省社院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供稿：肖莉莉 责编：罗雷）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1年第1期(总第89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郭进华

编 务:朱家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阶层变迁 张艳秋, 刘江东 (5)

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研究 李晶燕, 邓青州, 胡 昭 (13)

● 协商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中的人民政协特质优势探析
..... 王 艳 (20)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研究 罗金洪 (27)

● 民族研究

彭桂萼与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论 杨宝康 (32)

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构研究
——以临沧佤族为例 杨逸平 (41)

民族地区乡规民约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作用研究 孙 敏 (50)

● 历史与文化

清代云南人与台湾治理及台湾诗文书写 陈友康 (63)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4*2021-3]

近三十年许德珩先生相关研究述评与展望 胡 辉, 宋宁刚 (78)

从传统到多元: 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 徐 敏 (85)

●云南故事

红军长征过滇西北贺龙的统战工作实践及启示 陈金星 (92)

牢记初心使命 传承善洲精神 张倩倩 (99)

●发展问题研究

以四种思维方式把握中国当前发展机遇优势论析 艾丛潞, 廖小明 (106)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论析 钟启超 (116)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1, 2021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Front

- Changes of China's Social Strata in the View of Grand History Zhang Yanqiu, Liu Jiangdong(5)
The United Front's Service to the "Three Targets" of Yunnan
..... Li Jingyan, Deng Qingzhou, Hu Zhao(13)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 A Study of the CPPCC'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Address on Reinforcing and Reforming the CPPCC's Work Wang Yan(20)
A Study of the Conjunctive Operation of the CPPCC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 Luo Jinhong(27)

Ethnic Studies

- Peng Gui'e and His Studies on Yunnan's Ethnic Minorities in Remote Areas Yang Baokang(32)
Rebuilding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Wa People's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Was in Lincang County
as an Example Yang Yiping(41)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olk Laws and Local Regulations in Ethnic Minorities' Residential Areas to All
Peoples' Solidarity and Progress Sun Min(50)

History and Cultures

- Yunna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Writing of Taiwanese
Essays Chen Youkang(63)
A Review on Researches on Mr. Xu Deheng over the Late Thirty Years and Some Expectations
..... Hu Hui, Song Ninggang(78)
From Traditional Ways to Diversities: Development of Researches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 Xu Min(85)

Tales of Yunnan

- He Long's Efforts for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d Army's Passing through Northwest
Yunna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Chen Jinxing(92)
Bearing in Mind the Initial Longings and Carrying forward Yang Shanzhou's Spirit
..... Zhang Qianqian(99)

Development Issues

- Making Use of Curren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Four Types of Thinking
..... Ai Conglu, Liao Xiaoming(106)
A Discussion over Library Documentary Construction Zhong Qichao(116)

统战理论与实践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阶层变迁

张艳秋¹, 刘江东²

(1. 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延边 133002;

2.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社院工作部, 内蒙古 乌海 016000)

摘要: 社会分层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 至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内学界的研究逐渐从“阶级”分析转向“阶层”分析,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碎片化倾向。因此, 从大历史角度梳理我国社会阶层演变的历史脉络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我国阶层体系的差异及其前后迭代更替, 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阶层结构的“源”、“流”、“变”, 为进一步开展社会分层研究提供历史依据。当前我国社会阶层体系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开始萌发并形成于民国时期的阶层结构的延续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是影响我国阶层结构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而且将会在未来发挥关键作用。这启示我们, 阶层研究要将各阶层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纳入到大历史的分析视野中, 进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阶层结构乃至预测未来的阶层结构。

关键词: 大历史; 阶层结构; 阶层变迁; 执政党

中图分类号: D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1-0025-08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一) 近代化以前: 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

自公元前221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建立, 到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为止, 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基本呈金字塔状: 皇帝居于顶端, 行使皇权的主体——官僚阶级居其下, 再之下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士大夫(知识分子)阶级以及士大夫背后的家族——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居于最底层。其中官僚、士大夫和地主阶级占人口的极少数, 构成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 同时“官僚—士大夫—地主”这一整体结构在内部互相渗透、不断循环, 对外部形成社会排斥,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同理, 在社会分层体系的刚性与地位凝固化^①程度都极高的封建社会中, 农民阶级也是具有自我继承性的阶级。

作者简介: 张艳秋, 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 刘江东, 中共乌海市委党校社院工作部助教、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转型。

^① 分层体系的刚性(rigidity)指的是社会成员地位(随着时间变化)的连续性, 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封闭性”(social closure); 分层体系的地位凝固化(social crystallization)程度是指决定分层体系的各项资产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越强, 则处于顶端的人总是处于顶端, 处于底端的人总是处于底端。详见[美]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第二版), 王俊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年, 第4—5页。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向近代演化的过程中,上述阶级结构由于先后受到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外部强力而被一步步突破。例如,在明朝后期,我国东部某些省份的纺织业中逐渐出现了家庭手工工场,部分农民已经开始进行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即“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雏形”^①。而到了清朝中叶,我国江南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雇佣劳动为标志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框架下产生并不断发展。随后也逐渐产生了短途或长途贩运的商人,例如晋商、徽商以及潮商,三大商帮曾经盛极一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具有现代意义的信贷机构——“票号”也发展起来。例如,山西票号在清末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开埠后的对外经济与金融贸易中,扮演了连接内陆与沿海通商口岸的关键作用。^②简言之,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由于内部张力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这为新的社会阶级产生准备了条件。

(二) 近代化以后: 初具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雏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具有中介性质的买办阶级产生,他们是外国政府或商人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代理人或合作者,一般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后来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展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自救运动。随着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一批由封建官僚主办、具有大工业特征的重工业企业相继建立,例如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也催生了一批官僚资产阶级。再后来,民间的具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也开始投资建厂,并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他们便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张謇、荣氏兄弟等。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官僚—士大夫—地主”的统治阶级结构。部分旧式官僚完成身份上的转换,从清朝廷走向民国政府。而知识分子则发生严重分化,各自寻求救国的学说,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展开思想交锋。地主阶级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地主则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民国时期,孙中山本人提倡实业救国,推动政府大量修建基础设施,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开办工厂。也正是在各式私人工厂以及外资工厂中,工人阶级发展了起来。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大城市中也广泛存在各式小商贩,可以视为个体经营户和个体劳动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进入垄断阶段,发展为垄断资产阶级,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

1925年12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也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分析。他区分出了包括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在内的5个阶级。^③例如,他将民族资产阶级归为中产阶级,将手工业者、部分知识阶层归为小资产阶级,将几种产业工人、游民无产者归为无产阶级,等等。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至少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地主、知识分子、个体经营户、工人、农民以及无业者等阶级。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进行了重新组合。

^①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第491—492页。

^② 池植:《海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王路曼〈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述评》,《史林》2020年第5期,第214页。

^③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向“单一”阶级结构转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也标志着我国百年来所面临的全面危机结束。此后，国家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从农村包围城市，因此农村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在农村的残余，地主阶级被消灭或改造，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在1956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就呈现出单一的阶级结构，即农民占据绝对主导。在城市，对官僚资本采取了革命与没收的方式，直接转变为公有资产。而对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赎买的方式进行，先将私人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并且采取“四马分肥”^①的方式降低资本家所获利润的比例。1956年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又采取定息的方法，即在一定年限内给予资本家固定比例的股息。最终取消定息之后，私人企业就完全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这样，工人的劳动不再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也需要参与到劳动改造中去。除此以外，城市的房产、土地也都通过类似方式相继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进行划拨。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也基本完成阶级改造的任务。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身份制基础上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已经被消灭，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知识界也成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的队伍。^②即曾经在城市和农村的剥削阶级都被相应地改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经过思想改造，也成为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自此，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巨变，由1949年以前的多阶级并存转变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③的结构。此后，毛泽东提出“单位办社会”的倡议，将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整合到一个个单位当中，并且由单位分配个人所需要的一切资源^④；在农村则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由公社组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如此一来，所有人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个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外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这种通过政治整合起来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平均化的特征，不平等程度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的调查，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以前只有0.16，如此之低以至于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从未出现过。^⑤

然而，尽管在这一时期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均质化的社会阶级结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

^① 指企业利润按照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本家的股息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详见史春林：《关于“四马分肥”三个主要问题的订正》，《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8期，第117—122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刘少奇作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452/4526551.html>，2020年12月10日。

^③ 两个阶级分别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指“知识分子阶层”。尽管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从人口比例来看，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详见陆学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说法的剖析》，《求实》2003年第11期，第4—6页。

^④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6—317页。

^⑤ 李强：《中国在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的四个试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第3页。

来逐渐形成的身份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均质化的社会结构。李强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企业被收归国有、地主不再占有土地,人们的收入趋于平均化,此后中国的社会分层实际上是政治分层^①,即政治身份对个人阶层地位产生决定性影响。孙立平也曾指出,在改革前的中国存在“四大身份系统”^②,即政治身份、城乡身份、干部与工人的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系统,不同身份在资源获取、职业机会、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其间的鸿沟往往难以逾越,它们共同构成了当时我国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简言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社会总体维持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均质化结构。尽管城乡之间存在鸿沟,干部与工人之间存在差距,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存在差别,但是总体来看,私有制被消灭,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在私人财产层面不存在大范围的实质性差别,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打破了这一局面。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一) 80年代:资源扩散与阶层碎片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的形式占据绝对主导,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国家垄断,由政府统一进行调配。人们的生存资源主要来自城市中的单位或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然而不论是单位还是公社,在本质上都是国家的“派出机构”,将人们限定在国家的框架内。因此,作为同样能够配置社会资源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以前并不存在,更不用说蕴藏在社会之中的“市场”机制。而在启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从社会领域撤退,产生了资源向社会扩散的效应。这一部分资源构成“自由流动资源”,并因此产生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③在资源向下扩散的过程中,社会边缘群体率先抓住机会,其中的“幸运儿”成为改革中率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随着资源持续向下扩散,社会阶层结构也在发生剧烈变化。在城市,1985年改革开始以后,单位制逐渐解体,很多人开始走向劳动力市场自由求职。另外,曾经的资本家、个体经营人员等凭借尚未丧失的社会记忆,充分利用起了自由流动资源并迅速致富,逐渐恢复从前的阶层地位。^④知识分子本身也在发生分化。由于改革开放对技术知识的需求远远大于文化知识的需求,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因此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地位迅速上升。但是其他大部分无法将知识直接投入到市场中获得收益,而只能通过国家再分配获得收入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了改革中受损的阶层,因而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脑体倒挂”的现象^⑤。所以,城市中已经不再只有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也逐渐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私企老板、个体户、中介人员、私企员工等群体。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的取消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拥有较少土地的农户则开始经营副业,例如开经销店、承包养殖场等。也有一部分人外出务工,还有少数农民开办企业,成为了老板。因此,农村的阶层不再是单一的农民,也产生了少量企业主、大量农民工以及个体户等群体。

所以,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由于资源向下扩散而诱发社会分化与阶层分化,各个领域、各

①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38—41页。

②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③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1—17页。

④ 李强:《中国在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的四个试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第4—5页。

⑤ 李强:《我国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关系的历史回顾》,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

个行业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可以说, 市场机制的引入与发展, 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结果,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① 由于国家的撤退、单位制的解体, 人们从集体中的成员变成市场中的个人, 整个社会呈现出碎片化倾向。除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以外,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人数较少的利益群体, 共同的阶级(阶层)意识还没有形成,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互相之间的阶层差别。^② 而随着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 社会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二) 90年代: 资源集聚与阶层重组

80年代末90年代初, 社会上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80年代的变化。首先, 这一时期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 使得人们开始对改革产生疑惑。另外, 90年代以来, 改革的失败者开始显现并被淘汰出局, 不同群体获得的利益愈发不平衡, 于是针对改革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 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带动后富; 不论市场还是计划, 都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所用, 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 等等。这一番论述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改革正本清源, 指明方向。同年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 此后, 大量官员开始辞职或停薪留职而下海经商^④,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权力正式大规模进入市场, 因此产生了诸多不公平交易或寻租现象。另外,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中央政府, 导致地方财政紧张。^⑤ 因此地方政府也大量参与到市场中去, 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与地方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会资源由80年代向社会尤其是向下层扩散, 逐步转变为大量向政府以及具有官方背景的企业聚集。^⑥ 而在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产生了大量下岗职工, 他们成为了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例如, 李强通过1998年的调查发现, 下岗职工失业后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通常难以维持生计, 最后得出“下岗职工是典型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⑦的结论。所以, 社会财富的集中趋势在加强。此时, 改革已经走过“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 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⑧ 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财富“再分配”与阶层大洗牌中, 社会经历了持续的分化后开始逐渐组合, 曾经从集体中脱离出来并积极投身市场的个人开始因为利益关系而不断聚集, 形成新的团体或阶层以维护自身利益。社会利益格局开始定型, 各社会阶层也开始聚拢并形成利益集团以维护既得利益。一个新的阶层结构似乎在持续沉淀中不断呈现出来。

(三) 新世纪以来: “十大阶层”、“18个阶层”与“五个阶层”结构

经历了80年代的阶层分化与90年代的重新组合, 迈入新世纪后, 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2001年,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首次以官方的形式对新产生的社

① 李路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69页。

② 卢汉龙:《社会地位观:中国市民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天津“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1993年8月24—26日,转引自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81页。

③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 2020年12月10日。

④ 例如,在1992年,辽宁省就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创办公司,而在全国,这个数字是15万。详见CCTV-2:央视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第九集《本土雄心》,2010年9月2日。

⑤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4—75页。

⑥ 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18—20页。

⑦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第12—14页。

⑧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会阶层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新的社会阶层已经产生,例如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等。这在随后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新阶层结构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陆学艺等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依据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参照职业类型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结构,在学界和社会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响。这十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①刘欣则以权力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动力基础,首先从再分配能力、寻租能力以及市场能力等将城市社会划分为不同于“十大阶层”的10个阶层。^②例如,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职业办事人员等。接下来他又依据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将城市社会划分为18个阶层^③,例如局级及以上高级干部、处级中层干部、科级干部等。此外,杨继绳依据韦伯意义上的财富、权力、声望这三个标准,划分出上等阶层、中上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下等阶层等五个阶层。^④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对三种标准进行了量化尝试。例如,财富等级决定个人阶层地位的权数为0.26,权力等级为0.38,声望等级为0.26等。质言之,不论“十大阶层”模型还是18个阶层模型抑或是“五个阶层”模型,都从侧面展现出我国在接近20年改革开放中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

社会分化与阶层重组必然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均质化阶层结构,针对上述不同阶层在社会中的具体分布状况,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数据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陆学艺等人的调查表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已经呈现出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而中小城市表现为“上小下大”的鸭梨形状,广大乡镇、农村地区则仍然呈现出金字塔形状,只不过是中下层取代底层占据人口的大多数;李强以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方法分析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了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的结构。^⑤农民构成下面长长的一横。随后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又有了新的变化,即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⑥因为农民群体10年间减少了16.71%,体力劳动工人群体上升了3.78%。而贺雪峰则在2017年发文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不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而是“类纺锤型”结构。^⑦他指出,中国农民进城失败可以返回,因此社会结构实际上以城市中下收入阶层与农村中间层为主。刘欣的研究则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橄榄形,而中西部地区社会呈“圭字型”,总体呈现出“圭字型”。^⑧

可以说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与阶层分布状况提供了比较有力的参考。国家层面对于社会阶层的分布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也异常关注。在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以及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指出“要进一步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⑨,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② 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17—19页。

③ 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5—8页。

④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第346—351页。

⑤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55—73页。

⑥ 李强:《我国社会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北京日报》2015年5月25日,第18版。

⑦ 贺雪峰:《中国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吗》,《学术界》2017年第3期,第123—131页。

⑧ 刘欣:《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89—115页。

⑨ 习近平:《对新常态怎么看,对新常态怎么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39—244页。

“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①, “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政策目标”等。^② 显然, 国家的这些措施也将会对新的阶层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概言之, 改革开放持续 40 多年之后, 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在新世纪初逐渐定型, 并且以职业为突出特征。在当下, 尽管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这一阶层结构仍然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例如科学技术、文化等因素在塑造社会结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科学家、技术人员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社会分工等。但是最激烈的转型过程已经完成。所以长期来看, 阶层结构不会发生质的重大变化, 而是会在不同阶层的数量上有所调整。另外, 以职业为区分的阶层结构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主流分层体系。所以, 总体上来看, 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会趋于稳定, 并随着中等收入者队伍的扩大而不断成熟。例如, 近年来逐渐兴起并扩大的“新的社会阶层”, 就不断补充着中等收入者阶层的队伍。也许正如李春玲所言, 过去十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促成中产阶层人数大量增加, “中产化”成为了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主流趋势, 橄榄型社会分层形态发展趋势日益明显。^③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从大历史角度对我国社会阶层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 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简要结论: 第一,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从封建时代的“官僚——士大夫——农民”结构, 转变为如今以职业为基础的多阶层结构, 这无疑是一种进步。颇具影响力的“十大阶层”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似, 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而“18个阶层”的结构则更具中国的特点。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推行全面深化改革, 阶层结构也将继续完善。第二, 就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而言,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社会的金字塔型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过渡^{④⑤}, 目前总体呈鸭梨型或“圭字型”。从绝对数量上看, 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中间阶层。如果从构成中间阶层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来看, 在 2015 年已经突破 5000 万, 约占全部从业人口的 12.5%。^⑥ 如果按照收入中位数 75%—200% 的区间来看, 2015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为 38%。^⑦ 而国家统计局将中等收入标准设定在三口之家年收入 10—50 万元人民币, 进而测算出 2017 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人,^⑧ 约占总人口的 28%。尽管如此, 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在未来, 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逐渐完善阶层结构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在此提出几点思考。第一, 尽管如今我国经济发展以市场逻辑为主, 而且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公有制经济依然在决定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中占据绝对主导。尽管政府的角色在逐渐向“守夜人”过渡,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减少, 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必要时刻能够发挥主导作用。所以, 即使当下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机制已经

① 习近平:《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9页。

②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第1—3页。

③ 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70年》,《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31页。

④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⑤ 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70年》,《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33页。

⑥ 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第7页。

⑦ 李培林《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第3—20页。

⑧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19年1月2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1_1645944.html,2020年11月21日。

从“再分配”转变为市场化^①，而且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甚至有些阶层通过政协、民主党派等合法参与渠道，已经能够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例如私营企业主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等，但是我国不会也不允许个别阶层能够凌驾于执政党、国家和人民之上。

第二，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对统战工作有重要论述。例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②邓小平曾经讲“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统战工作做出重要论述。例如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④就社会阶层而言，我们党重视将所有社会阶层都团结起来，共同围绕中心，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例，2001年“七一讲话”标志着党对思想上要求上进的私营企业家正式敞开大门，此后大批民营企业家纷纷入党^⑤；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⑥，注重引导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例如，“精准扶贫”提出以来，大连万达集团捐款21亿元对口帮扶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带动全县3.38万贫困人口脱贫，获得国家首个脱贫攻坚创新奖。再比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12日赴江苏考察参观张謇生平展时指出，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12月12日“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20年度论坛在京召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潘岳指出，“中国企业家当与国家同进退、共荣辱，同呼吸、共命运”。^⑦

总而言之，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的阶层结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烙印。而在1949年之后，在中国的阶层体系变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在中国当下以及今后的阶层研究中，要充分重视执政党这一关键要素。另外，如果研究只着眼于当前的阶层现象，只看到既有的阶层体系，就容易产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感，尤其是在当下主观阶层认知愈发重要的背景下。因此，将阶层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脉络纳入到分析视野中，以大历史眼光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阶层结构乃至预测未来的阶层结构。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李路路：《阶层结构变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65页。

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页。

③ 人民政协网：《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主要内容》，政协统战·统战理论，2006年3月2日，http://www.rmzxb.com.cn/jrmzxbwsj/zxtz/tzll/t20060221_77173.html，2020年12月2日。

④ 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0—71页。

⑤ 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例在2000年为19.8%，2002年上升到29.9%，2004年上升至33.9%。详见国晓光：《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年，第108页。

⑥ 新华社：《“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侧记》，2018年11月2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2/content_5336696.htm，2020年12月12日。

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20年度论坛在京召开》，2020年12月1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76485，2020年12月12日。

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研究

李晶燕, 邓青州, 胡 昭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云南统战资源丰富, 是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三个定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考察云南时, 在科学分析云南省情的基础上对云南提出的战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永恒主题。多年以来, 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正在夯实、各项行动正在深入、良好形象正在树立。在云南“三个定位”发展中, 统一战线必须进一步发挥其“大联合”“稳定剂”和“助推器”作用, 形成工作合力、优化环境、加大宣传, 助推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

关键词: 云南统一战线; 服务; 三个定位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1-0013-07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主要任务是为中心工作服务。2018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视察云南时, 指出云南“可谓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 可见统一战线工作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5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云南多地考察调研后提出, 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以下简称“三个定位”), 为新时代云南的发展定了位。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有利于发挥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政治、智力、经济和社会优势, 凝聚各方力量, 积极为其发展建言献策并创造和谐的环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 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正在夯实

云南统一战线不断夯实服务的思想政治基础, 逐步凝聚为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信心和力量。一是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共识基本达成。云南各级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联谊会、知联会及各行业协会等组织, 在工作中大力宣传“三个定位”发展的内容及其意义, 并以统一战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统战宣传月、宗教宣传月等活动为载体, 开设培训班, 教育引导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

基金项目: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度全省社院(校)科研协作课题重点项目“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战略研究”(2019SYXTA04)。

作者简介: 李晶燕,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法学。邓青州、胡昭均为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课题组成员还包括杨丽、陶长虹、周继美, 均为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等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明确具体的服务方向，凝聚为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共识。同时，通过担任工商联、商会职务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宣传“三个定位”相关知识，提高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对服务“三个定位”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二是营造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社会氛围。各级统战部门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并在公路沿线、公共场所、城乡街道等制作固定广告牌、宣传栏、宣传标语等，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和对外开放等与“三个定位”发展相关的知识。同时，各地还结合本地实际，制作与之相关的宣传片，在一些地方制作 LED 电子广告牌，宣传“三个定位”发展的知识。抽调懂少数民族语言且宣讲能力强的干部深入少数民族聚集区，宣传党和国家的惠民利民政策。营造出“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影像、网络有信息，全方位、全覆盖”的、有利于“三个定位”发展的舆论氛围。三是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知情渠道更加畅通。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与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的联系，及时通报云南“三个定位”发展的情况，使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及时知道其发展动态。四是网络相关人员联系渠道已经建立。党委统战部门以互联网协会为载体，建立起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联系渠道，引导他们在网络宣传中发挥作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二）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智慧力量正在凝聚

在巩固政治思想基础、凝聚发展共识的同时，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智慧力量也逐步凝聚。一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打好服务基础。云南各级党委统战部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等形式，全面摸清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及各方面情况，深入分析发展形势。二是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智慧力量正在凝聚。云南各级统战部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畅通其参政议政渠道，为“三个定位”发展出谋划策。注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收集这些组织和成员对“三个定位”发展的意见，为党委、政府制定政策和部署工作提供参考。三是促进统战服务智慧凝聚的相关平台正在搭建。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努力搭建相关平台，促进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智慧凝聚。例如，河口县委统战部在信合水电公司设立了“新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努力把新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引导其积极建言献策，参与社会发展，为“三个定位”发展服务。四是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网络基础正在构建。云南省委统战部建立由“云南统一战线”门户网站、“云南统一战线”微信公众号和“云南统一战线”政务微博构成的“一网二微”的统战网络宣传格局。同时，州市和县市的统战部门建立统战网站和统战微信公众号，统战网络宣传工作正在广泛开展。目前 16 个州市已有昆明、曲靖、大理、保山、楚雄、普洱、文山、德宏、迪庆、怒江 10 个建立了统战门户网站，15 个州市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昆明、曲靖、玉溪、红河等 10 个州市已经实现县市统战微信公众号的全覆盖。云南 8 个民主党派都已建立官网，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三）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各项行动正在深入

云南统一战线明确了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服务方向后，为其服务的行动正在逐步深入。一是海外经济交流合作正在加强。云南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抓住东盟华商会、南博会、昆交会等契机，发挥优势，为全省企业争取海外投资合作伙伴和海外华商到云南投资发展牵线搭桥，助力“三个定位”发展。二是多形式海外文化交流联谊正在开展。云南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利用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等华文教育项目，并通过举办华文教师培训班，选派优秀教师赴泰国、越南华校开展支教活动等举措，努力营造“三个定位”发展的周边良好环境。三是加强两岸交流和服务台商促招商工作正在进行。云南台盟等相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台办的各种惠台政策，为来

云南的台商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同时,借助“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研讨会”平台,加大招商项目推介,推动台湾精致农业、生物医药、旅游、绿色食品加工、文化创意等特色优势产业在云南投资发展。四是引导华人华侨助力“三个定位”发展的渠道多种多样。通过举办“云南同乡联谊大会”、“同心圆梦彩云南·海联情系珠江源”和服务黄埔同学及亲属等主题活动,不断凝聚人心,形成服务合力。五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正广泛开展。制定并在全省实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逐步规范。第一轮“十百千万工程”已经完成,第二轮“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作已经于2018年启动,10个示范县、101个示范乡镇(特色乡镇)、1461个示范村(特色村、社区)和3.71万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户建设正在全省各地实施。各地在创建活动中,充分发挥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宗教场所、军(警)营、医院、家庭等阵地的作用,打造一批“拿得出、叫得响、有看头”的示范点,并在活动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培育民族团结之花。六是脱贫攻坚与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相结合。云南统战部门把决战脱贫攻坚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融合推进,走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路。2018年,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率先实现整族脱贫,“一个民族一个行动计划”、“一个民族一个集团帮扶”的脱贫攻坚模式不断巩固。

(四) 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良好形象正在树立

云南统一战线通过各种行动,树立了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良好形象。一是“同心”活动正在开展。云南各级统战部门通过开展“同心统战”文化建设、培育“同心统战”民族品牌、推进“同心统战”基地建设、营造“同心统战”和谐氛围、开展温暖工程促进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同心”活动等,推进“三个定位”发展。二是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活动助力脱贫攻坚。截至2019年底,已经有4794家民营企业、商会参与,共实施10829个项目,投入资金55.63亿元,5088个村、260万贫困群众受益。同时,云南海联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同心·律师服务团”等团体,开展智力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卫生扶贫、法律扶贫等活动,统一战线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三是建立涉外纠纷解决机制。在部分边境县开展涉外纠纷化解试点,融合民族协(学)会资源,打造涉外诉讼服务中心,聘请特邀调解员,由法院进行业务指导,通过现场调解、“云解纷”视频调解等多种方式,开展涉侨、涉边、涉民俗纠纷诉前调解。四是不断深化机构改革促进统战工作创新发展。云南统战系统通过人员融合、业务融合和职能优化有序推进改革,实现了“合编、合心、合力”,以新的形象服务“三个定位”发展。

二、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合力有待提升

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工作逐步推进,但服务合力还有待提升。一是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共识还需进一步巩固。虽然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共识已基本达成,但由于宣传深度和广度尚不大,能够参加相关培训的时间和人员有限,还未形成全社会支持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良好氛围。二是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集成度不高。云南很多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部分企业对投资目的国的行业政策、风俗习惯、政治法律环境、会计规则、风险评估等方面缺乏了解,境外投资风险极大。三是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服

^① 程三娟:《守初心担使命谱新篇——2019年云南统一战线工作综述》,2021年2月24日, <http://www.135editor.com/articles/1451035.html>, 2021年3月14日。

务基层的机制尚未形成。云南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服务“三个定位”发展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渠道较少，面向基层开展工作创新不足。四是各领域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作用发挥不够。云南民主党派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组织化程度较高，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知识分子大多在党外和体制外，且流动性较大，这些群体在服务“三个定位”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

（二）推动云南社会稳定的体制仍不健全

由于影响云南社会稳定的因素众多，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云南统一战线“三个定位”服务“稳定剂”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一是民族宗教等问题复杂。云南有15个独有民族、26个世居民族。五大宗教在云南都存在，还存在一些原始宗教，且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境，与越南、老挝、缅甸相连，民族宗教问题与边疆治理、边境防控、社会矛盾纠纷等问题相互交织，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云南的和谐和稳定。二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以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和当地机构为主，教育机构及其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在其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三是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的相关机制尚需不断完善，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何建立有效“组织起来”的制度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四是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探索不够。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还停留在传统的服务方式上，需要逐步探索，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三）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助推“三个定位”发展的智囊团作用尚不明显

受到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云南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在服务“三个定位”发展中的智囊团作用尚不明显。一是统一战线助推“三个定位”发展的智囊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各界人士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由于时间和精力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大多不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导致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不强。二是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知情渠道尚待拓宽。由于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分散，除民主党派具有固定的知情渠道外，其他统一战线人士特别是基层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知情渠道比较狭窄，仅是从广播电视、互联网和他们自身参加的部分会议中知情，需要进一步拓宽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知情渠道。三是统一战线在引导非公经济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尚待加强。在非公经济“走出去”和“引进来”中，统战部门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大多立足做好简单的服务工作，引导性不强。四是统一战线服务云南“三个定位”发展的平台建设不足，尚未建立统一协调的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平台。五是对外文化交流尚待加强。在云南的对外文化交流中，专门针对“三个定位”发展服务的文化交流成效不显著，需要立足“三个定位”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交流。

（四）新媒体在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中的作用尚待加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新媒体开展统战工作时的不足之处也逐步显现出来。一是指尖统战工作需要不断推进。统一战线信息共享和信息宣传统筹整合度不高，如怒江州和部分县市基层微信公众号尚未完全推出。二是媒体统战队伍建设尚待加强。由于媒体人士分散、流动性大，且这些人统战意识不强，媒体统战队伍的建设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导致媒体人士在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显。三是媒体在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种类繁多，其文化程度、生活工作方式有所不同，有的统一战线人士特别是基层和民族地区的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甚至于不习惯使用网络媒体，他们较少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和与外界交往，致使其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四是全媒体统战宣传格局急需建立。由于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媒体融合发展中的统战宣传需要进一步调整，全媒体统战宣传新格局尚未建立。五是大数据统战网络格局尚未建立。由于各方面条件

限制，基层统战部门和统一战线领域的网络建设参差不齐，省、州市和县市三级大统战格局尚未建立起来，已经有的大多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改进。

三、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对策

（一）发挥统战“大联合”作用，形成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合力

统一战线要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必须发挥其“大联合”优势，形成服务合力。一是要进一步巩固已基本达成的服务共识。要继续依托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和各种学习培训，努力形成“以培训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代表人士等为主体，覆盖全体统战干部和统一战线成员”的培训格局，并在各类培训中夯实统一战线人士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导、支持民主党派人士开展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实践活动。二是要充分发挥各领域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引导和组织广大律师积极参与普法宣传，主动服务社会，维护司法公正。要通过各级宣传部门、工信、工商联、文联等部门和组织加强与新媒体人士的联系，鼓励支持他们宣传展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果，对党和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要建立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相关平台。要依托台侨社团和同乡会、联谊会等组织，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开展经贸考察和交流合作。要深入了解掌握行业组织、社会组织情况，搭建联系会议平台，推动行业组织、社会组织间的联系沟通。要加强与中央、省外统战组织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邻国商会的联系，加大对内对外交流的力度，不断探索全方位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新途径。四是要支持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建立促进民营企业在“三个定位”发展中开展投资合作的政策机制，为省内民营企业开展投资合作提供交流、沟通平台。要引导和支持云南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统战力量走出云南开展宣传、争取活动，积极邀请其上级组织和领导到云南调研考察，拓宽沟通联系反映渠道，努力争取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五是要建立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相关机制。要建立服务工作机制，成立由党委统战部门牵头、成员单位和民主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领导小组，并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推进服务工作。要建立服务响应机制，各州市和县市委统战部、省直统战系统各成员单位、民主党派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要建立服务督察机制，省委统战部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工作推进情况加强督查，对完成任务好的和差的单位部门，进行通报。要建立服务考核机制，将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工作情况纳入各州市年度统战工作考核指标、各有关单位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内容。六是要把统战的“家”安进乡村。要将统战阵地建在最基层的乡镇和村社，发挥统战优势，凝心聚力，服务发展。七是要多渠道征集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相关理论成果。要定期不定期通过征文等形式，征集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理论成果或调研成果，促进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

（二）发挥统战“稳定剂”作用，优化“三个定位”发展环境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必须发挥其稳定社会的作用，不断优化“三个定位”发展的社会环境。一是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统战、民族宗教部门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要通过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和解答统战及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支持和参与率。要通过不间断、多途径、多形式、多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到“四个认同”，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活动。要坚持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继续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及时消除宗教领域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二是要构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体系。云南的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学生众多

的特点,支持各民族师生创办民族文化类社团及在校开展民族文化研究和学习活动。要依托云南民族大学多民族语言学科优势,建设云南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云南双语人才培养基地,每年进行一定数量的双语人才培养。三是要不断健全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联系群众机制。要组织开展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非公经济感恩回报等活动,把有利于发展的因素汇聚团结起来,把不利于改革的因素消减转化掉。四是要不断探索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新方法。全省各级统战部门要积极探索服务“三个定位”发展战略目标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不断提高自身把握大局、服务大局的能力。

(三) 发挥统战“助推器”作用,推动“三个定位”发展

统一战线通过参政议政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助推“三个定位”发展。一是要从多个方位和角度为“三个定位”发展服务。要建设一支规模大、结构优、素质高的人才队伍,不断夯实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人才基础。要充分调动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港澳台侨胞等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为“三个定位”发展献智献策。二要拓宽并畅通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知情和参政议政渠道。要通过各种会议、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统战网站、微信公众号、统战微博等传统和新媒体渠道,拓宽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对“三个定位”发展情况的知情渠道。要畅通协商渠道,支持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围绕服务“三个定位”发展问题,积极主动开展建言献策。三是要做“三个定位”发展的相关调研。要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调研工作机制,发挥统一战线智力密集的优势,组织其针对“三个定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选准角度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服务“三个定位”发展。^①四是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引导服务非公企业对外交流的积极作用。云南各级统战部门尤其是各级工商联要通过争取和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促进各类非公企业商(协)会赴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文化调研与交流,寻找商机,降低企业的风险和成本。同时,省工商联要定期发布《云南省民营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总结云南非公企业“走出去”的实践经验和典型做法,通过编印内刊资料、微信公众号推送等形式下发给其他非公企业会员参考借鉴。五是要进一步抓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工作。要努力推进第二轮“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作,启动实施“5525”工程,全面完成“15885”创建试点工作,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六是要搭建工作平台促进对外开放。要举办和参与“商会经济合作峰会”“经贸投资洽谈会”等活动,着力搭建国内外商会的交流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要扩大海外联谊交流,邀请港澳台和海外友好团体和高层次人才来云南考察访问、投资兴业。七是要引导企业在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建设中承担社会责任。要进一步强化商会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职能,在为其提供全方位社会化服务的同时,对其在国际上的经济社会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八是要建立“三个定位”发展基金会。要建立由统战部门指导、工商联主导、会员企业参与的云南省“三个定位”发展建设基金会,除了帮助会员企业解决贷款难、融资难等问题外,还要对那些主动将拓展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的非公企业,进行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激励,不断强化企业在“走出去”和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将推介企业品牌形象与宣传、维护云南形象和国家形象相统一的自觉性。要对有实力和信誉的优秀企业在品牌宣传的支出方面,协调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税收冲抵、项目资助等方式给予扶持。九是要促进各种人文交流。要以统战工作促进传统文化交流,助力云南更好融入“三个定位”发展之中。要通过举办文化年、图书展、影视展、艺术节、博览会

^①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统战部关于全州统一战线围绕“三个定位”发展服务“十三五”发展的行动方案,2016年6月14日, <http://www.bndaily.com/c/2016-06-14/39768.shtml>, 2021年3月14日。

等大型文化展会和文化活动，推进富有城市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旅游、民间工艺、历史文化、特产文化等特色资源项目。

（四）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助推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

统一战线要服务好“三个定位”发展，必须扎实推进统战宣传与媒体的融合，加大统战服务的宣传。一是要加快推进指尖统战工作。云南省委统战部应将统战 APP 建设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尽快推出云南统战 APP 手机客户端，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交流和人民群众了解统战工作提供便利。要让企业和个人可通过 APP 实现线上入会，及时共享招商、投资和产品、人才等供需信息，真正实现工作在线、服务在线、数据在线。要运用接地气的网络语言、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对统战理论方针政策、统战知识等进行解读，让相关人士听得懂、看得明、学得进。要让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和热心市民通过 APP 就可以将身边发生的与统战有关的小故事、图片、视频及时上传。要将云南统战 APP 与云南统一战线微信公众号和云南统战网站链接起来，根据统战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类定级，并依据问题大小和性质实现逐级答复和解决，使网络统战不仅变成报道日常工作的平台，更成为展示风采和解决问题的窗口。二是要在媒体领域培养一支支持统战工作的队伍。统战部门要把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等网络人士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增进他们的政治认同，并引导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三个定位”发展服务。三是要利用好网络媒体促进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交往和互相交流。要利用网络新媒体，把统战朋友圈从线下交到线上，让联络变得更加便捷。要通过网上平台开展交流谈心、理论探讨和问题回复，使得工作开展更加便捷高效。要充分运用统战官网和云南统一战线微信公众号、云南统战 APP 等，设立“网上工作室”，举办“网上沙龙”，主动融入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朋友圈，在线上线下保持经常性联系。四是要以“融媒体”思维做好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的宣传和引导工作。要逐步实现线上、线下统战工作的全面对接，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全媒体宣传格局，努力化解潜在或已经出现的负面和虚假网络舆论。^①五是要建立健全“以省、州市、县市三级统战网站为主体、其他统战力量共同参与”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党委统战网站主要负责汇总宣传统战工作政策、理论、动态等方面的信息，要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云南的现实情况，在“统战工作”栏目下开设新社会阶层专栏，对新社会阶层发展动态、实践动态等进行跟踪和报道。行业商会协会网站主要负责汇总宣传“三个定位”发展中，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商机及政策解读，开设“三个定位”发展建设专栏，为云南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服务。党委统战部门和各商会要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点对点快速推送信息的优势，及时发布我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出台的最新政策和相关解读，动态发布“三个定位”发展、南亚东南亚各地区的最新经贸信息。

总之，云南是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统一战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云南统一战线要利用自身的政治、智力、经济和社会优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在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刘国红：《发挥统一战线作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2018年3月9日，http://www.cssn.cn/jjx/jjx_gd/201803/t20180309_3871069.shtml，2021年3月14日。

协商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重要论述中的人民政协特质优势探析

王 艳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99)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相关重要论述中蕴涵着对人民政协特质优势的揭示和阐发。通过学习研究, 可分析归纳出人民政协有如下方面特质优势。系统协同性特质蕴含统战新优势, 有利于求同尊异, 促进民主、科学决策, 遵循合作博弈式的运行程序; 包容性特质蕴含战略新优势, 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 建构多元一体和谐社会形态, 提升战略谋划布局能力和水平; 协商性特质蕴含治理新优势, 有利于诉求有序表达和利益整合, 促进多样性主体达成一致性共识, 广泛凝聚智慧力量,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联合性特质蕴含共同体构建新优势, 有利于推动政治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时代性特质蕴含网络新优势, 有利于塑造线上新环境, 激发互联网思维, 提升政协工作效能。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政协特质优势; 统一战线;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2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特别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对新时代人民政协更好发挥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人民民主重要实现形式的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 风险和希望兼具, 压力和动力同在, 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多向交织, 多元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激烈。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新优势, 明确新形势下人民政协的新发展方向, 有利于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践增添活力, 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力量, 有利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智慧。

一、系统协同性特质蕴含的统战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断为事业发展凝聚人心、增添力量。人民政协要建真言、谋良策、

作者简介: 王艳,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

①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6年1月1日, 第1版。

出实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①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新情况，从更高、更广、更深的角度协同党内党外力量。这就要求人民政协充分发挥统战协同优势，推动党外人士凝心聚力，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内联外合，不断增强系统协同性。

系统协同性特质蕴含求同存异的基本理念。人民政协推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愿景下，在沟通理解基础上达成共识、减少差异，寻求不同认识和意见基础上的利益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调动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人民政协工作从最大公约数角度看待问题、解决矛盾、聚集力量、凝聚智慧，增进一致不强求一律，既尊重差异又不扩大分歧，既包容多样又不弱化主导，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社会基础、扩大群众基础。

系统协同性特质遵循合作博弈式的运行程序。人民政协组织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人士通过规范制度、民主程序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各方力量具有不同思维、代表不同方面的利益，表达各自诉求，通过协商达到合作，在参与主体、内容、过程、次序和结果方面具有一定的合作博弈特征，同时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达成共识和相互合作、理解、妥协，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相互沟通协调、解决问题，进而形成团结合力。合作博弈保证人民政协运行的实效性，保证协商形式的“优”、协商内容的“实”、协商过程的“严”，有利于推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融入国家治理，在其中发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功能。

系统协同性特质孕育着人民性的决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要求人民政协工作要突出平等协商的特点。平等协商意味着多方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行思维碰撞、关系协调、利益均衡，保证决策成果能最大限度代表人民利益。政协联系各界别代表人士，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协商活动，争取最广泛的参与主体，通过平等协商兼容并蓄，集聚各界力量、广泛凝聚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具有新的统战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要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有大目标、大视野、大战略、大思维，以更加务实有效的对策来构建和拓展人民政协统战团结功能，努力实现大团结大联合。^①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极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②这为人民政协工作明确了新的统战优势，提供了新的遵循。人民政协工作应充分发挥统战优势，通过双向发力不断加强职能融合，保证协商实效、监督实效和建言资证实效，保证对政策制定前、执行中、执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对政策施行前、施行中、施行后进行全程监督，保证建言资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发扬民主中增进团结，在增进团结中深植民主，在建言资政中凝聚共识，在凝聚共识中启发建言资政。

^① 杨卫敏.《人民政协统战团结功能新论——简析习近平对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的贡献》，《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8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2020年12月25日。

二、包容性特质蕴含的战略新优势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人民政协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质。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覆盖领域空前广泛,特别是在聚焦发展重点、补齐发展短板等方面优势和作用突出。政协通过了解民情、汇聚民意,把来自基层的,来自实践的正确认知转变为理论,进而把理论演化为党的政策,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包容性特质蕴含着广泛的协商民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范围不断扩大,政治参与度不断提高,尽可能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汇集不同的声音,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主。人民政协广泛的民主既从多层面完善党的决策体制机制、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又不断提升制度的优化水平、提高政府效能。

一是包容性特质彰显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人民政协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生俱来,如果脱离人民群众,人民政协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背离群众路线,政协工作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政协就是通过委员与各族各界群众的联系,密切关注舆情动态,疏通民意反映渠道,搭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平台。”^①人民政协中的政协委员来自群众,代表社会各方面力量,来自人民群众、贴近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群众,切实把为群众服务贯彻到履行职能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中真诚为民建言,在民主监督中及时反映民意,在参政议政中尽心为民办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最大程度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巨大优势。

二是整体性特质透射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形态。人民政协制度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发展的“活力地带”,既有利于克服“一党长期执政”可能出现的问题,又避免了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诸种弊端。人民政协制度本身体现了制度安排的科学性。人民政协发挥着团结社会的作用,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平衡器。“人民政协可以通过政治安排,吸纳新的社会群体和多元利益表达,不断增强自身适应现代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能力,维持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②,从而保证多元一体和谐社会形态。

三是人民政协共识性特质蕴含着战略性新优势。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思维方法。战略思维能力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汪洋同志指出:“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培养战略思维,把握时代脉搏,拓宽国际视野,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发挥好凝聚共识的独特作用。”^③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要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着眼国内、放眼世界,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强化新时代统一战线蕴含的战略优势。人民政协的调查研究、资政建言和参与对外交往也蕴含着战略思维。新时代,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日趋广泛、密切,人民政协工作应放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从全球视角认识问题,也从国内大局思考问题,使得调查研究、资政建言和参与对外交往更具全面性和战略性。

① 田成川:《担当初心使命 展现新时代新作为》,《华兴时报》2020年10月28日,第6版。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人民日报年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③ 汪洋:《加强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培养 发挥人民政协在对外工作中的独特作用》,2018年9月7日, <http://www.sanyazx.gov.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52&id=3146&m=content>, 2021年1月20日。

三、协商性特质蕴含治理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①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借鉴和创新领域。人民政协运行实践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完善程度，为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人民政协要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双向推进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把治理理念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相融合。

一是协商性特质有利于促进多样性主体达成一致性共识。人民政协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最广泛吸纳各党派、社团、阶层、行业、民族以及港、澳、台、侨等不同界别的代表人士参与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政协各界别成员具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主体特征、代表不同部分的人民群众。人民政协制度是不同主体在多样性前提下共同协商，寻求协同、共识，并能够求同存异的科学、规范的制度，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念和创造性的制度安排，为国家治理的体系化和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同时，人民政协团结联合范围随着时代发展要求而不断调整，其界别设置也应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在保证主体多元性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协商性特质有利于诉求有序表达与利益有效整合。^② 一方面，人民政协为各方面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使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部署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能够充分、广泛吸纳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彰显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人民政协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协商，提供了意见表达和利益协调的有效机制，建立起国家与社会各方面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沟通体系。人民政协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对奠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和群众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协商性特质有利于凝聚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人民政协的协商性特质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国家治理需要以协商民主精神广集民智、广聚民力。国家治理是多方治理主体在党的领导下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政协协商则是各方面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等协商，二者本质上都是凝聚协调整合多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机制和功能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协委员通过政协协商广泛吸纳人民群众诉求、建议，为广大群众献计出力、有序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平台和有效渠道。人民政协工作在提升治理水平，团结各方力量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四是人民政协协商性特质蕴含着国家治理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努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2021年1月20日。

^② 董明：《角色与功能：人民政协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互动互构》，《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32页。

^③ 董亚炜：《人民政协：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与战略选择》，《中国政协》2019年第20期，第46页。

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政协能够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凝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治理共同体,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尤其是政协协商具有深入基层,广泛收集社情、沟通民意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①“国家治理是国家、政党、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政党、社会和公民个人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②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规范性主体之一,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协商治理的制度平台。政协协商模式及其所倡导的协商共识理念,为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团结联合性特质蕴含的共同体构建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③新时代,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进一步彰显了团结联合的共同体思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政治共同体^④,其成员具有不同经济社会基础,构成和来源多样化。这要求人民政协工作要强化“团结合作”的大联合思维,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紧密团结在一起,领导者与同盟者的长期密切合作,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认知,更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保证中华民族能够凝聚力量,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共同面对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

一是团结联合性特质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引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人民政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⑤。这表明党对新时代人民政协建设的构想蕴含着“整体性”和共同体思维。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我国利益格局不断分化调整,经济利益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就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人民政协能够以共同体思维求大同存小异,体现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联系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政协表达来自各方的声音,在党的领导下秉持公共理性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原则,通过充分沟通协商,达成相互理解和妥协、形成共识。人民政协的民主覆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 2021年1月15日。

② 姚俭建:《专门协商机构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中国政协》2019年第23期,第10页。

③ 习近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第1版。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4日,第2版。

⑤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8年10月14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10/14/c_1123556794.htm, 2021年2月1日。

盖范围空前广泛，能够充分有效掌握和反映各阶层、各党派、各界人士利益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在推动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较好照顾同盟者利益，有利于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实现利益整合。人民政协能够促进不同界别人士形成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团结教育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共同目标、共同利益而奋斗，从而推动实现政治共同体构建。

二是团结联合性特质有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人民政协制度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制度平台，团结联合各界人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多方治理主体的一体性。人民政协为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组织运行机制，凝聚各方面社会力量形成治理体系，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行动共同体”。人民政协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抓手，在突破社会治理瓶颈、增强社会治理实效性，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达成共同发展的目标，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社会共同体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三是团结联合性特质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政协要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正能量。”^①这就进一步拓展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大团结大联合整体性特质。全球化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使得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都大大强化。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对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内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方面，“在当下中国，共同体意识的直接表达就是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②另一方面，人民政协把各族各界和海内外华侨华人代表人士凝聚到一起，形成政治共同体，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最大效能，以政治共同体优势服务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时代性特质蕴含网络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重要论述的时代性特质，蕴含着对网络新优势的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了“互联网+”时代，网络应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信息传播速度、深度、广度的不断提高和方式的不断创新，重构着社会各个方面，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将深度改变传统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的重要论述结合时代发展特点，非常重视人民政协与互联网的结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③

一是时代性特质有利于塑造线上新环境。互联网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我国8.5亿网民可以便捷地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发展为人民政协工作创造了全新环境，提供了协商民主的新思路；人民政协工作也为创新网络运用、营造良好网络空间提供了广阔平台。网络虚拟空间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的重要空间，互联网技术在现实社会之外“增生”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网络社会，网络技术手段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创新提供了新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2020年12月30日。

^② 周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思维导向》，《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30页。

^③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0日，第1版。

思路, 人民政协利用网络能够更加准确、更加快速地传“情”达意, 更加有效地沟通协调各方面关系, 有利于政协更好发挥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化解矛盾的优势和功能。

二是时代性特质有利于激发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与人民政协“都可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共空间和有力形式, 二者存在目的契合性和功能相通性方面, 具有直接关联性”。^① 人民政协工作的包容性与互联网的浸润力相契合, 有利于人民政协工作与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合。人民政协工作以互联网思维方式创新政治协商模式, 搭建政治参与新平台, 有利于人民政协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最大范围涵盖各方面人民群众, 提高人民政协界别的包容性。人民政协工作也可以互联网思维开展网络协商议政, 进行提案办理情况的网络跟踪, 收集网络空间的社情民意。互联网更有利于人民政协彰显现代民主政治的技术优势。互联网更能快速、便捷地传达人民群众的意见, 是实践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协调多元利益的有效机制, 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在大规模社会进行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的民主协商, 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和较为平等的对话协商机会。”^②

三是时代性特质有利于提升工作效能。习近平总书记说: “互联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对很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起到很强带动作用。”^③ 新时代互联网技术使得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深度融合, 为人民政协提供了网络平台。利用网络手段可助力政协委员选择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直接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 更直接有效地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也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及时、直观地了解政协工作, 对提高政协的社会影响力的作用不可小觑。同时, 通过融媒体技术、网站建设、互联网移动设备应用终端等手段把互联网快捷、高效的优势发挥到政协工作中, 有利于提高人民政协工作效率, 推动人民政协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责任编辑: 罗 雷

① 邹卫中, 钟瑞华, 孙柏瑜: 《网络视域下人民政协功能的完善》, 《求实》2015 年第 7 期, 第 33 页。

② 邹卫中, 钟瑞华, 孙柏瑜: 《网络视域下人民政协功能的完善》, 《求实》2015 年第 7 期, 第 33 页。

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综述》, 2016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3/c_1119902533.htm,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研究

罗金洪

(致公党云南省大理州委员会,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 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其必要性: 有利于基层人民群众协商能力的培养; 有利于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 有利于人民政协的协商更加地“接地气”。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其可行性: 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有可供学习借鉴的具体实践探索。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关键在于找准具体衔接内容, 使二者在“人”、“协商议题”和“协商成果共享”三个方面实现有效衔接和协同发展。

关键词: 政协协商; 基层协商; 协商民主领域协同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1-0027-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 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 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①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 在实践中, 能否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起来? 如何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起来? 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施过程中的新问题。本文从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着手, 就新时代“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如何有效衔接”作初步研究, 以期能够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必要性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形式, 但二者协商的层级不同。由于政协组织系统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建立的, 且目前尚未在乡镇以下行政区域广泛建立, 因此政协协商主要是在县市以上的政协组织开展。而基层协商目前还缺乏官方的权威定义,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其“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 主要发生在基层”, 且主要是在乡镇及社区以下行政区域和基层组织机构中开展^②。参与两种协商的人员也不同, 参与政协协商的是政协各界别或政协委员, 大多为专家学者和政府公务员; 而参

作者简介: 罗金洪, 法学硕士, 致公党云南省大理州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公职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和统战理论。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1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1/c_1112564804.htm, 2020年10月22日。

^②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2015年2月9日,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xinwen/2015-02/09/content_2816784.htm, 2020年10月22日。

与基层协商的大多是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各自涵盖的范围及协商参与主体虽然也存在小部分交集,但差异性仍是二者比较时呈现的主要方面。无论是从协商参与的范围还是协商参与的主体来考察,都可以看出目前的政协协商仍具有明显的中上层化、精英化特质,而基层协商则具有显著的基层化、大众化特征。由两种协商的差别可知,二者在效能发挥领域各有“长短”。为了“取长补短”,探索推动上述两个协商领域进行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很强。

(一)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利于基层人民群众协商能力的培养

“民众协商能力的培养与实践,是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体现。”^①“通过民众协商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可以有效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好发挥基层协商的民主效用。”^②近年来农村地区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结合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本着“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的原则,以“村民议事”为协商载体,开展基层协商。但从基层协商的具体实践看,协商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协商能力和水平都有待提高。一方面,不少基层乡村干部不知道应该如何针对议题组织协商,协商程序应该如何设计运行,常因协商程序欠妥而导致协商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广大基层人民群众由于协商的能力和水平不足,常常在协商会议上“不敢说”“不会说”,大大影响了协商效果。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让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到基层协商的开展中,有利于基层协商向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对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协商能力的培养提升。

(二)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有利于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的系列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③相关部门应努力探索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新形式,致力于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④。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基层社会治理要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现如今,基层协商的基础设施建设议题已经从过去的“建与不建”向现在的“合不合法建”转变;基层协商的产业发展议题已经从过去的“种与不种”“养与不养”向现在的本村海拔及其他自然条件“合不合种”“合不合养”转变。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基层协商过程中,协商议题涉及的法律法规知识、种养殖科学知识和环保知识等越来越专业化,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基层协商议题中涉及的专业知识又比较缺乏,这给基层协商带来一定的困难。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能够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补齐基层协商中人才匮乏、专业化不足的短板。

(三)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利于人民政协的协商更加“接地气”

目前,人民政协只在县市级以上设立。政协委员也是各领域菁英、专家学者居多。专家学者们大多埋头于自己的相关研究领域,除非与其工作或研究有关,否则很少会深入了解乡村基层的实际情况。由于组织架构未能充分向基层延伸,使得政协的一些协商工作很不“接地气”。这从历年“两会”期间曾爆出的一些“雷人提案”“雷人发言”可见一斑。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

① 常婧:《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社会价值及制度构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28—33页。

② 姜雪来、王晓浩:《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四个完善》,《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55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1/c_1112564804.htm, 2020年10月22日。

④ 吕忠梅:《人民日报人民要论: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2020年5月19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0519/c1003-31713917.html>, 2020年10月22日。

接,有利于政协委员“下沉”到广大基层人民群众中间,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的所思、所愿、所难,这对于政协委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关注民生,推动政协协商更加“接地气”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可行性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具有高度重合性,政协协商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目标追求与基层协商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①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使得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具有可行性。

(一)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科学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建议,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③一项社会实践要可行,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及人民政协的重要论述中,对政协委员联系人民群众的相关论述,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我们开展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实践活动的根本遵循。有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我们开展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实践活动就有了方向、信心、指导和保障。

(二)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可供学习借鉴的实践探索

实践需要在总结他人实践的得失中不断前进。开展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有可供学习借鉴的实践探索。近年来,全国不少地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积极开展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实践探索。比如,“2018年以来,浙江省政协启动‘请你来协商’活动;江苏省政协启动‘有事好商量’活动;湖北省政协启动‘协商在一线’活动;四川省政协启动‘有事来协商’活动;云南省政协启动‘协商在基层’活动。各地在探索实践过程中,通过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有效解决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人居环境整治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高。据江苏省徐州市统计,该市开展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以来,2019年信访接访量比2018年下降了36%”。^④上述地区的先行先试,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具体实践案例,在此基础上开展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是切实可行的。

三、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关键性的问题是要厘清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具体衔接的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具体要在“人”

^① 杨桂红:《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云南政协报》2020年7月14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1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97页。

^④ 杨桂红:《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云南政协报》2020年7月14日,第2版。

“协商议题”和“协商成果共享”三个方面做好有效衔接。

（一）做好“人”的衔接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性要素。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要有效地衔接起来，首先要做到“人”的有效衔接。

1. 要“沉下去”

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应充分调动委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力，鼓励他们“沉”到基层去发挥好履职效能。一是应在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最基层，如行政村（社区）建立“委员活动小组”，由分配在基层“委员活动小组”的政协委员，参与到“村民议事会”“居民理事会”等组织的基层协商之中。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的优势，根据基层协商的议题，临时选派政协委员中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基层协商。例如，村民委员会协商“村规民约制定及修改”议题时，人民政协可以选派政协委员中的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参加基层协商，为村民提供专业指导，提出专业的意见建议，从而帮助村民制定出科学、规范、合法的村规民约。又如，城市居民社区要协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议题时，人民政协可以选派政协委员中的民政和老龄委干部参加，让市民及老年人可以听取党委政府部门专业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从而让享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的老人获得更好的服务，也让社区居民们生活更放心、工作更安心。总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过程中，“沉下去”就是要解决当前基层协商过程中，专业人士和懂政策的人员缺乏的实际问题。

2. 要“请上来”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做到把人“请上来”，就是要在人民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时，根据协商议题的需要，邀请基层有代表性的群众代表到人民政协参与政协协商，让政协协商能够听到基层人民群众对政协协商议题的意见建议。例如，人民政协在协商“乡村幼儿园建设”的议题时，可以邀请全县不同乡镇有代表性的村主任（书记）和乡村幼儿教师代表参加政协协商，广泛听取基层人民群众对乡村幼儿园建设的意见建议。总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做到“请上来”，就是要让政协协商更加“接地气”。

（二）做好“协商议题”的衔接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做到“协商议题”的衔接，就是要将政协协商的“议题”与基层协商的“议题”有效地衔接起来。

1. 做到“带着协商议题下去”

“带着协商议题下去”就是按规定分配到乡镇或者村（社区）“委员活动小组”的政协委员，到乡镇或者村（社区）参加基层协商、调研、视察时，要把政协协商议题带到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听一听基层广大人民群众对协商议题的看法和意见建议。例如，政协在年度工作要点中，安排有“整治农村赌博问题”的协商议题时，政协委员到乡镇或者村（社区）参加基层协商、调研、视察时，应当就“如何整治农村赌博问题”多听听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政协委员在参与政协协商时，无论是反映农村存在的赌博问题，还是提出整治农村赌博的建议，都能真正“接地气”，发言才会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而不是纸上谈兵、误人误事。

政协委员还要将每年在本级政协全会上提出的获得立案的“提案”，以及因不符合立案条件而未获立案的“提案”带到基层，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或通过基层协商解决问题。例如，M县政协召开全会时，政协委员张三提出提案建议：“给以其居住在N村的舅舅家两个残疾儿子解决低保问题。”该“提案”因为属于“为本人或者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提案”而未获得立案。但是，属于N村“委员活动小组”的政协委员就可以带着该“提案”反映的问题，到N村通过基

层协商解决。政协委员“带着协商议题下去”，可以让基层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民政协就在人民群众身边”。

2. 做到“带着协商议题上来”

“带着协商议题上来”，就是政协委员参加基层协商、调研、视察时，若发现在乡镇或村（社区）一级无法解决的问题，该委员就应将相关问题作为议题带回本级政协，通过政协协商加以解决。例如，S村在协商“发展村扶贫产业”议题时，不少群众提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扶持下，村里的中草药（紫丹参）种植业发展得很好，但是，由于S村目前用于中草药种植的土地为陡坡地，如果遭遇大暴雨发生泥石流等意外情况，地里的中草药就有可能毁于一旦。能否将中草药纳入农业保险范围？”由于该协商议题无法在基层协商中解决，参与基层协商的政协委员就将该议题带回到本级政协，被本级政协设为“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专题协商议题。通过专题协商，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及保险公司采纳了政协协商意见，将中草药作为增加承保农作物品种进行承保，切实解决了基层协商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做到“协商成果共享”

实践证明，不管是政协协商，还是基层协商，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或多或少总会达成一定共识，取的一定的协商成果。要做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就要做到“协商成果共享”。

1. 基层协商共享政协协商成果

基层协商共享政协协商的成果，主要做法就是通过政协协商后，党委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对所协商的相关问题做出规定，这样，基层在遇到相关问题时就不必再进行基层协商，可以直接依据相关文件精神做出处理。例如，云南省大理州州委州政府出于保护洱海西面自然田园风光的需要，通过政协协商，出台了较为详细的海西保护规范性文件。这样，洱海西面的乡村在遇到类似“白族民居只能建盖几层、建盖几米高”等已经在文件中做出规定的问题时，不必再就这类基层治理议题进行协商，直接按照文件规定处理即可。通过协商成果共享，大大降低了基层协商的成本，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

2. 政协协商共享基层协商的成果

好做法、好经验，往往都是来自于基层的实践探索。政协协商共享基层协商的成果，主要做法就是将经过基层协商实践形成的好成果、好方法、好经验，借鉴到政协协商中，在政协协商遇到类似或相关议题时，可以直接引用或借鉴基层协商成果，快速、高效地形成协商意见报送有关部门。例如，F村在协商“村务资金监督管理”议题时，不少群众提出：“虽然现在设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但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都与村书记、主任等村‘两委’成员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村，熟人熟脸，存在不愿意监督、不好意思监督的现象。应该建立‘村监督委员会+新乡贤’的村务监督新模式，把退休回村养老的老干部、老教师加入到村务监督管理中来，以此克服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监督难’的问题。”政协协商类似议题时，就可以借鉴基层协商成果，把“建议建立‘村监督委员会+新乡贤’的村务监督新模式”作为协商意见报送有关部门。

总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不是人民政协到村（社区）等基层单位主持召开政协协商会，更不是政协协商代替基层协商；而是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在“人”、“协商议题”等方面有效对接联系起来，在“协商成果”方面充分利用、共享起来，形成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协同治理新优势，从而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通过协同整合共同提升协商效能。

民族研究

彭桂萼与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论

杨宝康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民族文化研究中心, 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 彭桂萼是近代云南知名的边疆民族问题专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彭桂萼对云南边疆问题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边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边疆建设如何推进、如何实施边疆教育、基督教在边疆的传播影响及治理等诸多问题的探讨是其主要成果。彭桂萼的云南民族研究涉及的民族,主要有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彭桂萼边疆民族研究的特点,可概括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民族问题、力求让研究“以作实施政教的参考”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预见性。

关键词: 彭桂萼; 云南边疆; 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32-09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引起了有识之士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把自身学术志趣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边疆史地之专门性学问。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高峰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云南学人彭桂萼是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史地,发表了大量云南边疆及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著,在民国时期的云南边疆民族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彭桂萼的云南边疆民族研究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难以窥其全貌,亦未能深入。^①有鉴于此,笔者在多年关注彭桂萼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搜集彭桂萼的相关著述,对其边疆及民族问题研究成果作一系统的梳理和评介。

一、彭桂萼学术研究生平述略

彭桂萼(1908~1952年),云南缅宁县(今临翔区)人,字小圃,笔名有震声、丁屹等,是民国时期云南知名的边疆民族问题专家,在云南边疆及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1929

作者简介: 杨宝康,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边疆历史、民族文化。

^① 可参阅如下作品。杨宝康:《彭桂萼的边疆研究述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21—24页;李波:《彭桂萼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思想特点》,《保山师专学报》2007年第6期,第18—20页;杨宝康:《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10—113页;李波:《从〈西南边城缅宁〉看彭桂萼的边疆史地研究》,《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第89—91页;陈开心:《抗战时期的云南文化名人——彭桂萼》,《云南档案》2016年第1期,第14—15页;董晓霞:《边地作家的抗战书写与国家认同——以彭桂萼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第174—179页。另外,杨宝康著《彭桂萼传》对彭桂萼边疆民族研究的部分成果及其研究历程有所论及。

年6月，彭桂萼从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尝思应学学问浩瀚磅礴”，“矢志于继续升学，向前深造”，“不致彷徨歧途，受有失学之虞”，于同年9月考入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理科班。就学期间，他抱定“要以促进新缅宁的建设为己任”，^①不断吸收进步思想，自学大学文史。1931年，彭桂萼东陆大学预科理科毕业，回乡后在缅宁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35年担任校长。

1936年至1940年期间，彭桂萼对云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主要学术成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加以完成的。1936年暮春，彭桂萼就聘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教员兼校刊编辑主任。一走进双江的地界，就把经过地方的“所见所闻杂乱地记在笔记簿里”，“到后又率领学生到猛猛县城及教堂去观查。在校又不时找学生及当地居民来东问西问”。^②1936年10月，彭桂萼“参稽故纸，亲历实地之所得”，“举凡史地、物产、社会、政教诸大端，无不旁征博引，并蓄兼收”，^③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双江一瞥》。

1936年年底至1937年1月初，彭桂萼“竭数周之力”，主编了《收回双江猛猛教堂运动》^④一书，于1937年3月出版。该书由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中国委员办事处委员张祖荫题词“收回双江勐勐教堂运动”和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题词“还我主权”。内容分为“开场白”“文卷箱”“公道话”“备忘录”和“呈准收回碑记”五个部分，其中“公道话”为彭桂萼以震声笔名撰写的《收回双江猛猛教堂的理论与实际》和《为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敬告国人》两文。

1937年1月16日，彭桂萼代表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参加中英两国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勘界工作，23日抵达会勘地澜沧猛梭，2月1日至3月14日受委为中国委员办事处随员追随勘界。随后对沧源设治局和耿马土司地等进行实地调查，3月25日回到双江，历时“2个月有半，行路1000余里”。在此次追随勘界和实地调查基础上，彭桂萼陆续整理发表了系列论著，翔实地反映了云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风俗、民情、教育现状等诸多方面的情形。

1938年，彭桂萼出版了重要的史志著作《西南边城缅宁》。为撰写该著，彭桂萼从1931年开始收集资料，重点参考光绪《续修顺宁府志》《云南通志·缅宁资料》和《缅宁厅乡土志》等资料，多次采访何杏农、王仲泽和王右箴等缅宁文化人获取口碑资料，加之“积年的实地观查与调查所得”，于1937年7月至12月共6个月的时间撰写而成。^⑤

1938年8月，彭桂萼主编的《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出版。该书是彭桂萼基于自己的认识，将历史学家陈碧笙于1936年9月在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的演讲内容加上自己及其他学者研究云南边地的文章合编而成。该书由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中国委员办事处委员张祖荫题词“唤醒边民”，收录了彭桂萼撰写的《从边地问题说到边地教育》《云南双江之茶叶概况》和以震声笔名撰写的《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论外国教会与边疆政教》四文。^⑥

1938年冬天，彭桂萼、邱振声等人在缅宁成立“警钟”文学社，创办了综合性刊物《警钟》，由邱振声担任社长，彭桂萼担任主编。《警钟》的办刊宗旨是研究学术，发展文化，教育民众，宣传抗战。除刊登诗歌、小说、杂文、散文、通讯等抗战文艺作品外，还刊登抗战论文、边疆研究、调查报告及作家书简、科学小品、爱国歌曲等。抗战时期，尽管《警钟》仅仅出版发行了6期，印刷数量除第5期印刷1000册外，其余每期只印刷600册，但是它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充满爱国爱乡的热忱，为云南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对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教育民众、发

① 杨宝康：《彭桂萼传》，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② 彭桂萼：《双江一瞥》，《云南省立双江简师边城丛书》，1936年，第5页。

③ 彭桂萼：《双江一瞥》，李文林序，第3页。

④ 彭桂萼：《收回双江猛猛教堂运动》，《云南省立双江简师边城丛书》，1937年，第1页。

⑤ 彭桂萼：《西南边城缅宁》，《云南省立双江简师边城丛书》，1938年，第213页。

⑥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云南省立双江简师边城丛书》，1938年，第22—55页。

展边疆文化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抗战时期云南有影响的期刊之一,在抗战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1939年4月,《边地之边地》^①出版。该著写于1937年至1938年,分为“照相机”、“意见箱”和“闲话闸”三部分。其中“照相机”兼有学术和文学的特点,是作者实地考察双江、澜沧、沧源和耿马等地的边地实录。“意见箱”收录了《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建议书》和《双澜耿沧镇五县局教育调查报告书》两文。“闲话闸”内容包括彭桂萼1937年2月、3月的日记汇编和他与双江县长李文林的21函书信往来。

此外,1937年,彭桂萼以震声的笔名发表了《勘定滇缅南段整理云南西南边务之建议》^②和《外国教会与云南西南边疆之政教》^③。1938年,彭桂萼发表了《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④。1939年,彭桂萼以震声的笔名发表了《云南西南缅宁》^⑤,实名发表了《双江的茶业》^⑥《顺镇沿边的濮曼人》^⑦和《今日滇省之西南角》^⑧等文。1940年,彭桂萼以震声的笔名发表了《耿马土司地概况》^⑨。1948年,彭桂萼在昆明《正义报》1948年10月1日、2日、4日和5日连载《耿马改县的雏议》^⑩。毫无疑问,彭桂萼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对推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研究和民族学的发展大有帮助,也奠定了其作为知名边疆民族问题专家的学术基础。1949年10月6日至12月14日,彭桂萼曾短期担任缅宁县长一职。1950年5月后担任缅宁县教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接着经代表选举和大理地委批准,彭桂萼又被选为缅宁县各族各界代表会副主任。1951年3月12日,在缅宁县减租退押运动中被错误抓捕入狱。1952年2月3日,在缅宁假暴动案中,彭桂萼被诬陷为“双澜耿联合游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而处死,享年45岁。1983年11月15日获平反。

二、彭桂萼的云南边疆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彭桂萼对云南边疆问题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边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边疆建设如何推进、如何实施边疆教育、基督教的传播及治理等诸多问题的探讨是其主要的研究成果。

针对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国民政府与民众该如何认识边疆、建设边疆,并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存在的严重问题,彭桂萼在其研究中阐释了一系列的认识和主张。在《双江一瞥》著作中,彭桂萼开宗明义,论述了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和边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认为“在这国家民族绝大危机的时代,对边疆调查研究的工作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片马、江心坡已被英帝国主义者抢去了,而班洪的警钟又震动我们悸怔的心灵,边疆问题,是何等的危急而严重呵!”他还认为,“我们觉得内地人不明边地情形不足为怪,若身居边地还不懂边情实大该愧疚”。^⑪对此,彭桂萼以云南双江县为例,从10个方面提出了“双江精神上、社会上、物质上应有的建树”:一是“行政须特定标准”。“省府对于县府,县府对于各区局,在不妨碍‘通令’当中,应给以相当的

① 彭桂萼:《边地之边地》,《云南省立双江简师边城丛书》,1939年。

② 震声:《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之建议》,《边事研究》1937年6卷第2期,第3—9页。

③ 震声:《外国教会与云南西南边疆之政教》,《边事研究》1937年6卷第4期,第23—31页。

④ 彭桂萼:《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西南边疆》1938年第3期,第82—89页。

⑤ 震声:《云南西南缅宁》,《西南边疆》1939年第5期,第70—75页。

⑥ 彭桂萼:《双江的茶业》,《西南边疆》1939年第5期,第64—69页。

⑦ 彭桂萼:《顺镇沿边的濮曼人》,《西南边疆》1939年第7期,第73—78页。

⑧ 彭桂萼:《今日滇省之西南角》,《边事研究》1939年9卷第5期,第11—13页。

⑨ 震声:《耿马土司地概况》,《西南边疆》1940年第11期,第52—66页。

⑩ 彭桂萼:《耿马改县的雏议》,《正义报》1948年10月5日。

⑪ 彭桂萼:《双江一瞥》,第3页。

通融，决不要死弹墨线。而各区局对县府，县府对省府，更应切就地方特殊需要，拟定适合当前环境的施政方案，低头多做些于民生实际有利益的工作”。二是“相处应精诚团结”。“做官的要正心诚意，抱定为民众谋福利的宗旨，接近民众，勤求民隐”，“做绅士的要正大光明，替民众解除痛苦，化除畛域，助好官谋地方建设，联人民除贪官污吏”，“做人民的要监督贪污官绅，不为所诱”，“汉夷之间更须平等互助，切勿因种族差异而歧视”。三是“促使局所健全”。“局所为地方庶政推行的枢纽，要地方百废俱兴，人民得安居乐业，自须使此办事枢纽完整健全”。四是“力谋武备充实”。“双江位居云南西南边境，以对外言，去班洪不远，为国防的第二道防线，以对内言，汉夷参半，人心嚣浮”，应“充实军备”，“使双江成为一个小可以安内里大可以固边防的县份”。五是“奠定省县教育”。“必须办到消极方面，把各苗民从迷信的宗教教育与麻醉的侵略教育中夺了回来，施以中国化的现代化的新教育。积极方面，使各民族受了公民、健康、生产、科学等教育以后，能够认清时代潮流，具有爱国观念。”六是“扫除库猛瘴毒”。“猛库、猛猛，一处产茶销遍全省，一处产米供应全县”，“惜乎瘴疠横生”，“双江官绅民众，应视扫除库猛瘴毒作最大工作”。七是“开发天然富源”。“中国地大物博，然而多数民众仍嚷饥号寒，流离颠沛”，“双江的情形，正复类是”。“财源处处皆是，惟看吾人能否开发利用而已”。八是“完成各地交通”。“道路通达而邮政畅行，则地方繁荣”，“欲谋建树，则交通的完成，实为急务之一”。九是“改进生产方法”。双江的“生产工具，每粗简陋劣，生产方法亦墨守成规”，应“予以指导倡率，陆续改进”，“将来再能利用科学方法，采用机械，则年丰岁稔，可以预期”。十是“革新生活方式”。“双江居民的生活，简朴的条件固然具有，而整洁安适即说不上”，应在衣食住用等“一一给以革新”。^①

在《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一文中，彭桂萼论述了边疆建设的重要性并探讨了云南西南边疆问题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资政意义。他认为“边疆为内地门户，国防咽喉，与国家民族的生命精神，有是皮之与毛，关系异常密切！但因从前朝野人士均视同化外，少加注意，以致喘延至今，尚蛮烟瘴雨，荒凉空虚，然正因其地位綦重，设施陋劣，故其迫于建设，远在内地以上”。“目前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实大有无所保障之感，有世外桃源之风的缅甸、云县、景东、景谷、澜沧、双江、耿马、镇康各县局历遭土匪烧杀抢掠，使居民寝不安枕，食不甘味。”“边民的生活既失保障，要政的推行更动遭滞碍，实在是云南西南沿边的隐忧巨患。”“我们在身受蹂躏之余，而求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得要三端：第一，因边地民性，多喜远道经商，平时骡马成帮，疏通供求，幸而生意兴隆，即骤成富翁，跃为权贵；不幸而骡马病故，事业破产，即铤而走险，称霸绿林。且内地失业犯事之辈，亦多匿迹其间。第二，因各边县局枪弹缺乏，实力不充，即使遇了有为的官吏，亦苦于赤手空拳，徒唤奈何。第三，因西南各县局距腾冲、普洱两督署均在10站以外，以山脉的绵亘，交通的阻滞，再加以公文往返的迟延，每次发生紧急事变，督署的独立营虽疲于奔命，而赶到后匪已扰毕远扬，致人民只有供给饷粮的麻烦，未受乐业安居的实惠。”对此，彭桂萼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具体办法，即“莫若于相当地点，增置一总揽西南角各县局军民等政的较高级机关，而此机关的设立，似以缅甸为较适宜”，并期望“果能现诸实际，则上可以分省府后顾之忧，中可与腾冲、普洱两督署收联络之效，下可以督促散漫的各县庶政日进于坦途。消极方面，使云县、缅甸、双江、耿马、景谷、澜沧、镇康的治安得以保障，积极方面，有耿马、孟定、沧源等区局作建设开发的对象。地方安宁，就是国家的幸福”。^②

在《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之建议》一文中，彭桂萼指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

① 彭桂萼：《双江一瞥》，第161—168页。

②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第22—25页。

“缅宁、双江、耿马、镇康、沧源、景谷、澜沧、孟连诸县局又处云南之西南极边，实国防之要冲，关系綦重不待言。勘划界务虽为治边之起码基本工作，而欲其长治久安，实有待于继续作进一步之建设与整理”。根据云南西南边疆的现状和需要，彭桂萼对如何建设云南西南边疆从政治、军事、文化、垦殖等方面提出了12条具体建议：一是“增设殖边大员”；二是“提高沧源政治地位”；三是“划西南边县为特别区”；四是“驻重兵于沧源”；五是“就猛猛、孟定、猛董、孟连辟飞机场”；六是“充实各县局军备”；七是“表彰拓边诸先贤”；八是“增设省立学校”；九是“设立电台，扩充邮路”；十是“开辟十字线公路”；十一是“兴办各地矿产”；十二是“移民垦荒”。^①

关于对边疆问题和边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彭桂萼在《从边地问题说到边地教育》一文中指出：“边地问题是目前中国各种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这里有来自帝国主义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侵略，而“教育能调和情思，启发识见，增进团结，储养人才，可说是边疆建设急务中的根本大业！”“边地教育，是边地问题中应首先给以解决建树的。”关于如何实施好边疆教育的问题，彭桂萼主张“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地来设法想方”，提出了8项原则和途径：一是“要先施以语文教育供给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使他们对国语国文能看、读、写、作、说”；二是“要施以公民教育，晓以世界轮廓、国家情况、过去光荣、未来趋势，以激起爱护祖国的信念”；三是“要多办分校与巡回学校”，方便学生就学，“把校址校舍充分活用”，“使学校编制充分变通”；四是“要施以科学教育，潜移默化，以扭转其宇宙观与人生观”；五是“要施以健康教育，使他们能清洁卫生，防疫免病”；六是要“施以生产教育，使他们能利用天然的富源，以供物质生活之需”；七是要“给以实惠，施以供费教育，以收其心，以济其困”；八是要“施以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使他们随时随地都受到教育空气的熏陶，不知不觉间追上新时代的大辇”。^②

1937年春天，彭桂萼“行路1000余里”，对双江县、澜沧县、耿马土司地、沧源设治局和镇康县的社会环境、教育现状等进行了深入调查，于1937年6月撰写了《双澜耿沧镇五县局教育调查报告书》，对双澜耿沧镇五县局司的教育问题提出了综合改进的12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镇康学区有更划的必要；第二，修建各省校校舍；第三，各省小应酌办师训及分校；第四，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应酌由各县局选送；第五，变通各省校领款手续；第六，专设区教育委员并严密县教育行政组织；第七，整理学款尽量宽筹；第八，学校配置须酌使均衡，使人民的教育机会均等；第九，厉行强迫就学，酌采变则编制；第十，充实县师设备，促进师资进修；第十一，注重民众教育，使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相得益彰；第十二，取缔教会侵略，须一面改善本国政教，杜绝边民外向之心，一面限制教会，以遏抑其文化侵略，始足以固边防而消隐患。彭桂萼给云南省教育厅提出的边疆教育建议，契合云南地方政府推广边疆教育的基本宗旨和改革方向。《双澜耿沧镇五县局教育调查报告书》呈报云南省教育厅后，省教育厅“通令有关各县局校查照施行”。^③

关于基督教的传播影响及治理，彭桂萼也有比较理性的认识。1936年秋，彭桂萼在《论外国教会与边疆政教》一文中指出，“由沿海商埠而内地城镇，由平门津沪至万里蛮荒，不有他们牧师传教踪迹的地方，可以说找不出来。单就云南西南边县双江、澜沧、车里三县而论，教堂学校竟达二百余处，而入教者竟达到三万人”。 “帝国主义者的御用阶级僧侣牧师，平居除收买人心外，复调查物产与险要，使其本国政府生阅报告而透悉边情，至是复干预民刑，左右政务，使教民与非教民间纠纷丛出”，“于是万里边荒即有改变颜色的危险”。他认为，“耶稣教在边疆著效能如此

① 震声：《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之建议》，第3—9页。

②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第31—37页。

③ 彭桂萼：《边地之边地》，第164页。

的一日千里，根本原因实由边庭的政教不行有以致之”。如“在教育上，对有文字的古宗、摆夷等既不能因势利导，予以改良，对无文字的粟粟、卡瓦、老亢、野人、傥黑等更不加问闻”，而僧侣牧师“竟能深入其群，就其语音制出文字，循循施以诱导，指识饥荒易受感化的夷民，那还不陷入迷魂阵，弄得神智昏沉？”彭桂萼接着提出，“亡羊可以补牢，失东隅可以收桑榆”，“政治方面，政府当局应下最大之决心，以大量的人力财力贯注于开发边疆，设治改流。边地官吏更应正心诚意，为民众除弊兴利，图谋幸福”，“教育方面，行政机关应均齐应顾从内地而推至沿边，负责人员应切实努力，由原人的识字运动以推达近代的科学文明”。“此外原有的教堂，如双江猛猛以不合法手续估占侵用者，应立予收回，如车里新加推广增置者应严加取缔。这样，政教齐举，标本兼施，自身的营垒既坚，外力的侵攘自熄，边疆的严密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均可操券而得了。”^①

彭桂萼在《收回双江猛猛教堂的理论与实际》一文中指出：“耶稣教是资本帝国主义差来的苏秦！只要有帝国主义的洪流侵入的地方，都有耶稣教徒的踪迹”，“建筑教堂，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是他们的法定工作；而收买人心，麻醉群众，调查实况，报告消息，便是他们的唯一使命。开口上帝，闭口救主，拆穿了西洋镜，所谓宣传博爱主义的牧师们都是带有十足的侵略主义的色彩”。他提出，“我们要抑制资本帝国主义的洪流”，“消极方面，应该把现有的教会教堂加以一度彻底检查，有以不合法手续侵越的须给以根本的取缔”；“积极方面，应该把我们的政教设施迅速建立起规模，使我们的民心再不会为一般牧师教徒所牵移”。接着，彭桂萼介绍了基督教在双江的传播情况，“双江有牧师传教的踪迹快已有30年的历史，美国浸信会牧师永伟里永文生父子以猛猛教堂为大本营，凭着政府的坚定信任与优越待遇，由于他们的巡回教学与苦口婆心，已经征服了数千教民的心，已经使傥黑、卡瓦两民族心悦诚服地变成了他们忠顺的奴隶”。然而，“他们的大本营双江猛猛教堂的土地取用并没有依照合法的手续”：其一，猛猛教堂建盖于1925年间，是时猛猛土司罕富文早因案革职，猛猛土司地已划归缅甸分县四排山县佐所管辖。永牧师等欲使用全县公地建盖教堂，未向汉官商洽同意而向革职土司罕富文之叔罕华堂接洽，强强动手划地建屋，自由行动。其二，永牧师未经“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即“自行建造”起“房屋”来，而且历经双江县长方际熙、黄源静、丁保琛诸任交涉，呈奉外交部驻滇办事处及美国领事署核办，饬其交验“契约”均尽不见交验，更说不到“会同呈报该管官署核准”了，未免有意破坏中国法令。其三，继永牧师后的普光谦牧师1929年时又在原教堂地面上端添建一大间房屋，侵越土地在数十方丈之多。经过数次交涉，普牧师虽愿“拆屋归地”，而延悬数年屋未拆而地亦未归。所以，彭桂萼建议，“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是依法依理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而在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时，“手续上，应由双江县府遵省政府通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1936年9月17日发布的《云南省政府训令》），转达美国浸信会住糯福牧师永文生按照各种法定手续，自行前来登记。如过期不履行登记，或虽登记而有违犯各种规约情形，则双江应即行收回，以结悬案”。“条件上，教堂尚有可用房屋三间，应由双江按现时市价补清教会；而教会十余年来未纳之租金，应由房价中照数抵偿双江。”同时，猛猛教堂所在地“宽阔开展，平整高洁，空气、日光、饮料、卫生诸件无不得全坝之秀，故收回后不宜弃置，须给以最适当的使用”，“最好即于收回教堂所在地后，拨作省立双师固定校址，以奠定边教根基”。^② 时任双江县县长兼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校长的李文林曾经公正评价：“最初发现具有收回之可能性者，本校教员兼编辑主任缅甸彭桂萼也”。更为重要的是，彭桂萼的建议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1936年9月17日发布的《云南省政府训令》基本理念一致，

①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第38—41页。

② 彭桂萼：《收回双江猛猛教堂运动》，第31—37页。

可谓相得益彰,因此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滇办事处和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采纳,1937年9月4日,“奉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滇办事处明令,准如所请,收回作省立双师校址”。^①

三、彭桂萼的云南民族研究

彭桂萼的云南民族研究涉及的民族,主要有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

彭桂萼的《双江一瞥》认为:“云南种族的复杂为全国冠,单就双江一县而观查,亦足证这话是确切的。这里有汉人,有摆夷,有傣黑,有卡瓦,有濮曼,有蒙化子,五花八门,各色俱备。”“汉人约占全县人数的1/2”,“摆夷约占各苗民总数的1/3上下”,“傣黑为原有土著民族之一,数量约占各苗民的1/3以上”,“卡瓦为野人之一,有纯野之分,在本县者概为纯瓦,住居历史很久,数目约占2/6以下”,“濮蛮亦有统称之为野人者,数目次于卡瓦而多于蒙化子”,“蒙化子在各种苗民中人最少,约共二三百家”。^②他主张“汉夷之间须平等互助,切勿因种族差异而歧视”^③,进而指出“傣黑、卡瓦的刻苦耐劳,摆夷濮蛮的温柔和平,蒙化子的合群互助,汉人的清洁机警,最好能互相观摩化合,去各族所短而取各族所长,熔为一炉,交勉励进。至于摆夷的田土共有,婚姻自由,更值得各民族尤其是懂法理、重礼教的汉民的仿效”。^④彭桂萼对云南双江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时人了解各少数民族提供了翔实参考,更为后人从事上述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一文,简明扼要介绍云南緬宁、双江、澜沧及耿马土司地、沧源设治局的情形。彭桂萼认为:“緬宁的汉人占十分之八,摆夷、傣黑、蒙化子、濮蛮、迷利等种占十分之二,生活习性多已同化于汉民,颇能精诚合作,无种族之隔膜。”澜沧“最多的为卡瓦,分纯野二种,种旱谷、猎人头,披发裸身”;“次多为傣黑,种洋烟,食杂粮,有黄傣黑与大傣黑之分,一切较卡瓦稍进步”;“再次为摆夷,有水旱二种,坝居耕田,优秀开化,甲于各夷民,尤以孟连、猛梭一带者为白皙聪俊。此外尚有阿卡、濮蛮、老亢、老緬、栗栗等夷族,生活各殊,风习亦异”;“耿马有摆夷省会之称,聚居各坝,种田营生。卡瓦、傣黑亦占多数,其他种族如濮蛮、崩竜、栗栗、回民、苗子、老亢、蒙化子等,则为数不少,均散居山崖水畔,营种植杂粮,牧养牲畜等生活”;沧源“种族以卡瓦最多,聚居于岩帅、蛮海、永和、班洪各山头,种鸦片及早谷,强悍耐劳,好猎人头,喜劫掠,颇多崇信永氏耶教者;次为摆夷,居猛角董两坝,农耕为业,保守成性,其土司尚有相当权势;傣黑散居各山;汉人极少,仅岩帅、猛角董略有小部分而已”;镇康“有汉人、摆夷、本人、栗栗、傣黑、崩竜、山头等”。^⑤

彭桂萼在《顺镇沿边的濮曼人》一文中指出,“云南本来有人种博览会之称,尤其是它的西南边疆,更是夷民生息的渊藪,族类的繁多,名目的分歧,虽然经了很多人的研究调查,都还没有得出一个确当的数目或答案。濮曼人,便是这么‘诸色人等’中的一种”。就分布而言,濮曼人“差不多自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江心坡起,沿腾龙、顺镇、思普诸边区而下,至澜沧入緬越近边的关木止都有”。从族源上说,“在云南没有开化以前,濮曼人是云南的重要的土著夷民之一,就目前估计,他们的人口至少总还不下数万”。“在民族分类中,有的把他们归在瓦崩竜群里,有的

①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934页。

② 彭桂萼:《双江一瞥》,第33—38页。

③ 彭桂萼:《双江一瞥》,第162页。

④ 彭桂萼:《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第82—89页。

⑤ 彭桂萼:《西南极边六县局概况》,第82—89页。

归在藏缅族里，也有的归在泰掸族里”，“说他们是受泰化甚深而比较进步的瓦崩族，怕是更适当些”。“在莽莽的边荒”摆夷居住的坝子和卡瓦、傛黑居住的高山箐深“这两者之间，瘴毒影响不到，比平坝高超些的山崖水畔，躲在万竹帚天中的，那就是濮曼人的村落了”。“他们的村落，常由数十家，百家多蚁聚而成。周遭护有荫茂披纷的茨城或树棚，出入的总口上，也构成坚固的岗隘，那是防野兽或敌人的袭击的。在村落或村旁，都落有一业参天拔地的古木，叫做龙树林，是他们的神祇所寄托的处所，有时也就便作公墓地，每年总有一两次庄殿隆重的公祭，祭时不准生客通过。”^①此外，该文的内容还涉及濮曼人的住屋、服饰、饮食、婚姻、节日、宗教、疾病与治疗、丧葬习俗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彭桂萼对顺镇沿边濮曼人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时人认识、了解濮曼人提供了翔实参考，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布朗族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借鉴，为后来者研究布朗族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料，也是我国布朗族研究的开篇之作。

彭桂萼的《耿马土司地概况》对傣族的研究细致而全面，涉及傣族的分布、支系、衣食住行、婚姻、宗教、丧葬等内容，认为“摆夷属泰掸民族，北印度支那半岛，即滇西南、越西北、暹北部、缅东部，均为其广大分布地，有水摆夷与旱摆夷之分。在外形上，水摆夷男人留长发，女人桶裙不用带束，肤色较白皙，如车里及孟连勐梭一带的，即多属此种。分布于耿马的，则与双江猛猛、澜沧猛允、沧源猛董者同为旱摆夷”。衣食住行方面，“衣饰，男子多如汉人，包头巾或戴头套，案青黑普通对襟衣，家资好的着鞋袜，一般则赤足。所用布匹，除洋货及细软外，由纺织以至染缝，都全由自力制造。男子每于胸背腿臂诸部，纹刺花鸟兽形、文字等图案，涅以黑色，女子则又喜染牙齿成漆黑，以为成年的特别标识”；“饮食喜糯米及酸冷，早餐极早，晚餐常在黄昏后，日间随饿随食，听各人自由，菜蔬仅略以牛干巴及酸腌菜佐膳而已，食后辄嚼槟榔、烟叶、石灰、芦子等之混合物，染得满口血红”；“他们的住屋，耿马、猛撒、猛永三土城里，多汉式的瓦房，土司贵族的官署别墅私邸，更是金光灿烂，画栋雕梁，有如帝王的金銮宝殿。仍保持着本来面目的民房，则多属地鸡笼，遮哈、猛简两处，也有高耸的楼盖房，这些都是以草片竹木构成，三面抽陡厦，由村邻互助建筑的。屋内空洞，常以竹篱隔为二部，内为卧室，外为火房食堂兼客厅，火塘设在中央”；“不管男女老幼，都好作冷水浴，青年妇女，一天几乎有半天泡在水中，上身赤露着接见生客，亦不以为羞”。婚姻关系方面，“大概他们因住居亚热地带，男女交际又极端自由，故性的发育成熟，比汉人要早得多”。^②彭桂萼的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对耿马傣族有了更为详细的了解。

四、彭桂萼云南边疆民族研究的特点

彭桂萼云南边疆民族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特点之一。如《双江一瞥》著作的资料来源，除了彭伯常编纂的《云南通志·双江征集资料》和县府一二十捆陈文旧卷而外，主要“是自己的观查与探究”和杨星辉、李寄柏提供的口碑资料。^③所以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龚自知在1936年9月1日给彭桂萼《双江一瞥》写的序中评价该著“参稽故纸，亲历实地之所得，条贯分明，记述翔实”。^④所以这种研究成果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时代的真实特征。

① 彭桂萼：《顺镇沿边的濮曼人》，第73—78页。

② 震声：《耿马土司地概况》，第52—66页。

③ 彭桂萼：《双江一瞥》，第169页。

④ 彭桂萼：《双江一瞥》龚自知序，第8页。

其二，以“经世致用”之道钻研边疆民族问题，力求让研究“以作实施政教的参考”^①，是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另一个特点。如彭桂萼在《收回双江猛猛教堂的理论与实际》中认为，“我们要抑制资本帝国主义的洪流”，“消极方面，应该把现有的教会教堂加以一度彻底检查，有以不合法手续侵越的须给以根本的取缔”；“积极方面，应该把我们的政教设施迅速建立起规模，使我们的民心再不会为一般牧师教徒所牵移”。鉴于“双江猛猛教堂的土地取用并没有依照合法的手续”，永牧师未经“地方官查明地契，妥当盖印”即“自行建造”起“房屋”来。因此，“收回双江猛猛教堂是依法依理都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了”。由于猛猛教堂所在地“宽阔开展，平整高洁，空气、日光、饮料、卫生诸件无不得全坝之秀”，所以建议“最好即于收回教堂所在地后，拨作省立双师固定校址，以奠定边教根基”。^② 他的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滇办事处和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采纳。

其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超前的预见性，是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再一个特点。就思想性而言，彭桂萼的研究绝不停留在一般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注意对现象的深入分析。如他在《论外国教会与边疆政教》一文中分析，“云南西南边县双江、澜沧、车里三县”的“教堂学校竟达二百余处，而入教者竟达到三万人”，“根本原因实由边庭的政教不行有以致之”，解决的办法是“以大量的人力财力贯注于开发边疆”，“行政机关应均齐应顾从内地而推至沿边”，“政教齐举，标本兼施”。^③ 应当说，这种分析认识在当时是深刻的。就预见性而言，彭桂萼对边疆的开发与发展确有远见。如在《论云南西南沿边的治安及建设》一文中，彭桂萼认为“边民的生活既失保障，要政的推行更动遭滞碍，实在是云南西南沿边的隐忧巨患”，“西南各县局距腾冲、普洱两督署均在10站以外”，“致人民只有供给饷粮的麻烦，未受乐业安居的实惠”。因此提出了“莫若于相当地点，增置一总揽西南角各县局军民等政的较高级机关，而此机关的设立，似以缅甸为较适宜”的建议，并期望“果能现诸实际，则上可以分省府后顾之忧，中可与腾冲、普洱两督署收联络之效，下可以督促散漫的各县庶政日进于坦途”。^④ 1952年，缅甸专区成立，现为地级临沧市，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连通印度洋的重要节点，不仅是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之一，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之一，彭桂萼研究云南边疆民族的预见性可见一斑。再如在《耿马改县的雏议》一文中指出“土司制度为封建专制政治的遗迹，衡以民主的建国精神大相悖谬，而且处在强邻四伏的今日，羈縻怀柔，也绝不是治边的正道”，“处在国家多故，滇缅关系加深，治安与禁烟成为严重问题的当前，对此毗邻缅甸的国防前哨耿马，应如何急加建设整理开发，实为本省行政中的一个迫切的课题”，提出了耿马“设治既早发端，便须照政府法令，参酌地方特情，研定步骤，加速努力，奠定根基，完成县治”的建议，进而强调“必须充分予以把握和解决的三个先决的基本问题”：即土司的安置、边民的优待和官吏的慎选问题。^⑤ 由此可见，彭桂萼对云南边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高瞻远瞩，在思想性和预见性方面确实高人一筹。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彭桂萼：《双江一瞥》，第4页。

② 彭桂萼：《收回双江猛猛教堂运动》，第31—37页。

③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第38—41页。

④ 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第22—25页。

⑤ 彭桂萼：《耿马改县的雏议》，《正义报》1948年10月5日。

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构研究

——以临沧佤族为例

杨逸平

(临沧市社科联, 云南 临沧 677099)

摘要: 调查摸清佤族传统文化资源, 研究分析《司岗里》史诗的人类学价值、沧源崖画中的部落文化史、剽牛与佤族盟誓文化、佤王宴中的自然生态观、佤族歌舞音乐语言中的知识表达等标志性佤族文化的民族特征, 可以充分体现独具特色和魅力的佤族仪式、传统文化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佤族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思想行为教育等佤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与个性所在, 体现佤族文化软实力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应通过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做深做实做高节日文化、实施开放性佤文化人才战略等举措, 让优秀的佤族传统文化资源真正走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轨道, 为重新构建佤文化的时代价值, 探索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和智慧, 为临沧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样性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弘扬, 提供正确有效的决策方向和工作模式。

关键词: 中国佤族; 传统文化; 价值重构

中图分类号: D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41-09

一、基本情况

佤族, 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全中国仅有临沧沧源和普洱西盟两个自治县。据《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佤族卷》介绍, 截至2010年底, 共有佤族42.9万人。临沧沧源有179098人, 另分布在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45800人,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10000多人, 凤庆县德思里佤族彝族乡600多人, 镇康县军赛佤族拉祜族傣族德昂族乡1573人, 耿马县四排山乡132600人, 双江县沙河乡7030人, 永德县德党镇14773人。

佤族是个很古老的民族, 散居在贵州、四川、云南广大地区。公元前1066年, 武王伐纣, 中西南八个方国出征参战, 其中就有“濮人”。云南著名民族史专家方国瑜教授认为, “濮即为佤族的先民”。^①佤族可分为“巴饶克”“阿佤”“佤”3个支系^②。20世纪80年代末有约100万人, 其

作者简介: 杨逸平, 临沧市社科联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跨境区域民族宗教研究。

① 《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佤族卷》,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 第2页。

② 《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佤族卷》, 第283页。

③ 魏德明(尼嘎): 《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德宏: 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9年, 第9页。

④ 魏德明(尼嘎): 《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第10页。

中中国 35 万人，缅甸 60 万人，泰国、老挝约 3 至 5 万人。^③生活在临沧市沧源、双江、耿马一带的佤族自称“巴饶”，意思是“种旱谷地的人，住在山上的人”。魏德明认为，构成佤族文化的三大要素是旱地精神文化、梅依格神信仰文化、司岗里神话文化。他指出，“旱地农业是佤族神话、宗教文化赖以产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司岗里神话是佤族生活经验和民族生存经历的反思，宗教活动的理论依据，梅依格是佤族神灵界的代表”^④。这可以作为佤族历史文化溯源的基本信息依据。

1934 年成立的沧源设治局，治所在岩帅镇，属今沧源县。1944 年分设 6 个乡镇，由当地民族出任正副乡长和保甲长。1945 年 5 月，解放今县城勐董之后取缔设治局，1949 年 4 月成立沧源县临时人民政府，1952 年 11 月 21 日经政务院批准设沧源县，政府所在地仍是岩帅镇，隶属普洱专区。1952 年之后划归当时的缅宁（临沧）专区，1964 年设立沧源佤族自治县。佤族在临沧是仅次于彝族的第二大主体少数民族。2018 年统计，临沧佤族为 242735 人。千百年来创造并传承、弘扬着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支撑和维系着佤族社会在漫长历史中的自立、自信和自强。譬如被人们常在歌中唱到的“江三木落”一词，佤族人的意思是像秤一样公平的人，是潜在于阿佤人民心目中的“阿瓦理”，包括各种道德规范、日常礼节、族群信仰、禁忌规矩等等，从小耳濡目染，自觉维持着人与人之间、村寨与村寨之间，甚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和正义，若有违背会被处罚道歉、赔偿、洗寨子或被逐出村寨，早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民族法治文化，以规范佤族社会。又譬如 1934 年 1 月，在缅英军侵占了我国境内的班老银矿，班洪总王胡玉山召集佤山北王鏢牛盟誓，群起抗击英国侵略者，保家卫国，直到 1961 年 6 月 4 日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之后，沧源正式接管班洪班老地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便是传统的民族“盟誓文化”，以神圣的方式唤醒和凝聚起族群全体人民的国家观、民族观和领土的尊严感。还譬如“万物有灵”的原始生态思想哲学理念，能让人们从小就懂得人与动植物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整体，大家要相互尊重、和谐相处，长此以往。开春之时家家户户“抢新水”，相信水神会保佑丰收，相信“谷魂、棉魂”的存在而不准玷污和挥霍；砍了木鼓树之后要在树根上覆盖土和树枝以表达歉意，祝福生命再生，并通过很多次的礼仪活动才做成一对“木鼓夫妻”，相信可以通过它们代表族人与天地对话等等。“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①佤族通过千古不衰的神灵崇拜、自然崇拜行为表达着宇宙观、生态观、历史观、民族观、价值观、人生观、国家观以及民族的传统教育理念、民族团结理念以及生产生活常识，是一部尚未形成文字的佤族世界观和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后，佤族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弘扬，通过民族民间的节庆活动获得了生机和活力。例如在临沧，“翁丁文化村”揭示的佤族部落文化，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民族歌舞《阿佤人》为标志的音乐歌舞文化，以“司岗里狂欢节”为典范的节庆文化，以及歌曲《打歌来》《月亮升起来》，舞蹈《薷秧舞》《播种舞》《舂碓舞》，美术《取新火》，书籍《司岗里传说》《沧源崖画》《班洪抗英斗争纪实》《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佤族卷》等等文化载体和表现形式，都在为努力地讲好临沧佤族的故事，发出临沧佤族的声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正如同临沧凤庆香竹箐那株种了三千二百多年的老茶树仅仅作为“自然博物馆中的一个陈列品”静静地活着一样，人们并未挖掘出其内在和外化的文化特征与个性，使之能“全面立体真实”地讲述它背后的故事而获得世界性，在临沧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中产生文化品牌的力量。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像佤族这种历史上没有自己文字记录的传统文 化，是一个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的，内涵极其深远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宝库。一点点不起眼的文化符号，就有可能承载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经

^① 肖君华：《梦想从学习开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的重要论述》，《光明日报》2016 年 7 月 7 日，第 1 版。

验、智慧、情感，代表着佤族优秀的精神基因和价值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①“一个故事胜过一个大道理。”善于通过故事传播理念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华文化不只是舞个狮子、包个饺子、耍套功夫，我们不能满足于提供表层文化符号，关键是要把优秀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②在新的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通过文化交流使得民心相通。

新的时代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工作模式，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价值重构，需要充分利用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去应对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二、佤族传统文化标识符号

佤族，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为历史上本民族没有文字，这些遗存的内在真实一直流动在本民族的口传身授之中。因此，我们今天所能见到和听到的每一项遗产都很珍贵。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本民族文化生境的改变，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功能性、习得性、共有性、稳定性、完整性这些基本特性难免受影响而发生改变。形成和保护具有真实特质和个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推动这些符号复活形成品牌的工作，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紧迫性和艰苦性。有的传统文化没有得到抢救性地保护发掘，打造成为标志性的品牌，而仅满足于浅表性地复制甚至非本源性地创新，这就使其失去了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距民族性和世界性越来越远。例如傣族泼水节，该节日在傣族中是一个历法节日，即阴阳合历的傣历太阳年的节日。傣历是通过很复杂的规矩推演而成，与汉族农历不同。太阳在黄道上进入白羊宫宫首到下一次到达时为一年，岁首不固定在初一或其他日子，每年后推十一天，而且总是在六月六日与七月六日之间推移。新旧年交替时，傣族以泼水节为标志来送旧迎新，活动三至四天，包括除夕日、空日，最后一天为傣历岁首。为祈求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六畜平安，傣家人借机进行赆白象、赆经书、堆沙、滴水等对佛的奉献活动。我们今天把它开发成了纯粹的“泼水”活动，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完全失去了民族节日的仪式感，找不到其中内涵的主体文化元素。又如佤族的木鼓，佤族学者魏德明的《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于希谦的《中国南方古文化与地域社区生活》^③等研究资料说明，木鼓在佤族中不知产生于何时，传说是女神婢奴姆创造的，代表着母亲，木鼓祭并非祭木鼓，而是祭女神，传达“司岗里生葫芦里来”的创世理念，所以旧社会才会砍人头来献祭。关于献祭人头的的原因，一种传说是某年遇上大灾，人死畜亡，谷子长不好，用各种野兽的头来祭没有效果，用了人头才免除了灾祸。另一种说法是为严禁族群中发生婚外情和乱伦的事件而祭鼓警示。还有说法认为是刀耕火种招来自然灾害，以为得罪了保护神“梅依吉”，便砍头祭鼓，也从此养成了轮耕轮歇的制度，进而延伸出一年两次祭祀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9月2日，第4版。

③ 于希谦：《中国南方鼓文化与地域社区生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团独”即树神的活动。木鼓祭以丰富的想象和生动务实的态度巩固着“万物有灵”的传统思想理念，所以木鼓更多地标志着被人敬畏的保护之神、生命之神。木鼓祭很讲究民族传统规约上的礼仪感，是中华民族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基因特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神器、礼器、祭器、乐器”的认识并非佤族木鼓的终结。举以上例子的目的在于打造佤族传统文化品牌，不仅要站在中国佤族的根基之上，始终展现自己鲜明的立场和个性，同时也要站在南亚东南亚佤文化脉流的历史基因认同之上，才能取得品牌的支撑力，唤起全世界百万佤族同胞的历史共鸣和时代呼应，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中证明自己也丰富充实自己，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临沧佤文化的传承和转化发展也许正好相反，缺少的是像抓经济那样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模式，去挖掘和发现佤族传统文化资源中深层的核心内涵。笔者认为，临沧佤文化的品牌设计和主打方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岗里》史诗的人类学价值

《司岗里》史诗是佤族后人根据口传历史整理的唯一的佤族人类学经典，神话传说与族源故事丰富动人，集中了佤族对宇宙的认识和想象；民族从北向南迁徙的史实；佤族与同语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原始宗教文化的产生和民族思想信仰体系的形成；山地农耕文明的创造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昆明滇池湖到大理洱海湖，^①再沿澜沧江流域走向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的族源历史等等，为佤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脉流途径和族群社会研究空间。历史上佤族迁徙融合的过程，产生了“不管说什么语言，穿什么衣服，都是从葫芦里走出的兄弟姐妹，有地大家种有肉大家吃”这种朴素但很高尚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譬如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使用同一语族语言的民族，认同共有的茶的祖先叫“岩楞和亚楞”，是临沧这块土地上古老的茶的民族。祖先临死时用最普通的话语告诉后人一个“大道理”，说“金银财宝总有一天会花干用尽，猪鸡牛羊也会被杀光吃光，只有茶树，子子孙孙采不完用不尽”。又如，普洱是佤族祖先们住过的地方，普洱地名就是佤族对布朗族的称呼：“布日、布耳。”佤族还传说景谷、磨黑的盐井是佤族的女王叶京创建的，盐井旁的崖石上一直有她生殖的画像（这一信息与沧源崖画和母木鼓制作所蕴涵的信息均可理解为有渊源关系）。《佤族文化大观》记载，包括佤族在内的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原出自中国西南部，形体特征是头型广、眼型不斜、肤色稍暗、发行如波状，是蒙古利亚种的一支和猛族、矮黑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混合而成的。早在先秦时期就是云南的“濮人”，公元2000年前就已经足迹遍布中印半岛，缅甸掸邦的掸族至今还在流传“神创造天堂，拉佤创造人间”的民谚。从我国西汉的“濮蛮”到唐代的“望蛮”“朴子蛮”“望苴子蛮”，再到元代的“生蒲”“熟蒲”，又到明清的“古刺”“卡佤”“哈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族群的相互认同，佤族的发展变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刻留在“石佛洞文化遗址”“沧源崖画”“孟定佤族城遗址”“翁丁文化村”中的文化信息，以及澜沧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沿岸民族迁徙定居的足迹，都在一一印证《司岗里》史诗中关于族源历史的历程，是无文字历史民族的文化史诗经典。

（二）“沧源崖画”中的部落文化史

在南碧河“石佛洞文化遗址”所在大片区域之内，在沧源的勐省、勐来、糯良大片区域内，分布着十五个崖画点，是云南地区独立文化类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它们从1965年开始到2000年陆续被发现，共有图案1100多个，反映狩猎、采集、牧畜、村落等内容。经云南的专家考古测定，崖画成于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用赤铁矿粉和动物血做颜料绘制。永德永康地区忙况崖画、红岩崖画，都被测定为与沧源崖画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至今，人们对于崖画的认知仍

^① 王学兵：《司岗里传说》，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90—93页。

停留在专家考古测定的结论之上，未能从新石器前后时期，佤族、彝族、布朗族、拉祜族等土著少数民族迁徙定居、开辟发展的人类历史背景中去解读“崖画”文化符号。很难相信佤族先民会无故跑到山里进行作画，这些崖画可能是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记述历史，标记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传达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构建，类似于“结绳记事”“木雕”“岩画”“纺织”等现象，是佤族代替文字的文化标识体系。杨兆麟在《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神和祈愿》一书中介绍了佤族木雕文化的研究成果。^①如佤族称为“考司岗”的“Y”形寨桩，象征了祖先和寨子的心脏所在。糯良的佤族一年要立一次寨桩，提醒族群其所属的血缘关系。寨桩和寨桩上的木雕饰有日月星辰、葫芦、鸟兽、船、人、瓜果以及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图案，这些图案也出现在房屋的博风板和纺织品上，标识佤族先民很早便有了对天地自然的认知。在“沧源崖画”上就有6个一排的“Y”形桩。至今，各村寨在春节前后都要对寨桩组织公共性祭祀，把畜肉和血放在寨桩根的木槽之内，由老人执“Y”形权杖进行祈祷，誓言守护这方水土，爱这个民族，敬畏一寨之根，然后男女老少围着寨桩唱歌起舞，庆贺山寨的平安和幸福。如沧源翁丁寨子，从寨门开始，寨桩、木鼓房、部落首领的大房子，各种祭祀木雕、工坊、人头桩、神林一应俱全，让人们生活在佤族传统文化的氛围当中，从小耳濡目染，不断地在内心深处复活民族文化的血脉基因，懂得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的故事和声音。因而在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不同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的碰撞交流之中，获得延续民族文化的经验和智慧。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器以载物，器以藏道”，看似原始粗糙的器物正“诉说”和透射着古老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只有深入地挖掘溯源让其复活发声，才能推动佤族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三）膘牛与佤族盟誓文化

佤族有膘牛和砍牛两种习俗。膘牛功用于庆贺、接福、结盟、吉祥，砍牛则是驱邪、送鬼、祈祷免灾。膘牛由巴猜主持，全寨参与，沿时三天，第一天栽牛头桩，祭祀“尔爷格门”神，祈求保佑。第二天膘牛，请客喝酒，唱歌跳舞。第三天送客，打扫卫生。全过程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

膘牛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确切记载。西盟地区多用水牛，沧源地区水牛黄牛都用，结束以后要把牛头股悬挂在村寨的公共场合，象征吉祥永久。笔者经过研究认为这跟“姆依吉”保护神有关。“姆依吉”神是佤族关于人类起源说即“司岗里”史诗的源头。传说天神创造生灵，并命善良的姆依吉保护。天神造了一个木仓，把姆依吉和一头花母牛装在一起，放在大地上的洪水中任其漂流。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洪水退了，姆依吉神打开木仓，杀掉了花母牛，从她的肚子里取到一粒种子种下，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长出一个大葫芦，姆依吉想了很多办法才把葫芦打开，于是，佤族从中走了出来，接着走出来的是布朗族、德昂族，最后是汉族。不止佤德语支民族有葫芦造人的传说，彝族、拉祜族、傣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创世说，葫芦和牛头一直被这些民族视为吉祥神圣的象征，加以崇奉。需要族群在一起办大事的时候，便膘牛以显示姆依吉保护神的尊严和护佑，表达对共同祖先的忠诚和遵从。号召参加仪式的本族和各族兄弟、同胞，抛弃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团结凝聚成强大的力量，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维护族群的共同利益。久而久之，以膘牛为主要仪典的活动演化成为严肃的盟誓文化，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佤族的盟誓文化作为一种理性的仪式，借以与公正威严的天地神灵对话，遵循严格的规程，用誓言统一众人的思想意志，维持着民族的价值观。摩巴、头人和老人借以教育族人传承民族的道德礼仪和传统文化观念，如守护村寨、尊老爱幼等。这才是佤族膘牛的真正含义。

^① 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4—65页。

1228年,勐卯(瑞丽)一支傣族南下寻找新的定居点,途经西盟马散部落,受到头人的热情款待。傣族首领向佤族头人的女儿求婚,婚宴前组织膘牛盟誓,互换象牙和牛头作为信物,说:“牛头不会枯,象牙不会烂,永世长存,傣族和佤族永远是亲戚。”1898年,佤族和拉祜族为保持友好关系也曾膘牛盟誓,并立下石头为证,各出一文钱埋在石头下,说:“佤族不杀拉祜族的人头,佤族和拉祜族永远是兄弟。”1934年,英军和缅甸士兵侵占沧源班老银矿,班洪总王胡玉山召集佤山十七部落王膘牛盟誓,保家保厂保国,1992年,沧源县人民政府在当年膘牛的大榕树前立下“班洪抗英遗址纪念碑”。1951年元旦,佤族与西南边地各民族在普洱县红场组织膘牛盟誓,并落成“民族团结誓词碑”,共同誓言民族爱国、诚信、平等、和谐、自由,成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应该说,“盟誓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具有十分积极的教育意义,也不乏其时代价值。佤族膘牛作为行为过程表现时仅仅是一组原始粗犷的肢体语言,而作为一种民族礼仪阐释时,就是一个极具思想内涵的“故事”,蕴涵着深沉的民族精神和力量。

(四) 佤王宴中的自然生态观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饮食文化占据了相当高的地位,拥有极其丰富的哲理思想和科学知识。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生境和生产生活实践,总结出各自不同的采集、种植、加工、搭配、食法等饮食文化体系。佤王宴在佤族饮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是佤族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佤王宴是佤王用来招待部落首领、民族英雄、异族使节,举行会议、宣布重大事件时王府里的御宴,由牛排骨、猪排骨、烤乳猪、鱼等肉菜,以及烂饭、米饭、各种山里采集的野菜,白酒和水酒组成。食用前由召毕诵经祈祷,感恩天地的赐予,祝贺男女老少幸福相聚。开吃时,烂饭里的鸡头要敬给长辈或头领,他们动筷之后,大家才可以食用,因此充满了仪式感、神秘感和幸福感,还可以歌舞伴餐,大家吃得愉悦畅快。这体现了佤族“有地大家种,有肉大家吃,都是兄弟姐妹”的“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传承和尊重。

自古以来,佤族始终坚守祖先遗留下来的饮食礼仪。例如,长辈不到小辈不动手,家人到齐之后由主人分食,外人碰上也能分到一份。每逢膘牛宰猪,四肢要留给父母,岳父岳母或兄弟,其他部分全寨人都可以分食。建盖新房时由主人组织上山狩猎,届时全寨人都来贺新房,送来水酒、糯米饭、茶叶、盐巴等,摆开长席大家分享。“迎新谷”仪式中也有饮食礼仪:头人们组织全寨修理梅依格保护神的神庙,修补道路和沟渠,各家各户打扫仓库,修补房屋,第二天取回新稻、小米和各种瓜果蔬菜,还要到村口请回逝者的灵魂,然后一起享用“神餐”,吃完便燃起篝火,载歌载舞。

佤族“佤王宴”无准确的历史记载,也不知道有哪一位部落王曾经组织过“御宴”。笔者认为,佤王宴传承至今,已发展演变为“祝福庆贺之宴”,依照佤族民间习俗就是“神餐”。享用神餐的过程,充满了佤族团结和谐的精神,以及佤族人民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生存智慧的崇奉,对传承道德礼仪和乡规民约的传承,蕴涵着丰富、深厚而又神圣的历史情感、民族的认同基础,具有民族文化取向的浓烈色彩,当下还被赋予了绿色健康的现代意义。和云南红河哈尼族著名的“长街宴”一样,也体现了村寨、族群之间和睦相帮、团结友善、共同分享,人与自然之间万物一家的传统思想情感,像节日一样作为一种平台和载体承载着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广泛交流互动,其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远大于饮食本身。

(五) 佤族歌舞音乐语言中的知识表达

音乐歌舞艺术,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的音乐歌舞艺术,源自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通过说说唱唱跳跳,传递生产生活知识、娱情励志,见人见事见精神。违背这种特质便打造不出精品,也不能流行成为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

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①“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②，“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③要求文学艺术作品“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④，“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下面举两个例子：

1. 芦笙舞。佤族的芦笙舞与其他民族不同，寓意着一种社会的关爱和生活的哲理。据说，先民中有的孤儿整天苦闷无助，家家团圆的时候，他们就用竹管做成乐器，模仿阳雀的鸣叫声来安慰自己。这种情况被传授“阿佻理”的智者达赛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编唱出许多的芦笙歌舞，奉劝人们不要做猎头祭谷的事了，那会给世上造成更多的孤儿。人们很快接受了他的劝告，跟着他唱跳芦笙歌舞，向族群也向其他民族传播“阿佻理”。久而久之，芦笙歌舞便传遍了山山寨寨，除了“孤儿调”还有各种模仿鸟兽和劳动生产的歌舞，传到今天多达五十多种。佤族在打歌活动中常齐声呼喊“赛玛背劳来”，意思是芦笙舞的始祖达赛玛了不起，并借此活动来教育凝聚人心，主张良好的道德风尚。

2. 蜂桶鼓舞。佤德语支民族喜跳蜂桶鼓舞。传说在达赛玛用歌舞说服人们停止砍头祭谷之后，佤山首领们商量组织了一次舞蹈大赛，在焦山跳了十八个昼夜仍不分胜负。为评出优胜者，大家建议在歌场中央放一张篾桌，桌上撒上米花，谁的歌舞队能让桌上的米花也跟着飞舞起来谁就赢。班老的队伍选了十六面大铙，四十八个大钹，若干蜂桶鼓一起疯狂唱跳，最终成为胜者。他们所跳的风桶鼓舞也从此在流传开来，且倍受佤族人民青睐。勐来乡佤族“贺新房”跳蜂桶鼓舞，三只鼓分父、母、儿鼓，母鼓声音最为洪亮。蜂桶鼓也叫“佛鼓”，说是小乘佛教传入时开始出现的，人们修缅寺、纳新菩萨，头人聚会以及泼水节时就跳蜂桶鼓舞。气候太过干燥时鼓的音质不好，便要在鼓的音孔中滴水，所以又叫水鼓。

佤族的木鼓舞、播种舞、薅秧舞以及相应的各种音乐曲调、唱词等，几乎全都意味着人文自然知识的表达，失去特定的内含和仿真的肢体语言，就失去了佤族歌舞的美。

三、佤族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个性

佤族跟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沿袭和传承到现在的传统文化，并非都能够按照学院理论做出祭祀性、生产生活性、自然模仿性、自娱自乐性的严格区分，刻板的类别划分容易导致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真实立体全面的审美认知缺失，上述文化类别在现实的民族文化中常常交叉或综合呈现。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民族的仪式、传统文化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思想行为教育等，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与个性所在。例如上述“芦笙舞”和“蜂桶鼓舞”，始终都离不开“司岗里史诗”的本源，所有动植物生命的灵动形象和音乐语言的表达、人物情感的外化和仪式规程的痕迹，以及演唱风格和内容、服饰打扮等等，都体现着“沧源崖画”“梅依格意志”“达赛玛阿佻理”等传统文化信息，通过佤族自身的历史记忆和对生产生活实践的理解得以复活，实现佤文化所追求的完美。现代创作的木鼓舞给人的艺术记忆是舞而非鼓，镖牛舞给人看到的是镖牛的勇猛粗旷而非盟誓文化的庄严，如果缺乏文化主体意识的审美架构和核心的诠释，就会失去文化艺术精品品牌的构筑基础和空间。

① 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4—65页。

② 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4—65页。

③ 杨兆麟：《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4—65页。

④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2019年3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1—326页。

四、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构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蕴涵着巨大的力量。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文化艺术工作也和其他领域一样，面临“创造创新，用品牌说话”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发挥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团结教育作用，激励民族的内生动力，提升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竞争力。笔者认为，铸造佤族文化的时代品牌应着重从如下方面提升意识、持续发力。

（一）开拓发掘和研究的视野

佤族“司岗里”文化反映着本民族十分朴实的包容性。从上文所述可知，佤族文化体现着以下三大渊源关系。一是《司岗里》史诗中创世说的根系。它维系着佤德语支民族的团结发展，也影响到傣族、彝族、拉祜族文化的传承；二是由崖画、木雕、服饰、歌舞、镖牛盟誓等等“文化符号”组合起来的自我完整完善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内各元素相互之间，有主流脉络的架构和功能。三是自明永乐五年（1407年）傣历769年巴利语系佛教（即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沧源之后，所形成的原始宗教、佛教、基督教等交流融合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观，以及因民族迁徙而形成的，联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的东南亚文化带。因此，打造佤文化品牌，就要基于“司岗里史诗”“沧源崖画”等基本历史文化符号，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包容度，追随新时代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云南发展“三个定位”，树立民族民心相连相通、民族历史命运共同，团结和睦、共建共享的精神文化胸怀，建立中国佤族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系及其理论研究体系，引导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做深做实做高节日文化

佤族是民族节日最多的民族之一。《佤族文化大观》中介绍的节日有“接新水节”“取新火节”“播种节”“新米节”，春节以及“拉木鼓”“砍牛尾巴”“做老母猪鬼”等。《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佤族卷》中又列出“便克节”（火把节）、“斋节”（“请谷魂”）、“青苗节”“贡象节”“堆沙节”“关门节”“开门节”“司岗里狂欢节”等等，体现出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各级党委政府充分利用佤族节庆文化资源，组织各种文化旅游、招商引资和庆典活动。《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大力提倡精品节庆、演艺、会展旅游产品，重点培养10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节庆品牌，20个云南节庆活动，10个以上精品演艺品牌。当前，“我国的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①这就对文化产品的供给提出了“精品意识”要求。笔者认为要打造文化精品，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应深入发掘和宣传阐释文化产品中蕴涵的历史、信仰、仪式、价值理念等文化内涵，着重关注其中神圣、崇高、庄严和值得敬畏的内容和精神，尤其应加强对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的研究和相关文化产品的开发，民族节日能较好地反映活动主体的文化取向和审美习惯；二是要注重研究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特色优势，讲好本民族的“故事”，在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交响曲中发出自己声音，沿着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精神文化传统的轨道创造创新和发展。打造精品文化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要树立起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责任担当，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民族的节庆礼俗、劳动文化（如耕作文化等）、历史事件、英雄人物、生活仪轨等均可通过研究整理发掘，创造出文化精品。而打造品牌文化，就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9月1日，第4版。

要充分体现历史的厚重感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体现各民族的“乡愁情结”和“故事”特色，民族的团结精神和文化凝聚力，没有这些浓厚的民族文化特性就没有民族的世界性，成就不了民族文化品牌。譬如“司岗里文化节”“彝族火把狂欢节”“大叶茶祭祀大典”“民族民间山歌文化节”等有一定知名度的民族文化活动，都具备打造民族文化精品、树立文化品牌的潜力。

（三）实施开放性佤文化人才战略

打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牌，是一个密切关联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生产与生活等诸多领域，需要协调统筹各方面群众、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包融传统文化语言和现代文明旨趣才能完成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培育佤文化人才战略思维，一是要以佤族“司岗里文化”“沧源崖画”等文化遗存中的民族文化特质与优秀文化个性特色的复活和重塑为抓手，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信，从而吸引一批致力于优秀佤文化研究弘扬、发展创新的有志之士和青年才俊，加入到佤文化发掘传承、宣传弘扬和创新创造的队伍中来；二是以民族文化感召力培育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启迪和激发有关人才立志以发展和弘扬优秀佤文化为己任，从而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内生动力；三是要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和云南发展“三个定位”的发展战略机遇，对内加大力度选拔培养，对外不拘一格广纳天下贤能，努力培育打造一支勇于且善于推动佤族品牌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卓越人才队伍。这支队伍从上到下爱这片土地，敬畏佤族文化，有文化大视野修养，敢于和善于走佤文化品牌之路。

结 语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三大优势资源。一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发展是支撑民族精神和激发前进动力的资源，具有推动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兴国民兴，文化强民族强”的基础实力；二是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雄厚潜力，高原生态农业示范区、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云南“三张牌”以及全域旅游等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广阔的前景；三是地处边境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瞭望南亚东南亚，有开放交流的悠久历史和民族交往融通的经验智慧，在国家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一带一路”建设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发展战略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佤族和其他云南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打造一批文化精品和文化品牌，创造“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思想理念和工作模式，实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价值重构，将持久长远地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繁荣发展。

责任编辑：杨松禄

民族地区乡规民约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作用研究

孙 敏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桂林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3)

摘 要: 通过对龙胜、恭城两县下辖的二十多个乡村进行了实地考察, 发现乡规民约在维护村庄秩序、规范村民行为、优化乡村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乡规民约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现状, 如关于民族区域性内容减少, 内容不够规范、地方特色不突出, 乡规民约的地区差异大, 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处罚随意性较大等问题, 应该深化乡规民约的文化内涵、完善乡规民约具体内容、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规范相关制定程序、做好宣传讲解、整合乡村各级治理力量。

关键词: 乡规民约; 农村; 现状;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050-13

一、乡规民约概述

乡规民约起源于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社会,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一种行为规范, 对保持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学界基于不同的角度, 对乡规民约做出了诸多定义, 但得到公认的是乡规民约作为民间的“习惯法”, 对约束规范当地村民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 乡规民约是为了维持乡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目标, 由某一特定的乡村地域范围内的村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 自主、自发地制定的, 以口头相传或者书面文字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一种行为规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 区域性与乡土性。与适用于更大范围内的普适性法律法规不同, 乡规民约只有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才能发挥效力, 调整的对象往往是以村落为单位的。中国农村社会广阔, 各村之间的风俗地貌不尽相同, 根据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而制定出的乡规民约, 无论是约束行为亦或享受福利待遇, 都只对本村村民适用, 超出本村地域范围一般就会失去效力。乡规民约诞生于中国农村社会, 根植于乡土文化中, 带有浓郁的乡土性。

2. 内生性与契约性。农村基层社会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 因此作为农村自治手段的乡规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 2019—2020 年度课题“民族地区乡规民约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作用研究”(YBJX2003)。

作者简介: 孙敏, 桂林市社会主义学院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民约大多数并非基于外力而产生，而是内生于乡土社会中，是由村民自发订立，对本村庄事务进行自我管理与控制的一种行为准则，更多体现出一种内生性。乡规民约本质上就是一种契约，是用于规范所有村民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约定，实质是村民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契约。从内容上看，是全体村民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从制定程序上看，是全体村民协商一致通过的；从效力范围上看，是需要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对全体村民具有普遍约束力，具有明显的契约特色。

3. 教化性与约束性。乡规民约虽然不具备国家法那样绝对的强制力，但是在其效力范围内，有着与法律一样的约束力。一方面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村民的思想，调整村民个体之间、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教化育民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惩戒性手段对违规者进行一定的惩罚，让村民明白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约束村民的行为。

4. 外显性与内隐性。外显性是指乡规民约的制定要公开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经过全村村民的集体商议才能通过，制定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所有对村民的奖惩实施，都应公平公正，要告知全体村民。乡规民约的内隐性则是就其作用方式上来说的，乡规民约主要是间接作用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其主要作用还是引导，潜移默化地引导村民的行为，更好地将村民凝聚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施加影响，让这种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成为一种习惯，使村民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

二、民族地区乡规民约建设的现状分析——以恭城、龙胜为例

历史地看，乡规民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布范围要较其他汉族地区更广泛。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主要以族缘而非血缘关系居住，对族群的分界很重视，也很注重保护地方资源。另外，少数民族本就人数稀少，为了更好地一致对外，他们更需要通过乡规民约来增强内部凝聚力。本文主要就是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为研究对象。

（一）乡规民约建设的基本情况

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调研组选择了恭城瑶族自治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为范本。两个县均为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比例较高，具有典型性。

1. 关于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的程度。男性村民与女性村民的比例为 1.2:1，相差不大。根据年龄段划分，18—25 岁的村民 38 人，26 到 35 岁的村民 32 人，36 到 45 岁的村民 25 人，46 到 60 岁的村民 46 人，60 岁以上的村民 56 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较多，占 38.7%，其次是高中文化、中专，占 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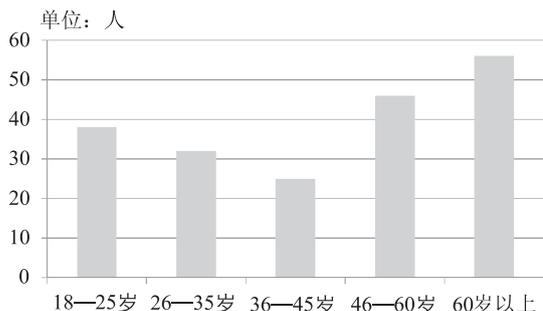


图1 调研对象年龄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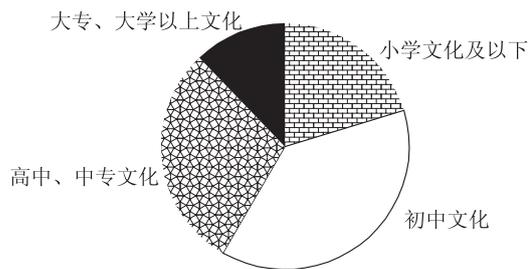


图2 调研对象受教育情况图

2. 村民对于本村乡规民约的态度和了解程度。16.5%的村民很了解本村的乡规民约，64.6%的村民基本了解，15.1%的村民不太了解，3.8%的村民表示不了解。说明在设立有乡规民约的村庄中，村民基本上能够知晓，但还没有达到人人熟知的程度，很多村民只知道有乡规民约的存在，但对具体内容并不是很了解。

关于乡规民约的产生方式中以如下三种居多。一是村委会草拟、村民提出修改意见后开会通过，二是在上级统一文书的基础上制定，三是由村委会或村支部制定。这三者的比例分别是70.6%、10.2%、8.1%，三者之和为88.9%，成为乡规民约产生的主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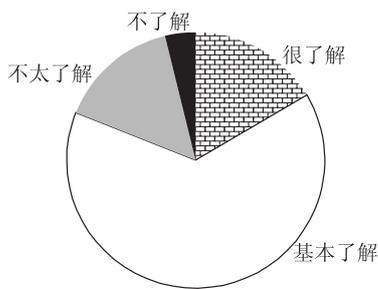


图3 村民对乡规民约的了解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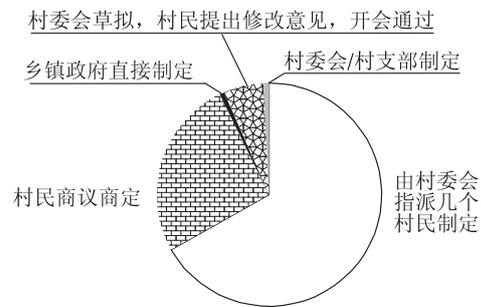


图4 乡规民约的生产方式

调查走访中得知，大部分村民没有机会直接参与乡规民约的制定（见图5）。而89.3%的村民表示，如有机会愿意参与其中。由此可见村民的民主意识有所增强（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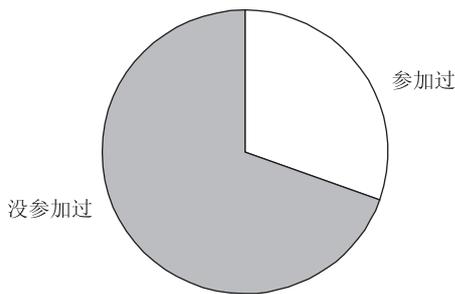


图5 乡规民约制定中村民的参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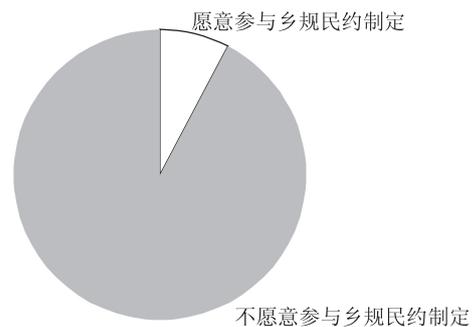


图6 村民对参与制定乡规民约的态度

3. 关于乡规民约的内容及作用。乡规民约所规范的对象很广泛，涉及村容村貌、禁赌禁盗、村民行为、邻里关系、环境保护、乡村治安、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从图7可以看出，选择村民行为、村风民俗、乡村治安、环境保护、权利义务方面的样本最多。

在调查样本中，5.6%的受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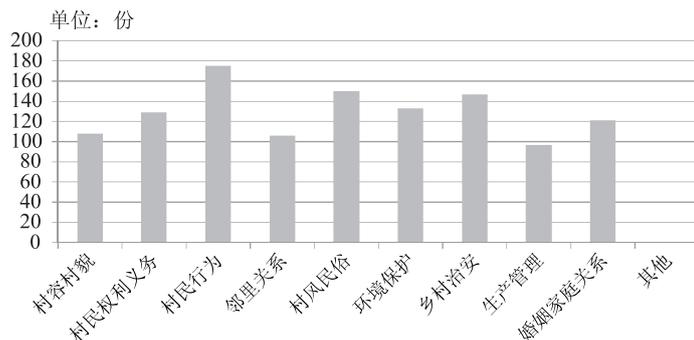


图7 乡规民约的内容

表示所在村庄没有修订过乡规民约，58.4%的受访者表示所在村庄平均3~5年修订一次，36%的受访者表示所在村庄5年以上没有修订过乡规民约（见图8）。

经调查，邻里纠纷、田地纠纷是目前乡村里的主要矛盾。在遇到矛盾纠纷时，42.6%的村民选择他人调解；25.4%的村民选择双方协商私了；24.4%的村民选择利用乡规民约进行调解。村民间发生矛盾时，大部分村民不愿意去法院打官司，认为就算打赢了官司也会伤了双方的感情（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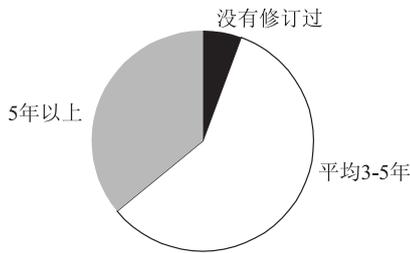


图8 乡规民约的修订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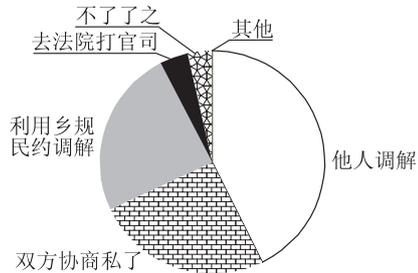


图9 遇到矛盾时的主要解决方式

乡规民约对乡村的管理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邻里关系、村民行为、禁赌禁盗、环境保护与乡村治安等方面（见图10）。

村民小组会、乡规民约评议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在农村社会的覆盖面达到了87%以上（见图11）。这些自治组织在人员组成上，以村里有威信的人、党员、村干部为主，普通村民的参与度较低（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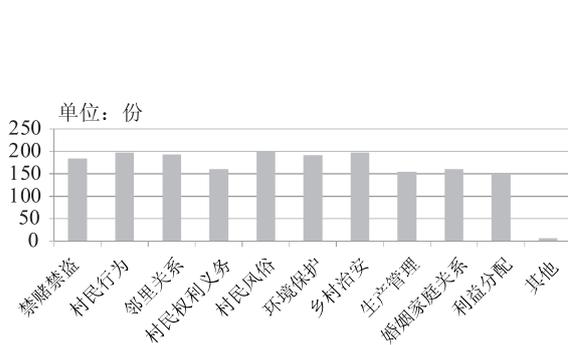


图10 乡规民约内容对日常生活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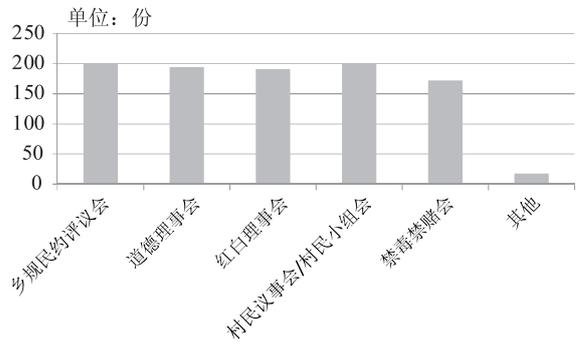


图11 村民自治组织

65%的乡规民约中有对于不服从规定的村民进行惩罚的措施，主要是责备和警告，或者是进行金钱上的处罚（见图13）。

大部分的村民比较认可乡规民约的实施，实施乡规民约对乡村各方面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见图14）。

4. 实施乡规民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48.7%的村民认为宣传不到位，42.6%的村民认为乡规民约内容不够完善，31%的村民认为乡规民约执行难度大，实施效果不理想（见图15）。因此，今后在修订完善乡规民约时，要注意内容的规范完善，并且要加强宣传，确保执行效果

(见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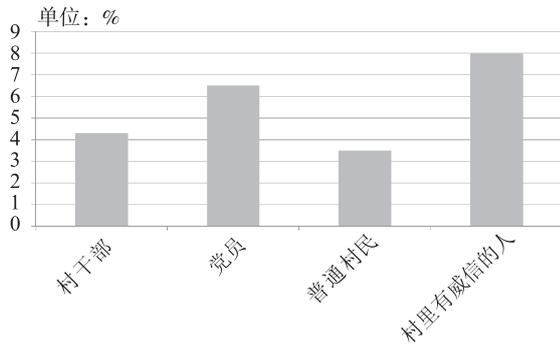


图 12 自治组织的人员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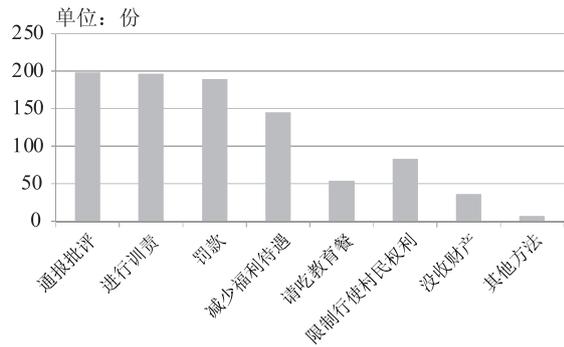


图 13 乡村民约中有哪些惩罚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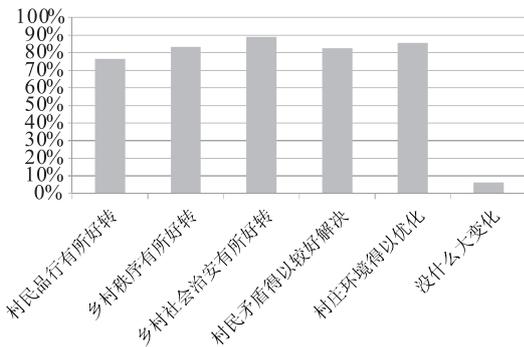


图 14 实施乡规民约后村庄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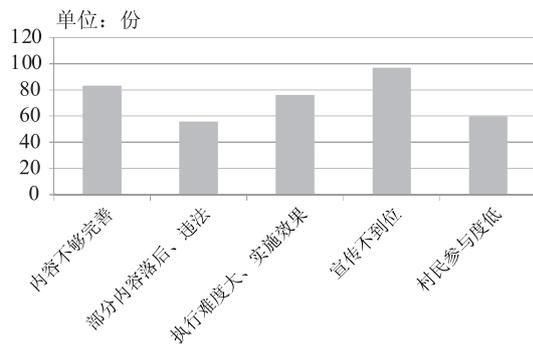


图 15 乡规民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村民在对乡规民约的约束力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可，绝大部分的村民觉得乡规民约的约束力不够大，有约束作用，但是并不明显。

在执行力方面，60.4%的村民认为乡规民约基本能执行，3.6%的村民认为乡规民约的执行力很弱，17.8%的村民表示不清楚乡规民约的执行情况如何（见图 17）。这说明乡规民约在乡村自治中基本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等方面还有待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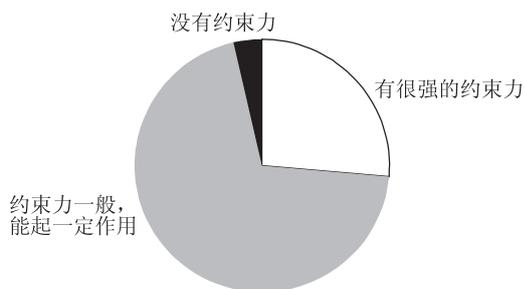


图 16 关于乡规民约的约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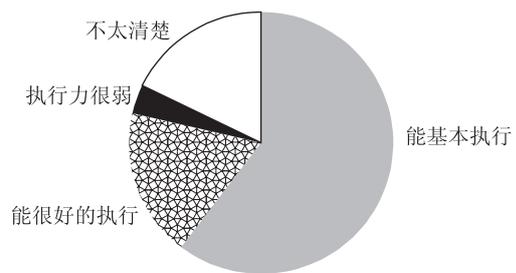


图 17 关于乡规民约的执行情况

村民们认为影响乡规民约执行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制度保障，该选项样本选择率占 85.8%。其次是部分内容落后，该选项样本选择率占 82.7%（见图 18）。

5. 如何完善乡规民约。从调查结果看, 村民们很愿意参与到乡规民约的制定中来, 希望这些规则的制定能够更加规范有序, 并通过建立专有的执行组织机构, 确保乡规民约可以高效有序地执行和发挥作用 (见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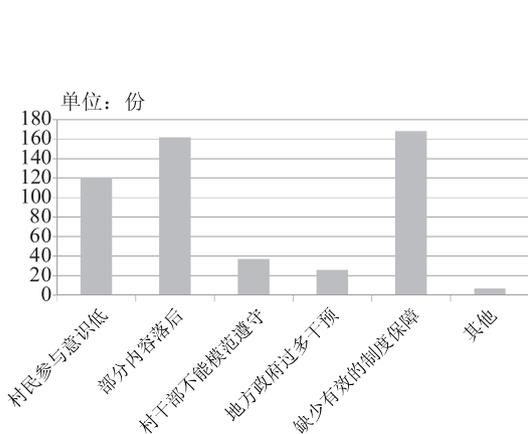


图 18 影响乡规民约执行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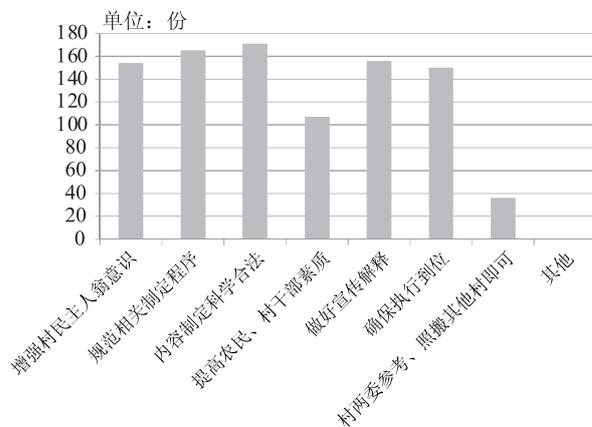


图 19 如何做乡规民约建设

(二) 乡规民约的主要作用体现

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对当地村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但总体而言积极的一面是主要方面。

1. 积极作用

一是协助解决纠纷, 维护村庄秩序。随着城乡差距增大, 城乡间人口的流动频繁, 各种矛盾突发。法律无法顾及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乡规民约正好填补了这一缺失, 让许多民事纠纷能够通过基层民众的自治途径得到解决。通过乡规民约的调解, 可以更高效、更及时地化解矛盾, 有助于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

二是规范村民行为, 淳化民风。乡规民约将抽象的道德转换成易于接受的条约, 通过引导、约束村民的行为, 来净化乡村的社会风气, 淳化民风, 能收到治理和约束社会不良风气的良好效果。例如, 通过禁赌禁盗来打击歪风邪气、整肃民风, 通过规范婚丧嫁娶来抑制大操大办、移风易俗等等。

三是促进团结互助, 改善信任环境。乡规民约中的道德规范要求村民亲仁善邻, 将互助作为一种义务。村里人遇到大事, 村民都会自发地为其提供帮助, 在农村形成了邻里之间团结互助的新乡风文明。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也更容易推动农村金融互助体系的建立, 带动了整个乡镇的经济发展。

四是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发展, 实现村民自治。乡规民约很好地体现了村民自治的理念, 利用好乡规民约有利于引导村民参与、监督村庄治理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 调动群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五是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优化乡村环境。很多乡村都有关于环境卫生、生态保护方面的公约, 如有的村庄明确规定每户村民的房前屋后及院内, 要做到无垃圾、无污水、无污泥; 不准乱造私厕、乱倒垃圾、随地吐痰等。引导村民提高环保意识, 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惯。通过乡规民约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 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六是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凝聚发展合力。乡规民约的制定,可以协助整合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如通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村民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增强村民凝聚力,齐心协力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去,促进当地的乡村经济发展。另外,乡规民约还充当了国家政策与村民对话的一个中介平台,乡规民约常将国家发布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以简单直白的方式编成民谣、顺口溜等在村民中进行传达,使国家的各种政策更容易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

2. 消极影响

一是影响国家法律的有效执行。由于村民文化程度偏低,导致他们对问题的认知比较片面,更习惯于利用传统的处理方式来解决。受这些思想影响而制定出来的乡规民约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合规范的地方。甚至一些传统处理纠纷的方式可能会与国家现行法律相悖,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法律的执行。

二是误导村民的法治观。如旧版的《龙胜龙脊壮族乡规民约》规定,对一些纠纷,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经凭地方劝息,切莫以势欺弱,喜争好讼,以免互伤和气”。^①像这类戒绝诉讼的内容过去在广西各族乡规民约中随处可见,虽然这些内容现已被删除,但其影响力还在延续。在发生民间纠纷的时候,村民还是更倾向于采用乡规民约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

(三) 乡规民约的新变化、新特征

1. 村民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民族区域性内容减少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农村主要矛盾以“土地纠纷”“邻里纠纷”为主。一些纠纷在解决中,还会因为对政策性理解的偏差造成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村民间的纠纷比过去明显减少。在村民的纠纷中,多以经济摩擦为主,基本不再涉及民族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也体现在乡规民约内容的变化上。过去在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民族团结等字样,而在此次调查搜集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民族自治县,恭城和龙胜两个县的近200份乡规民约中,无一出现“民族团结”等相关字眼,而代替以“村民团结”“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等内容。

2. 内容不够规范,地方特色不突出

部分村庄并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当地独有特色文化来制定乡规民约,而是直接翻版其他地区的乡规民约范本,或者直接把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复制作为本村的乡规民约规定,缺乏本地特色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乡规民约修订频率低,导致更新完善慢,时代特色体现不明显。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新需求和新愿望。所以,乡规民约也要顺应时代的变迁进行更新。但是在很多地区并没有根据实际的乡村变化情况对乡规民约进行及时修订完善。虽然有些乡规民约也加入了农产品安全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但存在内容落后等现象的仍占相当大的比例,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能很好的体现时代特色。

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乡规民约存在不规范、内容与现行法律、政策相悖的地方。如龙胜县小江村乡规民约规定:“对荒废耕地者,除责令限期复耕复种外,报镇人民政府依法收取抛荒费。”^②2019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弃耕抛荒连续两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② 小江村村民委员会编:《小江村村规民约》,第三条。

年以上,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①;广西壮族自治区要求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对弃耕抛荒耕地超过2年(含2年)的,暂停发放该承包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②,均没有提供收取抛荒费的依据。龙胜县甘甲村乡规民约规定,“严禁炸鱼、电鱼、毒鱼和塞河闹鱼等一切捕鱼行为……一经发现违反者,护河队将没收全部捕鱼工具和渔利,并当场罚款500~2000元”。^③而根据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限额为500元。龙胜县东社村规定,对新迁入的育龄妇女、两胎以上(含两胎)者,必须出具医院的结扎证明,否则不予入户^④。这些内容虽然是出于维护乡村治理的需要,但没有法律依据,不够规范。

3. 乡规民约的地区差异大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乡规民约内容迥然相异,即便是距离很近的村庄,乡规民约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村庄的乡规民约内容非常复杂,长达五六页纸,村民难以记住,不便于传播和推广。相反,另外一些村庄的乡规民约只有寥寥一两百字,内容过少,只涉及一些政策宣传的面上的内容,对村民具体行为起到的规范调整作用不足。

4. 原则性规定有余,具体规定不足

一些乡规民约从宏观上看,涉及到村庄治理的方方面面,看似比较完整,但大部分规定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点到为止,可操作性低。比如规定“关心集体,支持公益事业”,村公益事业的界定标准具体是指哪些方面,村民是以精神还是物质的方式支持,如若不支持会有什么后果等问题则没有论及。乡规民约作为法律、法规、政策的有益补充,其内容的表达应当做到具体、明晰,便于操作,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村民高效地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5. 实施效力低,处罚随意性较大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乡规民约发挥效用的前提就是其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执行。但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大部分的惩罚措施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很多村干部表示,自新版乡规民约修订以来,还没有执行过惩罚措施。乡风改善,村民整体素质提升是一方面原因,但乡规民约的不完备也是一方面因素。从惩罚的方式上看,最常见的就是罚款,但是对于这些罚款该交给谁,由谁来保管、使用常常没有明确规定。不少乡规民约将违反规约的处理笼统列为:批评教育、村广播通报、责令赔偿、取消本村各种优惠待遇等,具体违反哪一条或违反至什么程度给予什么样的惩罚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处罚的随意性较大。

(四) 乡规民约发生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1. 民族政策落实有力,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

各民族间的相互交融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广西作为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在历史上经过多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各民族交错杂居,早已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的良好局面。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指导下,广西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在笔者走访的20多个乡村中,各民族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近50年来没有发生涉及民族因素影响民族团结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9年1月27日,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1/cd063e4c0f19465e9d41946001fe839c.shtml,2021年4月9日。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2020年粮食生产工作的通知》,2020年3月12日,http://www.gxzf.gov.cn/zfwj/zxwj/t4032488.shtml,2021年4月9日。

^③ 甘甲村村民委员会编:《甘甲村村规民约》,第七条。

^④ 东社村村民委员会编:《东社村村规民约》,第十三条。

的重大事(案)件,因此乡规民约中也就删除了原有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规约。

2. 村民生活方式变化,乡规民约生存空间减少

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职业流动性增强,在村里实际居住的时间较少。纵向的地域流动改变了村民原有的生活模式和生活习惯,打破了原有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原来在“熟人社会”中诞生的行为规则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土壤,导致村民对其认同感下降。走出乡村的村民们接触到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更倾向于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身份,对村庄的感情淡化。职业可选择性的增多,减少了违约的压力,降低了失信成本,造成乡规民约对他们的约束力下降。

另一方面,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乡土社会也在解构与重建。作为乡规民约生存与发挥作用载体的自然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外力作用而慢慢凋零甚至消失在大众视野。“在1991—2013年间,中国减少了140万~150万个自然村,减少幅度为33.3%~35.7%。”^①。这些自然村落的消失,意味着乡规民约的乡土性以及它的区域性等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3. 制定程序不够规范

乡规民约是由村民会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的,所以,不仅要保证内容的合理性,还要保证对应的制定程序合规。村民会议的召开应由本村半数以上的成年村民或三分之二以上的群众代表参加,表决时遵循过半的原则。在制定村规民约时,最能够体现村民意愿的方式就是由村民自己进行商讨制定,但是这样的方式目前在乡规民约制定中仍然较少,即使采取这种方式的乡村,也存在部分村民会议的召开未达到法定人数,只由每户派一个村民代表参加表决的情况。采访中,过半村民表示没有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村民没有收到过有关修订乡规民约的通知。乡规民约的制定程序不规范,一方面会影响乡规民约的合理性、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会为村干部徇私枉法留下隐患。

4. 村民个体存在差异,素质有待提升

目前,在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村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他们更倾向于依传统习惯从合理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很少会考虑解决方案的合法性。因此在乡规民约中能发现一些貌似合理但却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会影响乡规民约的执行。村民的民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低,也影响着乡规民约的制定和施行。

5. 缺少固定的执行地点与执行组织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执行地点和执行组织,是落实乡规民约常态化的重要保障。过去,传统农村社会往往聚族而居,乡规民约常常由乡约或者会社组织在祠堂、家庙等场所执行。固定的执行场所和实施组织是确保乡规民约有效实行的重要因素,而目前大多数村庄没有固定的乡规民约执行场所,一般是由村支书、村干部或村里有威望的乡贤去村民家中执行,个别乡村则选择在村委会或村广场执行。由于缺少制度化的保障,乡规民约的执行比较随意,其作用难以较好发挥。

6. 缺乏专业性指导,宣传形式较单一

调查显示,大部分村庄将乡规民约张贴于村务公开栏,或打印出来发到各户、通过村广播公告。总的来看,宣传形式较为单一。在乡规民约后期实施过程中,需要有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跟踪评估乡规民约的实行效果,以便日后更好的修订完善,从而使之更加规范有序。目前也有些村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邀请了党校老师以及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指导乡规民约的

^① 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2页。

制定,但还有很多的乡规民约是村委会自行制定的,使得乡规民约在内容设置上存在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地方。有些村庄的乡规民约表达方式太过书面化,与村民日常习惯用语相差很大,老百姓难以理解,也不爱看,失去了制定的初衷。

三、加强民族地区乡规民约建设的建议

(一) 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深化乡规民约文化内涵

进一步深入挖掘乡规民约的文化内涵,是构建乡规民约的关键。乡规民约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演变,是农村文化的一种展现和提炼,乡规民约的建设就是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过程。当然,这其中有合理优秀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内容,新时代加强乡规民约建设,要对其进行扬弃。要传承其优秀基因,如传统的孝文化、家庭伦理文化、邻里互助文化、传统节庆文化等,使其发扬光大,通过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来深化乡规民约的文化内涵。

对于广西而言,其乡规民约的文化主要来源之一和特色就是本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因此,要想更好地发挥乡村民约的作用,需要立足本土化发展,对本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开发,结合其他文艺形式,凸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同时,乡规民约主要调整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所以制定乡规民约时必须要与当地村民的文化水平相结合,做到通俗易懂、广接地气,使其更容易被村民们所熟悉和接受。从内容设计的角度来看,乡规民约要朗朗上口,方便村民们诵读;从篇幅上来看,必须要简洁明了,避免冗长拖沓。总之,乡规民约既要“接地气”,又要“通上气”;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要求,同时也要体现好本地特色。

(二) 完善乡规民约具体内容,适应村民需要

一是乡规民约的内容必须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与现行法规相冲突,不能侵犯村民的合法权益。在修订乡规民约时,要对旧约的内容体系进行重新审视,摒弃其中落后的、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比如侵犯妇女儿童继承权、侵犯村民人身自由、罚款金额超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最高限额、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等内容。

二是乡规民约内容必须要有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乡规民约不是形象工程,要避免照搬照抄、生搬硬套,一定要紧贴本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情况,提高针对性,着力解决群众中易发生纠纷的事项,以最小的成本换取农村社会治理的最大效果。比如在广西,有很多现存的古村落,当地可以在乡规民约条例中加入有关古村落保护、维修等内容,弘扬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要与时俱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的要求,及时清理废除过时内容,适当增加一些推动乡村治理的新内容。如可以在乡规民约中加入关于重大财产处置方式的内容,如遇村集体征地、修桥、修路,按照乡规民约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根据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在乡规民约里增加相关规范内容,确保农村土地流转更加合法。

三是乡规民约在内容设置上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既要增强义务观念,又要培养权利意识。以往的乡规民约往往更多强调村民的义务,但是随着国家民主与法治的推进,要更好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就应该赋予村民更多的权利。村民除了依法享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外,还要获得参与管理本村事务、参与村集体经济分红等根据“村情”不同而设置的特殊权利,以提高其治理家乡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三)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夯实乡规民约的思想基础

乡规民约建设实际上就是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的过程。只有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改变传统思想观念,夯实乡规民约的思想基础,树立与现代乡村社会发展相适

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才能真正搞好乡规民约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行。

一是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实现农民文化层次的提升。只有提升文化层次，农民才能对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基础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只有文化水平提高了，农民才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而不是全盘接受一些西方思想而完全摒弃本村的村落文化。

二是加快转变农民观念，增强乡规民约建设的自觉性。观念对人和事物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所谓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方向。乡规民约的建设，需要全体村民支持，只有开阔农民思想、放远农民眼光，开启民智，才能让农民真正知村规、识民约，认识到乡规民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投身到乡规民约建设中去，促进其制定以及执行。

三是加强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乡规民约建设不仅需要法律来规范，还需要通过道德来维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农民的奉献及公益精神、集体意识，可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乡规民约建设中实实在在的行动，使其自觉地遵守并执行。

此外，也要提升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业务能力。一方面要认识到乡规民约建设对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乡规民约的建设，成为乡规民约的宣传推动者和带头践行者；另一方面摆正自己的位置，减少行政权力对乡规民约的干预，工作重点放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为制定乡规民约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规范相关制定程序，确保执行实效性

为了确保乡规民约的执行实效，需要从其制定程序和内容设置上进行规范。村民参与制定乡规民约的这一过程，实际就是对乡规民约的一次宣传和普及。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操作，打破部分干部说了算，村民被动参与的局面。在准备阶段，由村民集体或两委发起制定或者是修改乡规民约的意见书。这一意见书必须要符合本村村民实际的需要，能够照顾广大村民的合法权益。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代表要走访每一位村民，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记录下村民的利益需求，以此为基础初步形成乡规民约的初稿。在意见收集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吸纳年轻村民的意见，鼓励他们积极为乡规民约建设出谋划策。初稿形成后，需要每一户村民进行签名认可或者以户为单位进行表决，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在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后才能通过。村两委要将村民会议表决通过的乡规民约结果上报乡镇政府进行备案，由乡镇政府对其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查。在拿到上级机关出具的备案通知之后，才能将其公布并正式实施。具体的流程如图 20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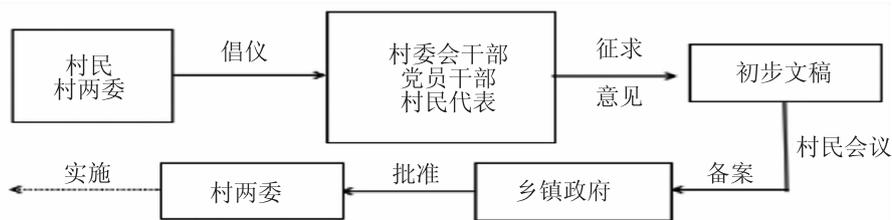


图 20 乡规民约的制定流程

在乡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乡镇政府要发挥其监督职能，派出工作人员对整个流程展开监督。为了避免行政权介入，干预和影响乡规民约的内容，工作人员只负责监督流程，不干涉具体内容，也不发表个人意见、不参与表决，保证整个选举过程的规范、民主。需要注意几点：一是参加的

主体要合法，必须是本村的成年村民；二是表决程序要合法，在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参与表决，半数以上同意通过的情况下，乡规民约才能生效；三是流程要规范，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走，不能省略、跳过任何一个程序。

同时，为了更好的保障乡规民约的施行，建议选择村公所、文化馆、百姓大舞台等地方作为执行乡规民约的固定场所，并将乡规民约的内容张贴于场所内，这样做一方面能够加深大家对乡规民约的了解，另一方面也避免奖惩的随意性，做到有章可循，增强仪式感。

（五）做好宣传讲解，扩大乡规民约影响力

要想使乡规民约从纸上的文字变成村民内化于心的行动指南，除了在内容上要对其完善外，还需要做好宣传讲解工作。例如，通过村民全体大会等形式答疑解惑，逐字逐句讨论条款、层层传达落实，使乡规民约内容入脑入心，继而指导行动。

在宣传方面，可以在农村的主要道路、主要出入口、部分房屋侧墙设置宣传栏、文化墙；发挥榜样带动作用，以道德模范和志愿者为典型，通过讲座报告、动员会等形式进行教育；通过电子屏幕播放，组织村民一起画文化墙、文化走廊等，向外界做好乡规民约的宣传工作。

在宣传方法上，要做到因人而异。基于村里老人、小孩及妇女多的实际情况，在宣传方式方法上要进行创新，多途径、生动地传达乡规民约的内容，如使用快板、顺口溜、三字经、戏曲唱段等民间艺术形式，让严肃的规约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对于长年在外地工作学习、思想活跃的年轻村民，可以通过新型的媒介如微信、QQ等方式做好宣传。通过提升村民对乡规民约的认知度，扩大乡规民约的影响力。

（六）整合乡村各级发展力量

在乡规民约的建设过程里，需要整合乡村各级治理力量，协调好政府、村集体、村民、农村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关系。

一是发挥乡镇政府的指导作用。除了做好乡规民约的备案工作外，乡镇政府还需要做好乡规民约建设的专业指导工作。特别是针对国家法律法规方面的审查工作，要确保乡规民约的文字表述准确规范，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的内容，要及时指出并督促其改正。同时，针对农民法治意识淡薄的现状，要定期对村民进行法治宣传，提高村民的整体法治素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是发挥村委会的主体作用。作为乡规民约建设的主体，村委会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民主，在乡规民约建设过程中要对每个村民一视同仁，每项操作都要在村民监督下进行，维护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村委会应该以乡规民约建设为契机，用行动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为干事创业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是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农村社会组织。”^①在乡规民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支持和鼓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其发展寻找资金支持以及开展相对应的业务培训，拓展农村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通过社会组织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发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乡规民约的村民合意是乡规民约生效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乡规民约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唤醒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在乡规民约的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2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2021年4月9日。

制定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制定乡规民约的主体就是村民，通过宣传呼吁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使其清楚认识到自己是乡村建设的最终受益者。同时，要尊重村民的意愿，着力解决村民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使村民真正受惠于乡村发展，提升他们建设乡村的主观能动性。

五是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乡村治理，关键在于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等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① 乡村精英又称新乡贤，是指本村德才兼备，在村里具有较高声望，受到敬重的贤人，包括成功的企业家、离退休人员、社会知名人士等。他们见多识广，有文化，有思想，有远见，在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得村民们信任。他们对村民的影响有时比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村委会更为直接，是辐射、影响全体村民的关键力量。因此，应当引导乡村精英发挥好积极作用，为他们提供一个回报家乡的平台，让他们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发挥自己在知识、能力、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共同维护好乡村秩序。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21年4月9日。

历史与文化

清代云南人与台湾治理及台湾诗文书写

陈友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云南虽然远在西南边陲, 但和台湾的关系并不遥远。清圣祖收复台湾后, 对于如何处理善后, 云南人赵士麟提出“一统无外之宏规”, 主张设治设防, 施行教化。其间, 清朝有近20名云南人赴台任职, 参与台湾治理, 为台湾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并且留下吟咏台湾的诗文。这些诗文, 记述了当时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历史状况、清政府治台方略及成效, 突出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 反映了在清政府治理下, 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文明程度和生活福祉的提升, 台民的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强化。

关键词: 云南诗人; 台湾治理; 台湾书写; 文明进步; 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1-0063-15

云南和台湾虽然远隔千山万水, 但在清圣祖平定台湾后, 有不少云南人到台湾担任文武官职, 目前考知的就有近20人, 他们为加强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及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古代官员多能诗, 赴台滇人亦不例外。他们的治台经验及诗文对我们认识台湾历史和社会以及正确看待台湾问题, 至今仍有启发。兹据平日读书所见资料, 略加排比, 撰成此文。

一、滇人与台湾治理

首先要提到的是赵士麟在处理台湾善后问题上的贡献。赵士麟(1629—1699), 字伯麟, 号玉峰, 云南河阳(今澄江)人, 康熙甲辰(1664)进士, 历官浙江、江苏巡抚, 署理两江总督, 兵部、吏部侍郎等。他守正爱民, 正身率下, 兴教阐道, 德化大行。《赵玉峰先生集传》说:“公以清德重望为当代名儒, 遭逢圣主, 得行所学。嘉言懿行, 经济文章, 中外推山斗。”^①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读书堂全集序》说士麟“分碧鸡金马之灵, 瑰奇弘硕, 巍然为一代之才。”^②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八日, 赵士麟因病倏然而逝, 歿后唯存图书数百卷, 四壁萧然, 情操劲节, 令天下人心折。大诗人王士禛说他“德业文章, 昭布天壤, 千载下尚奕奕有生气”。^③他为政风流, 诗

作者简介: 陈友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中华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 云南民族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和古代文学。

① 方树梅纂辑, 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滇南碑传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年, 第320页。

② 张英:《读书堂全集序》, 赵士麟《读书堂全集》, 《云南丛书》,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

③ 徐文驹:《吏部左侍郎赵先生士麟行状》, 方树梅纂辑, 李春龙、刘景毛等点校:《滇南碑传集》, 第315页。

亦为名家，博大凝厚，典重精纯，主修康熙《浙江通志》，著述编为《读书堂全集》四十六卷。

赵士麟是康熙朝名臣，具有宏大深远的政治智慧和严谨缜密的政治韬略。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圣祖收复台湾，征询臣工治台意见，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赵士麟上《台湾善后疏》（《读书堂全集》卷六，云南丛书本），主张一是设治设防，二是施行教化。其言曰：

臣愚以为，宜仿广东琼州例而变通之，安置流官，设一府两县，以治其民；设一总兵，以镇台湾；设一副将，以镇澎湖。以千里所产，供驻防之需，刍芻粮不可胜用，即稍稍协济，饷亦无几。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减，如明时倭人、红毛飘突之患可以建威而豫消。劝农桑，设学校，数年后，不特休养生息之众堪埒为外藩，即诗书礼乐之化，亦可渐兴而比美于内地，一统无外之宏规，孰大于是？若不筹所以善后，恐承平日久，巨鲸大鲵复窟于其间，又烦庙堂之区画矣。但流官资俸与直省不同，三年即与升迁，文移之往来，不宜拘以程限迟速，则人人乐趋，且无尾大之忧。如臣言可采，伏祈皇上睿鉴施行。

赵士麟建议在台湾设一府二县二镇，抚绥其民，捍卫沿海各省，并发展农业，与台民休养生息；设立学校，以诗书礼乐加以教化熏陶。古人重视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性进行“雅化”，提高个体文明程度；另一方面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涵化、凝聚、引领社会，强化国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共同致力于国家发展目标。这是高明而行之有效的治理方略。赵士麟还建议设立流官，避免官员在偏远之地长期经营，据地自雄，尾大不掉。朝廷采纳其建议，设福建省台湾府，以及凤山、台湾、诸罗三县，把台湾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管控之下，奠定大一统宏观。赵士麟虑远识深，留下不朽政治遗产。

万锺杰字汝兴，号荔村，昆明人，乾隆乙酉（1765）拔贡，历任湖北公安知县、南昌知府等。当时清政府用兵台湾，官兵络绎渡海，特简命万锺杰为福建兴泉永道，督办粮饷转运。战事结束，当局重其才，乾隆五十三年（1788）派为台湾兵备道，加福建按察使衔，渡海履任，1791年离台。任内处置恰当，扶绥缉捕，事事得宜。光绪《台湾府志·列传·政绩》（台湾文献丛刊130册）说：“乾隆五十三年，以兴泉永道，调巡台湾。未至任，擢福建按察使，仍授台湾道。台故多娼，锺杰拘尤艳者数辈，付有司械示，娼皆逸去。主岁科试，谨关防。有粤生为闽童抢冒者，按律治罪充发，诸生与寅缘，皆褫革，士习为改。性戆直，修造战舰宁多费，不以私干。提督奎（林）风裁甚峻，于锺杰独加礼焉。在任三年，以忧去。”回大陆后实任福建按察使，加布政使衔。丁母忧归里，病卒，未尽其用，识者惜之。著有《野绣堂诗集》十卷，诗丰裁倜傥，吐纳风流，清新浏亮。《滇南诗略》（云南丛书本）卷三六扬州萧霖识语云：“荔村器宇英伟，人只知其吏才之强干，而不知其抱负之宏深。今读其诗，豪壮清新，居然名手。固知才人无所不能，不得分吏才诗才为两路也。”江西武宁王子音说：“先生天才既优，学殖亦富，吐属风雅，足为金碧生色。”其诗《滇南诗略》《滇诗丛录》（云南丛书本）收录甚多，可惜没有关于台湾的内容。

张于恭（1756—1831），字文安，号竹亭，大理人，乾隆癸卯（1783）乡试亚元，历官福建长乐、沙县、崇安（今武夷山市）知县。为官勤慎廉明，“素饶干济”，政声卓著，士民瞻仰，口碑载道，“咸以循吏能员称之”。道光三年（1823）升台湾府南路海防同知，时乡人曾立《张于恭诰封碑》记其事，碑现存大理州博物馆。当时台湾南北两路不稳，张于恭奉檄往谕，深入瘴疠，晓以大义，“淳良者感以恩，顽固者摄以威”（《新纂云南通志·名贤·张于恭传》），人心安定。论功封赏，权补福建永泰知府。因劳顿过甚，暑湿交侵，手足麻木，遂告回籍，诰封奉政大夫。不久病逝。林则徐撰墓志铭，并作挽联：“垂白一翁穿望眼；点苍万里痛归魂。”云贵总督阮元挽曰：“绿野堂开，一代衣冠荣五马；香山会里，百年人物纪三朝。”倪思淳挽曰：“阅渡海澜波卅

载，清勤推表率；传过庭诗礼六经，根底见风流。”^①其著有《文安全集》八卷，惜《滇诗丛录》收录诗中，亦无台湾内容。

董正官、曹士桂在台，宦绩亦著，详见下文。

除上述诸人外，还有多位滇人任职台湾。《新纂云南通志·宦绩传五》载，鹤庆人蒋祖培，乾隆二年恩科（1737）进士，曾任台湾知府。《新纂云南通志·艺文考二》载，嵩明人唐时勋，号巨河，乾隆庚寅（1770）举人，官嘉义县知县，著有《平台纪略》一卷。《滇南诗略》卷三一载，宜良人芮国勋，字云台，号大臣，乾隆己未（1739）武进士，官台湾游击。徐文仪纂修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一武备三云：“孙文元，云南人，台湾镇左营游击。朱一贵窃发，欧阳凯等战歿，贼攻府治。文元兵少势孤，于鹿耳门内望北叩首毕，跃入海死。”又据陈培桂纂同治《淡水厅志》卷八上，云南晋宁州举人苏鳌，道光六年（1826）署理彰化县知县。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的《噶玛兰厅志》卷二载：“李廷璧，云南晋宁州人。由举人知彰化县，（道光）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署（噶玛兰通判）。升鹿港同知。”又光绪《台湾通志·职官》载，蒙自举人尹秦，雍正五年（1727）任巡台御史；永善举人朱国垣，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澎湖通判；昆明人张天寿，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淡水营都司；寻甸人戚世连升，嘉庆四年（1799）任右营游击；通海人祁征祥，光绪八年（1882）七月任台湾县知县；太和（今大理市）人范克承，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任台湾县知县。

僻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在清代有这么多人参与台湾治理，有的还是少数民族（董正官系白族），是颇出人意外的。这表明清代时台湾已经与大陆完全融为一体，故治台官员在全国范围内选派。云南乡贤们为台湾治理殚精竭虑，贡献甚著，有的人还献身台湾，令人敬仰。他们的台湾诗歌书写，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清政府治台方略及成效，是台湾和云南的珍贵文化遗产，当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张琮：沧海于今成乐土

张琮，号浣村，河阳（今澄江）人，赵士麟婿，历官黄安知县，著有《立德堂诗集》，翰林院编修王思训为之序，已佚。光绪《台湾通志·职官》载，张琮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台湾县县丞。《滇南诗略》卷二八收其诗10首，有4首写台湾。这些诗反映了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早期的治理情况，颂美清圣祖对台湾的励精图治。

其中，《红毛楼感怀》描写台南美丽风光和社会繁荣景象：

叠石雕甍落彩霞，登临到处眼偏奢。
茫茫涛涌三千岛，历历烟霞十万家。
沧海于今成乐土，高楼终日响秋笳。
东南餽饷劳宵旰，筹唱谁道济沙？

台南为清朝台湾府治所，是当时台湾的行政中心。台南红毛楼又名赤崁楼、赤坎楼、番仔楼，为晚明时荷兰殖民者所建，当时汉人称荷兰人为红毛，故名。台南靠山面海，风景优美。“登临到处眼偏奢”意为登上红毛楼，台南自然风光、繁荣景象看不尽。首句写红毛楼由石头垒成，雕栏画栋，颜色彤红，仿佛彩霞落下。颌联写台湾诸岛在茫茫大海之中，波涛汹涌；台中已经是人口密集之地，他们生活在美丽风光之中。颈联说清圣祖收复台湾后，休养生息，台湾已经变成乐土。

^① 赵勤：《清代在台湾供过职的两位大理人》，《大理文化》2007年第1期，第53页。

尾联说圣祖为筹集台湾地区的军饷、筹划台湾治理而日夜操劳。

又《澎湖岛》：

孤悬一岛水连空，开幕登坛节钺崇。
庙算十年筹海上，军威半壁锁台中。
笳吹猎火波痕碧，星杂渔灯舰影红。
我亦书生思报国，太平无事请从戎。

此诗应是张琮随某大员到澎湖履任时写的，其见证了澎湖开府设治的过程：“开幕登坛节钺崇”。“庙算十年筹海上”说的是清政府精心筹划治理台湾。此诗描述澎湖岛一岛耸峙、四海茫茫的景象，以及澎湖守军军威严整，澎湖岛渔灯辉煌的情景，歌颂清政府对台湾的经营，表达自己的报国之情，读来令人振奋。

三、万友正：清政府治理台湾的效果

万友正，字端友，号虚舫，阿迷（今开远）人，乾隆壬申（1752）举人，历官江西武宁、四川清神、福建古田知县，著有《汗漫集》。同学齐世南序《汗漫集》说：“万子胸襟浩荡，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概。好游遨，足迹所到，一皆以诗写之。”乾隆壬寅年（1782）二月，万友正受福建布政使杨公委派，勘察福建后路，从厦门到台湾，写了一组关于台湾的诗。其中，《台郡》（《汗漫集》卷三，云南丛书本）云：

沙汕通番舶，森茫接斗墟。平湖迷岛屿，低树种珊瑚。
上市槟榔果，先春小甲蔬。红毛楼上望，云物正堪书。
炎徼南溟际，空城翠屿低。好风苏草木，有地剪鲸鲵。
杂糅工云锦，熟番善雨犁。化行无内外，使节附标题。

这首诗是万友正在台南写的，描写了台南景物和民风，反映了台湾经济社会在清政府治理下的发展。“沙汕（沙滩，此指码头）通番舶”，表明当时台南仍有外国船只开展国际贸易。“杂糅”与“熟番”相对，当指生番，即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高山民族。“杂糅工云锦”说“生番”能做出巧妙的纺织品。熟番是台湾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熟番善雨犁”说他们善于在雨季用牛耕种。“标题”即“雕题凿齿”，指当地原住民文面之类。^①“使节附标题”意为当地原住民也归清政府驻台官员统领。“化行无内外”说明清政府在台湾施行教化，台湾与大陆已连为一体，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好风苏草木，有地剪鲸鲵”一语双关，既指台湾在春风吹拂之下草木复苏、台湾人擅长捕鱼之实况，也暗示了治台的方略：一方面要施行德化，为民纾困；另一方面对敢于侵略或叛乱者要实施打击，这是治台的不二法门。二诗有境界，有见识，描写真切，情景交融。

四、董正官：信否来龙自鼓山

董正官（1797—1853），字钧伯，一字训之，大理人，白族，道光癸巳（1833）进士，历官

^① 曹士桂《宦海日记》：“眉社，则王字生番也，与埔社等番看不异而小异。男则同，妇女则额上刺‘王’字。自耳下起至唇吻刺方条约二寸许，左右一致，刺莫知其文，惟星点罗列，涂以靛蓝，终身不磨，遥望之如鸟喙然。是殆雕题之谓欤？又，各番男女将嫁娶，各拔去上下牙四枚，是殆凿齿之谓欤？埔社以南各社，凿齿而不雕题，埔社以北各社，雕题凿齿，人较凶悍，谓之王字生番云。”见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福建安溪、长泰、霞浦等知县，严守海疆，政绩卓然，士民称颂。道光二十九年（1849），由霞浦知县升台湾府抚民理番海防捕粮通判，又授噶玛兰厅通判，官阶加一级。在台湾率流民垦荒，发展经济。咸丰三年（1853），台中吴槎起事，正官奉命前往查办，抵大陂口，中埋伏，兵溃，伏剑自刎死，年五十六，安葬于台湾城门外猪拱岭。事平，朝廷旌表忠烈。光绪《台湾通志·列传·政绩》说：“政勤慎，数月结讼牒六百余。有应兴革，行之务尽其力。厅属防番，例设隘丁。隘首侵丁粮，防守懈，则番出为害。正官谕其弊，常亲临各隘督责之。”赵藩《续漱石斋遗稿序》赞其“学行粹美，处有守而出有为”。其著有《续漱石斋遗稿》《兰溪唱和集》。

噶玛兰又叫蛤仔难，是台湾当地原住民族语言的音译，即今宜兰县。噶玛兰原来隶属于淡水厅，清政府于嘉庆十七年（1811）单独增设噶玛兰厅。董正官到任后，重视噶玛兰文化教育，亲任噶玛兰仰山书院山长，令原住民子弟与汉民同于书院读书，亲自课读，敦品励学，令文风兴起。为了让“官斯土者，征文考献，因地制宜，为海外苍生长治久安之计”，^①他监修《噶玛兰厅志》（晋江陈淑均纂）八卷，是为宜兰第一部方志。

董正官在噶玛兰写的诗，载于陈淑均纂道光《噶玛兰厅志》卷八、陈培桂纂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五，有《由鸡笼口上三貂岭，过双溪到远望坑界，入噶玛兰境》《兰阳杂咏八首》《兰防即事》《琉球难夷遭风到境，加意抚卹，照例护送；诗以纪事》等。这些诗不见于《续漱石斋遗稿》，今人张明曾《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情系大理·董正官卷》（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亦未收录，以后应注意辑补。而连横《台湾诗乘》、陈汉光《台湾诗录》、赖子清《台湾诗醇》等台湾诗歌总集却有收录。

《由鸡笼口上三貂岭，过双溪到远望坑界，入噶玛兰境》有长序：“己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菊秋二十一日，由南台配渡登舟，翌日出五虎门。适在立冬期内，风汛靡定，驶泊黄歧、三沙等处，候四十五夜之久。葭月六日，由三沙放洋，是夜风涛大作，撞击如雷，船前身水漏满舱，无从寻补，舟人大恐，正过黑水沟是也；十余人尽夜掣汲不替。天晓见山，舟已南行；转帆折往东北，午后收泊鸡笼口，此行险矣哉！”诗云：

闽峤东南尽海湾，重洋突涌大孱颜。
鸡笼口踞全台北，信否来龙自鼓山？
不畏番林翳翳迷，不嫌鸟道与云齐。
盱衡小立三貂岭，大海茫茫转在西。
一夜飞逾黑水沟，山中又见大溪流。
危帆甫卸还呼渡，真个无边宦海浮。
云水天真以漏名，山灵慰我霁颜生。
海邦风气殊中土，不喜随车雨喜晴。

鸡笼口即今基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城市。同治《淡水厅志》卷十四载庚子九月镇道会禀《台湾十七口设防状》说：“大鸡笼万山崇峻，下多深潭急溪。……大鸡笼极高，俯瞰全台。”三貂岭在基隆和宜兰之间，山峰高耸云霄，云雾缭绕。《噶玛兰厅志》卷一载：“三貂大山：在厅治北七十余里，以地得名。中分大溪，溪北属淡水，溪南属噶玛兰。山路崎岖，溪涧丛杂，虽行旅维艰，而实入兰之孔道。”双溪位于今台湾新北市东部，境内多山。牡丹溪及平林溪在境内交会，

^① 董正官：《噶玛兰厅志序》，陈培桂纂辑同治《淡水厅志》，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编纂《台湾文献汇刊》第五辑，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故名。望远坑在今新北市贡寮区。

这组诗是董正官乘船从南台经台湾海峡（黑水沟）到达基隆，再从基隆经三貂岭、双溪、望远坑到噶玛兰时作的，描写了沿途大海茫茫、山势险峻、道路艰难的景象。这条路面向太平洋，山光水色极美，但当时开发尚不充分，所以行走不易。而登上三貂岭，扬眉举目，自豪之感油然而生，突出了台湾和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基隆雄踞台北，而“来龙自鼓山”，是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董正官在《闻有量移葛玛兰通判之信咏以志感》中说“涉波忠信平时凛”，表明他是怀抱对国家的忠诚到台湾的，这组诗表现了他的爱国情。

《兰阳杂咏八首》内容较丰富，有的写噶玛兰自然景观。如《东海（三港通洋）》云：

此去汪洋接太空，传言万水尽朝宗。
台阳琅峤难南渡，浙海舟山尚北通。
乌石潮生归艇月，龟峰云起列屏风。
蔡牵败退朱瀆走，安土无忘击贼功！

噶玛兰东面是太平洋，此诗首联描写了太平洋浩瀚茫茫、汇聚万水的景象。第三联写乌石港和龟山。《噶玛兰厅志》卷二“水利·附考”载：“乌石港在头围汛，离厅北三十里。‘石港春帆’为兰阳八景之一。”《噶玛兰厅志》卷一“山川”载：“龟山（一名龟屿）：在厅治东六十里海岛，以形得名。岸临无际，孤屿耸起，与玉山遥遥作对。其萦波蹙蹙，近复与沙汕蜿蜒，天然作厅治门户。形势家所谓龟蛇把口是也。山周二十余里，高二百余丈，朝旭初升，变幻万状。将雨，则嘘雾咽雷，声如震鼓。”尾联写嘉庆年间清廷击败“海盗”蔡牵、朱瀆事，表示现在噶玛兰已经平安，不能忘记前人的功绩。

《仰鼻（入兰洋路）》写由海路进噶玛兰的艰辛：

鳌岛斜拖象鼻长，天公设险界重洋。
嘘帆兼候风南北，钩舵时防石显藏。
米艇掩边行尚稳，草船浮海势难狂。
梭巡楼舰终须慎，艤舡营师^①水一方。

《噶玛兰厅志》卷一载：“鼻头山（俗呼仰鼻）：以形得名。在厅治东北水程九十五里，与淡水洋面交界。此山直穿海波，形如象鼻，长十数丈。”此诗首联说鳌岛、象鼻山伸入太平洋，似乎是天公有意设立险阻隔开陆地和大海，以护卫噶玛兰。颌联上句写行船要看南北风向，“嘘帆”即风吹船帆；下句写行船时必须时时提防或明或暗的礁石。《噶玛兰厅志》卷一载：“龟山其龙从苏澳穿海而来，一路石礁，高者如拳，小者如卵，隐隐跃跃，如起似伏。”颈联上句说运米船在岸边行走还算稳当，下句则用草船借箭故事，说草船到了大海里也难逞其狂豪之势。尾联想到驻守艤舡的水师随时开船巡视，必须特别谨慎，以免翻船，也暗示保卫台湾安全，必须有武装力量。

《三貂（入兰岭路）》则写从陆路进入噶玛兰之艰难，也描写了沿途景象：

想象三峰天外峽，现从岛国指三貂。

^① 艤舡营师：《淡水厅志》卷八上：“艤舡营：旧制，额设北路淡水管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五员、额外二员，马步战守兵二百八十一名；官马十八匹、兵马六匹。驻扎艤舡，隶彰化北路协副将统辖。嘉庆十三年，改设水师游击一员，兼管水陆；系福建水师右营游击移驻。道光四年，添设参将；为台湾艤舡营参将。嘉庆十三年，又添设守备一员，水兵三百五十二名，战船二只。综计兼辖水陆原设兵共六百三十三名。”

猿梯直上云千仞，鸟道惟通路一条。
望若茫茫西海隔，开兰步步北关遥。
内山樵径来茶客，说距新庄只两朝。

有的写噶玛兰气候，如《漏天（秋冬多雨）》写噶玛兰多雨：

闻道黔中雨势偏，秋冬兰雨更连绵。
气迎塞北风掀浪，地处瀛东水上天。
补石欲邀娲再炼，变桑谁信海三迁？
可怜冲压艰修复，租税年年泣废田。

台湾属热带亚热带海洋气候，降水丰沛。诗文把噶玛兰与贵州对比，贵州有“天无三日晴”之说，而噶玛兰秋冬时节，阴雨连绵，比贵州还厉害，仿佛天出现漏洞，没完没了倾泻雨水；秋冬北风侵入，与南方暖湿气流交汇而降雨，大雨年年造成泥石流，冲毁、掩埋农田，修复极难，农民完不成租税，只好看着废田哭泣。因此，他想请女娲重新炼石补天，堵住漏洞。这是仁者之心，体现诗人对农民的关怀。

有的写噶玛兰民俗。彼时台湾少数民族有“生番”“熟番”之分，董正官都有写到。熟番是住在平坝，以农耕为业，开化程度较高的原住民。《番社（化番成社）》写熟番：

献地当年此熟番，社分卅六驻平原。
译名武歹龟刘别，问俗榛狂馘舌存。
金鲤鱼悬双额喜，刺桐花发一年论。
斗醪尺布售摹纸，忍极田租汉仔吞。

“社”是台湾基层社会组织。诗文说噶玛兰熟番共有36社，当年他们向朝廷献出属地，住在平原地区，以耕种为业。他们会说汉语，也有民族语言（馘舌）遗存。颈联写他们的门户上挂着干鱼，生活富足美满，还写到他们根据刺桐花开落计年的习俗。尾联写某些不法汉人用少量酒、布跟他们赌博，他们常常吃亏，严重的情况下，还要用缴纳田租的钱来抵偿赌债。董正官同情他们，对“汉仔”的欺诈行为予以谴责。

生番则是居住高山地区的原住民，以狩猎为生，文明程度较低，雕题凿齿，民风彪悍，还有猎头习俗。清政府平台后，为了保护他们，专门划出他们的世居地作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区域，不准外人侵扰。《生番（甘隘防堵）》：

海角苍生共此生，眈然何独戾人情？
饰金怪具鬻髅癖，饮血群归鸟兽行。
番割得毋忻构祸，铁工疑亦暗贲兵。
虽言隘隘难防遍，鬼怨糜粮瞰最明。

诗文说天涯海角的人类都是一样的，独独生番的行为与常情相悖。他们杀人后，把人头骨作为装饰品挂在身上，其实这是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颈联写某些汉人协助生番制造祸端，铁匠暗中为他们打造兵器。关于“番割”，曹士桂《宦海日记》有记载：“以汉人而娶番女，晓番话，谓之番割。非汉人之奸诈桀骜、凶恶异常者，不肯为，不能为也。”^①又《淡水厅志》卷十一载：“沿山一带，有学习番语，贸易番地者，曰‘番割’。贩铁锅、盐、布诸货，入市易鹿茸、鹿筋、鹿脯、鹿角出售，其利倍蓰。生番引重，以女妻之。”“番割”以闽粤商人为多。因此，噶玛

^①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兰虽然设置了20道关隘，仍难杜绝生番劫掠，但他相信他们会得到鬼神的报应。诗中有对生番的不敬之辞，以今视之，自然不可取。深层次分析，见后文“讨论”部分。

五、曹士桂：圣祖勘乱，柔此蛮方

曹士桂（1800—1848），字丹年，号馥堂，蒙自鸣鹭村（清代属开化府文山县）人，道光壬午（1822）举人，历任江西广昌、南昌等知县，洁己爱民，人皆德之。后调福建省台湾北路（鹿港）理番同知。不久，改淡水厅抚民同知。淡水厅初设于乾隆六十年（1795），掌管台湾中部以北区域，治所先设彰化，后移至竹塹（今新竹县）。同知为淡水厅首长。因德能突出，上峰专折保荐台湾知府，任命未下而卒，终年47岁。诰授奉政大夫，加中宪大夫。陈培桂纂同治《淡水厅志》卷九上“名宦”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淡水厅同知。甫三日，闻大甲分类之谣，驰往谕告，遂释。文字案牍，悉出己手，判断如流，案无积牍，顾未尝妄刑一人。尤神于缉盗，豪右惮之。喜栽培土类，试期绝于请。生平蔬粝自甘，严操守，谓陋规非分之费，悉却之。才久阅月，以劳卒于官，祀德政祠。事闻赐恤，祀昭忠祠。”

曹士桂著有《宦海日记》，述其赴台、治台情况，以及台岛自然风光、民风民俗。日记手稿饱经磨难，仅存残本，士桂后人将其捐赠云南省博物馆，后经整理出版，成为了解清中期台湾社会的珍贵史料。日记中保留了其少量诗作，格外珍贵，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将其编为《曹士桂与宦海日记》出版。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曹士桂调台湾北路理番同知。在晋谒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按察使、署理布政使陈士枚等大员，领取指示后，二月从泉州出海，经两天一夜到鹿港，写了《东渡》组诗，共8首。诗曰：

包天惟海，海上有山。绵亘千里，碧水回环。
莽莽莽莽，混沌番蛮。圣朝开辟，锡名台湾。
台湾大岛，在海中央。圣祖勘乱，柔此蛮方。^①
设官分职，恩普德洋。来莅兹土，一苇远航。
茫茫大海，渺渺孤舟。捧檄东渡，泛彼中流。
帆随风转，水与天浮。踌躇四顾，快哉壮游。
海天空阔，更爱午晴。太仓一粟，片帆孤征。
涛涌山立，浪接云生。舵楼四望，境绘蓬瀛。
日落海上，雪浪接天。仰见新月，如珪半圆。
碧波澄澈，素影娟娟。乘槎有客，飘渺欲仙。
海天夜半，月没星多。上下动摇，不辨银河。
北风泠泠，惊浪骇波。孤舟飞驶，欲走蛟鼉。
海天欲晓，红日将升。霞光万丈，赤浪千层。
璀璨闪烁，踊跃腾凌。一轮捧出，烟消波澄。
二月初吉，自西徂东。片帆袅袅，春山融融。

^① 台湾大岛：《宦海日记》手稿残破，第一句首二字残缺，《曹士桂与宦海日记》推定为“台湾”，从之。

藐躬焉托？恍惚凌空。一日千里，快御好风。^①

第一首写台湾的地理特征。第二首写清圣祖平台治台，怀柔台民，普施恩德。第三首总写捧檄赴台。第四首写正午海景。第五首写日落海景。第六首写夜半海景。第七首写日出海景。第八首总写东渡感受。这组诗的好处，一是写出海景之壮观，二是写出作者之豪情，三是写出清朝治台之方略及官员对台之感情，绘景如画，情景交融，英风飒爽，豪气四溢。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曹馥堂正有东坡的浩气和豪情。赴台湾，意气风发，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治理台湾的责任担当。他说：“予自筮仕十年于兹，感戴天恩祖德，朝夕兢兢，思所以仰报于万一，平地大海，视如一致。”^②

《道上行》写初到台湾所见情形：

竹篱茅舍结村居，半饱薯芋半饱鱼。
漫向台阳夸富庶，萧条满眼欲歔歔。
漠漠平原十里沙，一望枯草伴芦芽。
只缘水涝成沮洳，不艺禾苗不艺麻。
双双小鸟弄春晴，上下翻飞得意鸣。
却怪东皋农事急，不闻布谷向春耕。
沿村遍市尽舆夫，聚赌开场作本图。
械斗竖旗争乌合，将来滋患实堪虞。

头二首诗写由于遭受水涝，田野被大水冲下的沙石掩盖，或被积水淹没，种不成庄稼，田里长满野草芦苇，满目萧条，令人感叹；人们住的是茅棚，吃的是红薯、芋头和鱼。第三首写已经到了春耕时节，仍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意为无人耕种。因为焦虑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春天里上下翻飞、欢快鸣叫的小鸟，也引不起他的注意。第四首写村民赌博成风，拉帮结伙，互相械斗，隐伏更大祸患，他感到忧心忡忡。^③言下之意是，不从事生产，陋习盛行，到生活无

① 这组诗今存为残破漫漶的手稿，《曹士桂与宦海日记》整理时有辨识错误，好在它附了手稿复印件，可据以对勘。“恩普德洋”之“德”，《曹士桂与宦海日记》141页整理稿为“得”，误；手稿为“德”。这句意为朝廷对台湾恩德广大、普惠。“泛彼中流”之“泛”，手稿作“汎”，为“泛”之异体字，即乘船；《曹士桂与宦海日记》141页整理稿为“汎”，不明字义而误。“如珪半圆”之“珪”，《曹士桂与宦海日记》142页整理稿为“洼”，形近致误；手稿为“珪”，意为美玉。

②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40页。

③ 关于清代台湾不同群体之间的械斗，当代台湾学者陈春城说：“台湾除了天灾地变与外力的入侵外，最可悲的是分类械斗。分类械斗大致可分为闽粤间的械斗、漳泉间的械斗、漳泉闽粤间合纵连横的械斗、异姓间的械斗以及不同乐团祖师爷间的械斗。发生械斗的原因，主要是移民为求自保，同乡聚居，为了土地纠纷、地盘问题，或为女人争风吃醋而造成双方的冲突，彼此呼朋奥援，群体间冲突越演越烈，又因政治力控制薄弱，官方无力仲裁，以致台湾二百年间大小械斗连绵不已，中南北各地层出不穷。……台湾人之所以很容易为小事而发生冲突，进而造成分类械斗，就是台湾人具有生而有之的戾气。人们因为戾气，不知彼此容忍、宽恕，以致成为严重的分类械斗，实为台湾人的悲哀与遗憾。”见陈春城《台湾古典诗赏析》，高雄：河畔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台湾诗人写分类械斗的诗不少，金门诗人林豪《招魂曲》（《台湾诗钞》卷五）序说：“淡北自丁巳、戊午间连年分类械斗，死亡者以万计。事平，里人为道场于艋舺龙山寺超荐亡魂。时阴雨连日，天色愁惨。余感之，为此诗也。”诗曰：“是日阴霾匝地气凄惨，新鬼故鬼声啾啾。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闻哭声震天天为愁。去年蛮触苦相怒，忽地烽烟不知故；朝驱子弟寻仇家，暮挺干戈逢狭路。生灵刈尽村为墟，碧血消沈万骨枯；化作虫沙归未得，魂招何处徒嗟吁！嗟吁魂兮归来些，莫向沙场犹醉卧！忏悔应悲杀业偿，皈依且礼空王座。空王座下众生愁，汝曹任侠夫谁尤！何不荷戈去杀贼，死为忠义犹千秋！”可见械斗之惨烈。

着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字里行间，在在流露出作者的忧民情怀。

曹士桂有一篇《闽浙制军、大司马刘公查勘投诚献地吁请开垦水沙连六社番地番情日记》，逐日记载闽浙总督、兵部尚书刘韵珂奉命查勘今嘉义县生番属地的情况，有重要史料价值；记事详明，绘景传神，情感浓郁，也是一篇漂亮的散文，文学价值很高。如写日月潭一段：

由社北过蛮丹岭，二里许，望见群山中环一潭，潭周广十余里，中峙小山，山南水圆如日，山北水湾如半月。询社人，潭名“日月”，山名“珠仔”。青嶂白波，水云飞动，饶有蓬瀛之观。……番民进鸡只，且请公登蟒甲。公曰：“此情不可拂也，此境不易得也。”徒步率文武属吏登蟒甲。蟒甲长三十余尺，中广约八尺，深半之，只一大木而刳其中，毫无增益，古制也，舟之始也。番民七八人荡小桨而行，复以二蟒甲随后，持网捕鱼。每得鱼，辄欢呼以献，复操番歌以娱公，声呜呜不可辨。溯洄溯游逾时，舍舟登珠仔山，于古树下借草茵布席而坐，烹茗煮酒，取鲜鱼烹之、炙之。无何，风驰雨来，有虹见于半山，尾蟠谷，首注潭，弯环对山如半镜，光彩射几席间。俟而雨止虹消，山半吐白云如缕，缤纷四散，虹复见于山顶，夕照西匿，明月出山上矣。公与属吏举觥互酌，商酌安抚番民事，谈时政，咏古诗，亶亶不倦。月凉夜静，清露如珠，颗颗滴席上，聚而流，衣裳尽湿。公命以大坛酒给从人与群番畅饮，曰：“以此御寒，且以同饮。”盖公之忧乐同民，随时随事无在不征其性天之自然也。^①

这应该是关于日月潭的较早文学书写，充分表现了日月潭之美——青山、碧水、白云、彩虹、独木舟（蟒甲）、古树，如诗如画。关于蟒甲的描写，反映了日月潭民俗，史料价值很高。一些细节描写显示了高超的文学水平，如“月凉夜静，清露如珠，颗颗滴席上，聚而流，衣裳尽湿”。此外，将刘韵珂对番民的尊重、关心和番民对刘韵珂的拥戴表现得很好。

六、讨论

从云南人治台业绩及其书写的关于台湾的诗歌中，可以提出几个问题进一步讨论。

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诗人们认为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台湾人是大陆移民，绝非中华化外之地。董正官“鸡笼口踞全台北，信否来龙自鼓山”“浙海舟山尚北通”指出了台湾与大陆地理上的天然联系。曹士桂日记《台湾形势·风俗杂说》谓：“台湾，南海中大岛也，闽、粤、江、浙屏蔽。山脉发自福州，渡海三百余里至淡属鸡笼山起祖，蜿蜒南行，至凤山之沙马碛而尽。南北绵亘约千二百里，东西半之。西南与福（州）、兴（古称兴化，今莆田）、泉（州）、漳（州）遥相值。”^②其《望星歌》说“番民族类溯洪荒，中分一派来台阳”，指出台湾原住民族是远古从大陆迁移过去的，台湾人与大陆人血缘相连。山东济南人、道光署理噶玛兰通判柯培元在《生番歌》中说：“中有毛人聚赤族，群作鸟语攀云巅。黔面文身喜跳舞，唐人头颅汉人肝。或言嬴秦遣徐福，童男童女求神仙。神仙不见见荒岛，海岛已荒荒人烟。五百男女自配合，三万甲子相回环。不识不觉太古，以似以续为葛天。”此文指出生番有汉人（唐人亦指汉人）的头颅和心肝，即容貌和心理都有汉人的特征。他推测他们是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神仙的徐福所率五百童男童女的

^①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7页。

^②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74页。

后代,^①这固然不必当真,但生番亦为大陆早期移民有考古学的支持,是没有疑义的。^②著名诗人丘逢甲《台湾竹枝词》说:“唐山流寓话巢痕,潮惠漳泉齿最繁。二百年来藩衍后,寄生小草已深根。”意为清朝二百多年间,大陆人移居台湾,以潮州、惠州、漳州、泉州人最多,后逐渐繁衍,到晚清已是根深叶茂。首句说他们不忘故土,常常谈起祖籍地的事。“唐山”是唐人之山,代指中国。现在有些“台独”分子鼓吹一切台湾原住民属于所谓“南岛民族”,这种绝对化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表明“台独”意识形态对客观事实的扭曲到了何等荒诞的程度。

二是清政府的治台方略及成效。中国数千年历史,形成基本的国家治理方略,就是文武并用,对台湾也不例外,先是抚绥,即以道义相感召,抗命不尊,则以武力征服,征服后则以文化之。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安之之法,首先是保障物质利益,具体表现为发展经济,降低税赋,改善民生,拯灾救溺;其次是以文化导,往往通过道德伸张、文明建设感化人心,让人心悦诚服,认同治国者,使统治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进而“形成基于文化—价值认同的多民族共同体”,建立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走上优良治理之道。^③曹士桂《东渡》语“圣祖勘乱,柔此蛮方。设官分职,恩普德洋”,正体现了康熙的治台方略:武力收复台湾,然后加以怀柔,广施恩德,开其气运。赵士麟上《台湾善后疏》说,台湾收复后,要“劝农桑,设学校,数年后不特休养生息之众堪埒外藩,即诗书礼乐之化,亦可渐兴而比美于内地,一统无外之宏规,孰大于是”?董正官办仰山书院,也是为了以文明教化台民。当然,如果梗顽不化,挑战朝廷权威,也只能诉诸武力,所谓“军威半壁锁台中”“有地剪鲸鲵”“安土无忘击贼功”,均有此意涵。董正官因此殉职。张于恭任台湾府南路海防同知,“淳良者感以恩,顽固者摄以威”,也体现恩威并施、文武并用的治台方略。

清政府长期的生养教化,大大提高了台湾的文明程度。万友正《台郡》“化行无内外”可以作两个层面的解读:首先是政策层面,清廷对台湾与内地一视同仁;其次是效果层面,当时台湾的文明教化已可“比美于内地”。吴廷华《社寮杂诗》(《淡水厅志》卷十五下)末一首载:“金饰脂涂旧髑髅,争相雄长在操矛。而今渐晓秋曹法,不挂人头挂兽头。”自注:“土番杀人,取其头骨剔净,饰以金,脂其口,悬之门闼,以示武。近亦畏法,取兽头悬之。”番民渐渐知道法律,以兽头取代人头,正是风俗改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霖《赤嵌竹枝词》载:“渐消粗犷渐恬熙,大杰巅头立社师。海宇同文臻雅化,爱听童子诵毛诗。”^④说清政府在赤嵌(今台南)番社建学校,派老师教授儒家经典,使台湾番民逐渐雅化,性情由粗犷变得和乐安宁,臻于文明。曹士桂说:“(水沙连献地内附之番民)易穴居而宫室,易羽皮而冠裳,易鲜食而烹饪。井养学教,俾獠獠之众,咸进于郁郁彬彬。”“二百年来,外山延袤千数百里地,声名文物,竟比中华。”^⑤

三是“番害”“害番”和理番问题。“番害”是指生番逸出属地侵扰汉人和熟番,“害番”是

① 台湾人是徐福的后代在原住民中是普遍的传说。吴廷华《社寮杂诗》(《淡水厅志》卷十五下)第一首:“五十年来渤海滨,生番渐作熟番人。裸形跣足鬚髻发,传是童男童女身。”自注:“《郡志》相传,秦时方士留童男女于此,土番皆其所遗。”又,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卷一:“秦始皇并天下,乃使人费童男女入海求之。或曰,蓬莱、方丈为日本、琉球,而台湾则瀛洲也;语虽凿空,言颇近理。徐福有来台湾,今虽无可确证,而五百男女之散处日本、琉球者,后嗣不绝;然则秦时男女或有往来台湾者,未可知也。”

② 参阅蔡保全:《“东山陆桥”与台湾最早人类》,《漳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31—36页。

③ 参阅陈友康:《中华德治教化理念与和平和谐进道路》,《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43—48页。

④ 陈春城:《台湾古典诗赏析》,高雄:河畔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⑤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3、154页。

指汉人侵害番民权益。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严峻的问题，也是政府处理台湾民族问题（理番）的难点。诗中多有反映，曹士桂《宦海日记》记述亦多。

番民特别是“生番”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阶段，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确实有一些野蛮行为，如嗜杀、好械斗等，常以暴力手段劫掠他人。董正官《兰防即事》说“番害数从溪径出”。《噶玛兰厅志》卷二“关隘·附考”云：“噶玛兰地势，东面海，西、南、北三面皆山，所在生番出没。自设官后，沿山次第设隘，以壮丁守之，犹有生番逸出杀人。”又说：“内山生番嗜杀，旧曾拥出为乱。”董正官《生番》云：“饰金怪具髑髅癖，饮血群归鸟兽行。”《淡水厅志》卷十一引《东征集》载：“生番杀人，台中常事。……其杀人，割截首级，烹剥去皮肉，饰髑髅以金，夸耀其众。众遂推为雄长。”因此，生番杀人在当时是极为恐怖的事情，如贵州人、署理噶玛兰通判李若琳《防番》（《噶玛兰厅志》卷八）所说：“奈有髑髅癖，能无性命忧？”生番杀人，有的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报复，但“不尽由侵扰而然”（《淡水厅志》卷十一引《东征集》），是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尽管这些言论对生番不乏偏见和歧视，不可取，但世界各地原始民族普遍具有杀掠行为，则是客观事实。看待此类问题，要用历史主义眼光。

“害番”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偷入生番领地垦殖，破坏生番生产生活环境，侵占生番利益，或是霸占熟番土地。阮蔡文《竹塹》（《淡水厅志》卷十五下）反映了这种情况：“竹塹周环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年年捕鹿丘陵北，今年得鹿实无几。鹿场半被流民开，艺麻之余兼艺黍。……鹊巢忽尔为鸠居，鹊尽无巢鸠焉徙？”竹塹即今新竹，为彼时淡水厅治所在地。柯培元《熟番歌》（《淡水厅志》卷十五下）所写更为典型：“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贱如土。强者畏之弱者欺，无乃人心太不古！熟番归化勤躬耕，山田一甲唐人争。唐人争去饿且死，翻悔不如从前生。窃闻城中有父母，走向城中崩厥首；啁啾鸟语无人通，言不分明画以手。诉未终，官若聋，窃视堂上有怒容。堂上怒，呼杖具，杖毕垂头听官谕。嗟尔番，汝何言？尔与唐人吾子孙，让耕让畔胡弗遵？吁嗟乎！生番杀人汉人诱，熟番翻被唐人丑！为民父母者虑其后！”反映“唐人（汉人）”侵占番民土地，导致番民“饿且死”；番民向官府控告，昏庸奸恶的官员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斥责、杖击番民，让番民走投无路，柯培元对此予以谴责。另一种是欺骗番民。番民诚朴，一些奸诈汉民逞其狡智，诱骗番民。董正官《番社》所说“斗醪尺布售摹纸，忍极田租汉仔吞”即指此。番民醒悟后，又以杀掠报复，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台湾治理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即如何对待番民的问题。当代一些论者从文化相对论和民族问题的“政治正确”出发，认为番民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外加的干预是“侵害”，是不正当的。这种说法看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是在维护番民的权益，但揆诸实际，却有问题。一方面，番民确实有一些野蛮行为，如嗜杀、好械斗等，还有曹士桂写到的赌博等陋习，这些问题，不能视为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不加引导、化育，他们就难进步。这里面，确实有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蒙昧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找到真正保障番民权益的办法。

清政府在处理番民问题上，是十分谨慎的。例如，制定政策，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熟番和生番。为了保护生番，划出生番世居地，竖立禁碑，不准外人进入开垦，官府不向生番征税，实际上就是赋予生番自治权。还专门设置“理番”官员负责民族事务。清圣祖“畀生番以水沙连（日月潭一带）内山地”，说：“以尔世有此土，不忍殄灭。畀尔内山，俾相生相养，以长厥世，土牛厉禁（严禁在生番属地内开垦田地），似外之实保之。”^①《曹士桂与宦海日记》载，嘉

^①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3页。

义县集集埔天后宫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鹿港理番同知、彰化县知县同立的界碑，上镌“奉宪设立禁碑。生番界内，偷入私垦者斩”。行里许，集集汛弁口又有道光五年（1825）鹿港理番同知邓、北路协副将赵、彰化知县李所立禁碑：“奉旨永禁开垦，如违拿究。”他还说：“鹿港同知职司理番，每年例同北路协副将入山查阅一次。”^①可见清廷和台湾地方政府在保护原住民领地方面态度是坚定的，执行是有力的。

但受利益驱动，汉民和熟番会私入生番属地垦殖，造成矛盾。官府发现，也会查办，毁其房屋，驱逐出来，“诘奸除暴”。后来，此种情形渐多，厉禁势已难能。另外，生番经汉人和熟番之影响，追求先进、稳定的生活，主动要求“归化”。嘉庆十六年（1811），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噶玛兰东西势社番，前皆不谙耕作，是以埔地听汉人占垦。迩来与汉人相习，日久渐知耕种（《噶玛兰厅志》卷二“番社·附考”）。”曹士桂说：“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署丞史偕叶协戎往（查阅），有埔里、水里、田头、审鹿、猫兰六社生番老幼迎道左，且投诚献地，吁恳内附，求官经理。史丞悯其穷困，察其献地情意真挚，乃遍历各社，具得其嗷嗷待哺状，据情申详于闽浙制军、大司马刘公。”^②刘韵珂即上奏道光帝，道光以事关重大，没有马上允准，命刘韵珂亲历踏勘，查明实情。刘韵珂跋山涉水，亲见生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归化”情意诚恳，奏请调整政策。

可见，清政府“重熙累洽，保民怀柔之深仁者，未尝不周以至”。^③随着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生番主动“献地投诚”，请求“设官经理”，这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是有利的。邓传安《番社纪略》（《淡水厅志》卷十五上）说：“（生番熟番）幸沾皇化，维有历年，地益辟、民益集、番益驯。”不是靠强迫，而是靠促进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感化”，让其融入社会发展进程。这是清政府治台方略及成效的具体体现。曹士桂《望星歌》反映了生番归化情况：

番民族类溯洪荒，中分一派来台阳。
愚拙天生昧耕作，抽藤逐鹿为生活。
膏腴有土未垦田，茅大如竹草绵绵。
户日贫弱丁日单，秋啼饥兮夏号寒。
视彼熟番饱且温，有干有年长子孙。
因之献地乞皇仁，愿得衣食养此身。
天子命公巡此土，婴儿今日得哺乳。
沧肌浹髓公恺慈，诘奸除暴公神武。

生番社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有肥沃的土地，但是不会耕种，生活艰难，啼饥号寒，导致人丁减少。他们看到熟番生产生活方式先进，温饱无虞，子孙繁昌，于是主动献地，请求内附，享有皇帝之仁爱。后四句诗称美刘韵珂，说他奉旨巡察生番，深刻感受番民的处境和“内附”的诚意，对番民仁慈亲切，像对待婴儿那样对待番民，并惩治侵害生番的汉民。

四是诗人对台民的态度。古代官员，多是儒家仁政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对百姓有“民吾同胞”情怀，“忧乐同民”，对台民也一样，如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二十艺文一）所说：“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因此，赴台官员治台的目的就是谋求

①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3页。

②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4页。

③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54页。

“海外苍生长治久安”。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官员自私、无能、奸诈，如柯培元《熟番歌》所写，但确非主流。云南官员因治绩循良而被派往台湾，对台民推诚相待，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惓惓民生”，引导他们走向文明。曹士桂“奉檄开辟番地，教耕凿火化，劝农立学，开草昧以诗书，易穴居以栋宇，番民得生安利乐”，^①其《道上行》对台民的关怀溢于言表。董正官《余埔（荒复不一）》载：“百里民番错杂居，耕三耨一复何余！荒坑试种人拚兽，浮埔经秋佃变渔。锄力丁男宜体恤，戈声甲仗戒纷拏。纵存地角济多隙，案吏犹谈报垦书。”说台民耕地艰辛，与野兽争夺土地；他们十分勤劳，即使山角隙地，也报请官府同意开垦；表示对勤劳耕作的人要加以关怀照顾，同时告诫他们要改变好械斗的习气，真是苦口婆心，古道热肠。上引曹士桂《望星歌》所说“沦肌浹髓公恺慈”说的是刘韵珂，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多数治台官员的态度。

治台官员关怀番民的命运。汉人、熟番和生番的纠葛争斗，从政治和法律层面看，是前者以违法违规行为侵害后者；从社会发展层面看，未尝不是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竞争。在竞争中，生番处于劣势，土地面积萎缩，人丁减少，后果很严重。政府一方面是打击汉民、熟番的违法行为，保护生番；另一方面是引导生番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化生为熟，增强其生存和发展能力。曹士桂在给上级的禀稿中说：“（生番）实属丁少势弱，久见凌逼于熟番，故特内附改熟，投诚真挚，嗷嗷待哺。开垦则给租授食，一切官为维护，尚可长其子孙。否则熟番挟仇，难延岁月，非死则徙耳。即使二三十年后，丁盛势强，亦必受恩知感，断无反侧之虞。”^②其对生番前途至为忧虑，主张接受生番的“投诚”“内附”，维护其生产生活，以延续其民族命运，并强调了政府在“维护”番民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待汉番矛盾、生番熟番矛盾，也大致能依据事实公正处理，只论是非而不论族群。

董正官还有一首内容别致的诗《琉球难夷遭风到境，加意抚恤，照例护送，诗以纪事》：

得生众命赖渔船，恭顺中山天亦怜。
破艇底能漂海上，大龟屿恰属兰边。
馆餐仰体怀柔远，额手欣看顶礼虔。
此与琉球深夙契，前年护送又今年。

末句自注：“己酉（1849）冬内，前任移交难夷林廷栋等三十四名，当经护送。今辛亥（1851）嘉平，又救获难夷官平等十四名，拟于新春护送。”这说明琉球难民被风吹到噶玛兰是常有的事，他们都得到官府的照顾抚恤，并在合适时间被护送回琉球，这已形成制度。中山是琉球最大的藩国，明朝即归顺中国中央政府，朝廷册封其国王。云南建水人萧崇业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是明朝外交史上的佳话。“与琉球深夙契”即指此。“馆餐”联说噶玛兰官府以怀柔态度为难民安置住处和饮食，难民额手称庆，虔诚敬礼。官员们对琉球“难夷”都有这样的体恤关怀，对自己治下的台民更不会没有仁爱之心。

五是台湾人对治台官员的态度。因为大多数治台官员是循良的，所以台民对他们满怀感激和敬意。如董正官平叛战死，淡水厅民于五谷庙设位祭祀。曹士桂“疾歿之日，台人罢市以哀。椽返之时，淡民沿途而祭”^③。连横的《台湾通史》说士桂在台“善听讼，有狱则断，积案一消，未

^① 曹廷鏞等：《皇清诰授奉政大夫加中宪大夫祖考藪堂曹公府君墓》，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88页。

^② 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68页。

^③ 吴崇仁：《藪堂公故里碑序》，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曹士桂与宦海日记》，第190页。

尝妄刑一人。性恬淡，无仕宦气，蔬粝自甘。淡厅固有陋规，屏不取。受事九月，以积劳病，犹力疾视事，遂卒于任。淡人士念其惠，祀德政祠”。淡水曹公祠一直保留到现代。尤为动人的是，民间还有曹士桂死后变为竹塹城隍神，继续护佑淡水百姓的传说。诗人林豪作《淡水迎神曲》（《台湾诗钞》卷五）写此事，序云：“淡水同知曹公士桂，云南举人，积劳卒于任，相传为竹塹城隍。”诗曰：

竹城一夜吹灵风，风马云车来长空；清晨士女迎祠下，迎者为谁乃曹公。曹公自昔来守此，以身殉官一载耳；城中是夕哭公时，梦里老僧传公止。喧言公作一方神，万民破涕成一喜；饮食必祭如事生，黄童白叟趋若水。想见公德在民心，民心时时有公留至今；不忍死公那忍去？在左在右彷彿闻公音。绣像千丝锦，写状千黄金；不惜绣公写公抒诚忱。诚忱感天天亦许，使公仍作一城主；借寇还从地下来，脱靴转向祠中聚。由来天心合民心，何幸世世子孙永得奉慈父？而况公心爱民天早知，平生惜未竟设施！斯民饥饱在公抱，斯地老幼皆公儿。生则驱蝗捍贼往往救其死，何况为神尤易为欲为！有如朱邑尝作桐乡长，一坏遗命无他移；公神栖此夫何疑！我闻赤嵌当年陈无已，庙食一方传别史（相传郑氏时，长史陈永华没为郡城城隍）。由来聪明正直每为神，如公至今何尝死！神之来兮灵旗飘，神之往兮灵车遥；迎神送神兮神昭昭，善为福兮灾为消！

诗文说淡水百姓为曹士桂去世而悲伤，而老僧告诉大家，他变成城隍神，仍将在淡水任职，造福一方，于是大家破涕为笑，举行隆重仪式迎接神降临。淡水百姓之所以如此留恋他，是因为他真心爱民，视人民如赤子，恫瘝在抱，驱除灾害，捍御盗贼，保境安民，而人民也就视之如慈父，“想见公德在民心，民心时时有公留至今”。于是，曹士桂赢得人民的由衷爱戴而不朽：“由来聪明正直每为神，如公至今何尝死！”诗文写得深情、感人。

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促进了台湾社会进步和台民福祉。当代一些“台独”分子把清政府对台治理称为“外来政权”，抹黑清政府的治台业绩，离间两岸关系。他们忘了，如果没有清政府的治理，也许他们的祖先都到不了台湾，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可见“台独”意识形态可以把事实真相扭曲到何种程度，可以把人变到何种昏聩、愚蠢的程度。这种做法，悖逆天理人心，自然不可能得逞。

责任编辑：朱家麟

近三十年许德珩先生相关研究述评与展望

胡 辉¹，宋宁刚²

(1.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 临沧 677099；2.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近三十年，相关许德珩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其生平、思想、政治活动等，这些成果为继续深入研究许德珩先生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诸如研究相对零散，不够系统，理论研究有待提高，部分研究有所重复，文献整理力度不够，研究领域仍需扩展等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有关许德珩先生的研究，如何与我们的时代话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我们一直在提倡家训、家风，由是，关于许德珩先生的家族和家风研究，也应当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凡此种种，才能在许德珩研究的第二个三十年，继续深耕，不辜负历史的期待，做出标志性成果，以告慰许德珩先生，同时嘉惠后学。

关键词：三十年；许德珩；研究；述评；展望

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1-0078-07

2020年是许德珩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8月6日纪念许德珩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研讨会在江西省九江市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武维华说：“许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多个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不懈奋斗、奉献终生。我们纪念许老，就是要学习他朴素纯粹、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对革命进步、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就是要学习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就是要学习他无私奉献、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①2020年也是九三学社创建七十五周年，因此做好许德珩先生的研究工作，“对于九三学社深化参政党理论和社史研究，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进一步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激励全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②由是，笔者认为在全面展开许德珩先生研究工作之前，回顾许德珩先生研究的学术史，对近三十年许德

作者简介：胡辉，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美学；宋宁刚，哲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文艺与传媒。

①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纪念许德珩诞辰130周年研讨会在浔召开 武维华出席并讲话》，2020年8月7日，<http://www.93.gov.cn/xwjc-snyw/303976.html>，2020年12月5日。

②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纪念许德珩诞辰130周年研讨会在浔召开 武维华出席并讲话》，2020年8月7日，<http://www.93.gov.cn/xwjc-snyw/303976.html>，2020年12月5日。

珩先生研究的诸多成果进行详细的爬梳, 十分必要。

一、许德珩先生生平及前期研究概说

许德珩(1890—1990), 原名许础, 字楚生(楚僧), 江西九江人。许德珩先生是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之一, 社会科学界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社会学的先行者之一, 也是九三学社的首任主席、杰出领袖、创始人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许德珩先生的研究, 主要涉及其生平、思想、政治活动等方面, 研究虽然相对零散, 不太系统, 但筚路蓝缕之功仍然值得肯定。这些研究也为未来关于许德珩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回顾近三十年相关许德珩先生的研究成果, 不仅对于学习传承其优秀品质多有助益, 也为弘扬九三学社的爱国民主科学传统, 以及进一步深入、细致、综合地研究许德珩先生的生平及思想, 提供了前期理论基础和材料支撑。

二、相关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学术界对许德珩先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 左用章教授对许德珩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左用章教授在其《许德珩与九三学社》一书中, 首次把许德珩的活动和经历与九三学社联系起来, 侧重叙述许德珩在九三学社创建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说左用章教授开创了许德珩研究的先河。”^① 详细梳理这些成果, 可将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若干文献资料以及学术著作, 如《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九三学社简史》《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九三学社卷》等, 涉及许德珩先生的内容, 主要是其于九三学社早期创建过程中的活动; 另一类是相关论文、随笔, 研究重点涉及五四运动与许德珩、许德珩与九三学社创立、许德珩思想等。

本文拟重点以过去三十年(1990—2019)中, 关于许德珩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论文成果为主要对象, 择其要者, 分门别类进行评述, 以期对许德珩研究的成果有所梳理与廓清。

(一) 生平及成长经历

1. 生平

张弛先生较早编辑了两万余字的《“百岁老人”许德珩年谱》(初稿), 为研究许德珩先生提供了线索和资料。^②《九江师专学报》则于1990年第2期最早刊发了许德珩先生的生平。^③1995年《民主与科学》在九三学社建社五十周年之际, 特辟《九三先贤》专栏, 收录了焦聚川先生的《许德珩事略》, 也是对许先生生平的重要补充。^④

2. 精神成长与观念形成

许德珩先生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 传统学术造诣极深。有关论者认为, 一方面, 儒家典籍对许先生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故柯元先生专门撰文研究中西文化对许先生的影响, 并指出在许先生身上有“改造现实的外在刚强性格, 以及反抗外侮的革命传统”^⑤。另一方面, 许先生在“国内基本上是间接地受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影响……在旅欧期间, 不但

① 张文丽:《论抗战前后许德珩的政治思想》,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09年, 第1页。

② 章程:《“百岁老人”许德珩年谱(初稿)问世》,《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第25页。

③ 佚名:《许德珩同志生平》,《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第11—14页。

④ 焦聚川:《许德珩事略》,《民主与科学》1995年第1期, 第27页。

⑤ 柯元:《中西文化对许德珩成长的影响》,《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第17页。

对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理解更深刻,而且还深受西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这不能不说他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①。回国后,“许德珩在参加的一系列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将中西文化和谐地融合在一起。”^②

(二) 事略

1. 政治、社会活动

郑彧文的《许德珩与九三学社》、刘勉玉的《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与九三学社的创建》、戴红的《爱国亦千秋——许德珩在抗战中的二三事》、许进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与九三学社》等文^③,将许德珩先生的一生贯穿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过程以及九三学社的历史演进中,对于“探索许德珩从一个爱国者到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又演进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轨迹,对于九三学社成员加强自身建设、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④,也有积极意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赴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许德珩先生是受邀的二十九位民主人士之一,“除了中共中央5月2日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还曾经三次邀请许德珩等九三学社领导人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⑤这也是许德珩先生在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之外,作为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抗战胜利后,许德珩先生在北京大学“调动各方面的关系,通过‘九三学社’将社员联系起来,与其它民主党派人士一起,积极团结进步教授,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许德珩为领袖,以‘九三’社员袁翰青、薛愚、俞平伯、劳君展、魏壁、裴文中、闻家驷(民盟)为主体,以进步教授向达、樊弘、费青等为支持的民主教授群”^⑥。这也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德珩先生参与的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

柯元先生在《略论许德珩社会活动的特点》中,认为许先生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其社会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即社会活动的进步性……强烈的群体意识,明确的价值取向,灵活的斗争策略……实事求是,身体力行,调查研究”^⑦。这种概括是比较准确和全面的。

2. 交往

许德珩先生作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领袖,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或政治事务,都离不开与相关知名人士打交道。

回顾生平交友,许德珩先生曾表示,在他所接触的重要人物中,“最令人钦佩的,一是孙中山

① 柯元:《中西文化对许德珩成长的影响》,第19页。

② 柯元:《中西文化对许德珩成长的影响》,第20页。

③ 详参郑彧文:《许德珩与九三学社》,《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刘勉玉:《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刘勉玉:《许德珩与九三学社的创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6期;戴红:《爱国亦千秋——许德珩在抗战中的二三事》,《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4期;许进:《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与九三学社》,《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④ 郑彧文:《许德珩与九三学社》,《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第4页。

⑤ 许进:《“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许德珩》,《团结报》2018年5月3日,第6版。

⑥ 郑志峰,冶芸:《北大民主教授群研究(1945—1949)》,《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1期,第143页。

⑦ 柯元:《略论许德珩社会活动的特点》,《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第1—3页。

先生，二就是蔡元培先生，并称他们都是“青年的表率”^①。王勇的《蔡元培与许德珩的师生情》一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蔡元培与许德珩不平凡的师生情谊。

此外，九萱的《肝胆相照见赤忱——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与中共创始人交往的故事》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许德珩先生与一些中共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的交往，“许德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他经常与许德珩等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交谈，发表他对时局看法，给许德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孟红在《中共领导人与许德珩》一文中则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许先生的诸多称许。如毛泽东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③周恩来曾对许德珩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你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④另外，彭真也说：“许老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参加革命早，是我们党最亲密的朋友。”^⑤张艳华、章慕荣的《毛泽东与许德珩夫妇的一段交往》一文中，也写到了许德珩夫妇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交往细节。

此外，许德珩先生的孙辈许进曾在《许德珩、劳君展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始末》《九三学社的两只“老虎”——许德珩与周培源的交往》《祖父许德珩与吴阶平的一段往事》^⑥等一系列文章中，记述了许德珩先生与部分国家领导人及知识文化界人士的交往。其中，许德珩先生与吴阶平教授之间的往事，被认为不仅是九三学社历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一段佳话”。^⑦

瞿宁淑的《纪念一生正气、艰苦奋斗的秋白堂兄——记原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谈瞿秋白》，则记述了许德珩所了解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文章中说，通过许先生的回忆，“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有了更深的认识。”^⑧可以想见，文章作者瞿宁淑是专程拜望、采访过许德珩先生，才了解到相关事实的。

3. 艺术与养生之道

葛全明的《翰墨芬芳 情满天下——许德珩和他的书法艺术》一文，盛赞许老“少年时即从唐楷入手，后又直追魏晋，写就一手好楷书。……‘人书俱老’这一传统中国书法精神特征，在许老的这两件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⑨。作为新闻特稿的《阅新篇 忆许老——许德珩副委员长与〈中国花卉盆景〉》一文则颇能代表许老的审美观。根据文章的记述，许先生认为：“盆景的艺术价值在于它的意境美，神态美，古朴典雅之中不失自然本色，要做到雅俗共赏、中外共鸣，非

① 王勇：《蔡元培与许德珩的师生情》，《文史精华》1996年第6期，第41页。

② 九萱：《肝胆相照见赤忱——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与中共创始人交往的故事》，《中国统一战线》2014年第9期，第76页。

③ 孟红：《中共领导人与许德珩》，《文史月刊》2017年第9期，第4页。

④ 孟红：《中共领导人与许德珩》，第12页。

⑤ 孟红：《中共领导人与许德珩》，第15页。

⑥ 详参张艳华、章慕荣：《毛泽东与许德珩夫妇的一段交往》，《党史博采》2001年第2期；许进：《许德珩、劳君展向毛主席赠物一事始末》，《百年潮》2005年第4期；许进：《九三学社的两只“老虎”——许德珩与周培源的交往》，《百年潮》2009年第9期。

⑦ 许进：《祖父许德珩与吴阶平的一段往事》，《百年潮》2008年第3期，第51页。

⑧ 瞿宁淑：《纪念一生正气、艰苦奋斗的秋白堂兄——记原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谈瞿秋白》，《瞿秋白研究论丛》2000年第2—3期，第159页。

⑨ 葛全明：《翰墨芬芳 情满天下——许德珩和他的书法艺术》，《中州古今》1999年第5期，第29页。

下许多功夫不可。”^①

这些文章除了显示出许老的文学功力，也凸显了许老秉笔直书而不虚美的精神格调。

作为百岁老人，许先生的养生之道，也被时贤论及，如张泽宇的《许德珩的养生三戒》、郭有声的《许德珩长寿之道》。

（三）追忆

许德珩先生因其高尚的品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身体力行投身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的伟大精神，在去世后仍被人们怀念，由此也出现了很多追忆他的文章。

李挺拔的《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追忆许德珩先生的一次谈话》是此类文章的先河，追忆了许老如何深情地赞扬了五四运动并强调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说：“五四运动也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现在，我们还是要强调爱国主义，要强调社会主义。我们要宣扬社会主义精神，要提高党的威信。”^②

许德珩先生的一生与北大的关系是育于斯、教于斯。追忆许老先生与北京大学往事的文章首推许鹿希、许中明、齐淑文共同撰写的《教书育人 绛帐生辉——许德珩与北京大学》。文章认为，“许德珩以他亲身的经历，将‘五四’青年对于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追求，对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和把握时代、创造时代的精神传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北京大学学生和祖国的青年，他无愧于母校和老师对他的培养和教诲。”^③ 马句的《回忆许德珩老师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此类文章的代表。

许进先生追忆祖父许德珩的文章最多，如《不做人上人，应做人中人——忆祖父许德珩》《不做人上人 应做人中人》《用一生践行五四精神——忆祖父许德珩》等^④，都是饱含感情的追忆文字。这些文字，直到今天，也可看作是具有教益的传扬家训、家风的佳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四）思想与地位

关于许德珩先生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许德珩早年思想形成的研究，二是对于许德珩先生教育思想的研究，三是许德珩先生的爱国思想及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研究。

关于第一点，上面已有论及。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先生在1922年为早逝的学友王时杰撰写的一篇墓志铭。刘晓祥认为，研究这篇墓志，“或有助于了解许德珩青年时代思想的发展变化。墓志提到的许多人名，有辛亥革命元勋、当代宿儒、文坛俊彦及民主斗士，反映了许老及其友人的思想倾向……还涉及民国大学和中国公学的一些情况，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有一定的参

① 杨仲子：《阅新篇 忆许老——许德珩副委员长与〈中国花卉盆景〉》，《中国花卉盆景》1990年增刊第1期，第1页。

② 李挺拔：《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追忆许德珩先生的一次谈话》，《民主》1990年第5期，第28—29页。

③ 许鹿希、许中明、齐淑文、许进：《教书育人 绛帐生辉——许德珩与北京大学》，《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5期，第39页。

④ 详参许进、刘畅：《不做人上人，应做人中人——忆祖父许德珩》，《文史博览》2016年第7期；许进：《不做人上人 应做人中人》，《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0日，第2版；许进：《用一生践行五四精神——忆祖父许德珩》，《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5期。

考意义。”^①

关于第二点,有学者认为,许先生“从教20余年,既教书又育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材,桃李遍天下”^②,因此,深入挖掘和研究其教育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聂瑾认为,许先生的教育思想具体表现为“重视言传与身教、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重视课外教育活动、关心爱护学生”^③。此外,爱国主义“是许德珩教育思想的核心……将教学实践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④。

关于第三点,聂瑾早在1989年就专门撰文探讨过许德珩先生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直到晚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文章向我们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夕、在欧留学期间、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⑤这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许德珩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思想和行动轨迹。张文丽的《许德珩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轨迹》^⑥,则可看作是对聂文的补充,称二作互为表里,也不过分。

总的来说,“研究许在抗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整理和研究许德珩的思想与实践,继承、弘扬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把九三学社建设成为适应21世纪高素质的参政党,不无裨益。”^⑦因此,张文丽结合时代背景和许德珩先生的个人经历,对抗战前后许先生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政治、主张民主抗战和民主建国的政治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许德珩先生去世后,曾有学者专门论及许先生的学术地位。文章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许德珩先生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首先,许德珩在其代表作《社会学讲话》(上卷)中,针对“社会”“社会学”“环境”“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等学术概念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名著,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拉法格的《家庭进化论》等;其次,“在他身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紧密”,“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使许德珩在中国现代社会学史上,占有一个显赫的位置”^⑧。

三、许德珩先生相关研究展望

以上,我们简要地梳理了过去三十年中有关许德珩先生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三十年间,学者们各抒己见,在这一领域中开拓出了许多方向,成绩斐然。不过,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研究分布不均,理论研究有待提高,部分研究有所重复,一些重点问题,如思想、政治、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则有待突破。其次,文献整理力度不够,2020年是许德珩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但至今还没有关于许德珩先生的综合性专著问世,更没有类似《许德珩全集》的

① 刘晓祥:《关于许德珩的一篇佚文》,《九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第20页。

② 详参199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转引自聂瑾:《许德珩教育思想特色初探》,《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③ 聂瑾:《许德珩教育思想特色初探》,《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第16—18页。

④ 聂瑾:《许德珩教育思想特色初探》,《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第15页。

⑤ 聂瑾:《许德珩为什么直到晚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江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第22—25页。

⑥ 张文丽:《许德珩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轨迹》,《党史博采》2008年第11期,第7—8页。

⑦ 张文丽:《论抗战前后许德珩的政治思想》,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4页。

⑧ 柯元:《略论许德珩在中国现代社会学上的地位和作用》,《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第18页。

比较完整的著作出版，这与许先生对中国教育、学术、社会等多个方面的贡献与地位极不相称。再次，关于许德珩先生的研究领域仍需扩展，特别要加强薄弱环节，如许德珩评传的撰写，许德珩书法艺术研究、许德珩手稿和书信的整理与研究，都有待提上日程。而现有研究成果使用率不高，也部分说明对于许德珩先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最后，似乎也应注意将有关许德珩先生的研究与我们的时代话题有机地联系起来。比如，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家训、家风的重要性，关于许德珩先生的家族和家风研究，应当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我们知道，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嫁给了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这些关系，如今看来不仅是美谈，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家庭和家族、家训和家风，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样祖籍江西（修水）的陈寅恪家族，相关研究则很多。许德珩先生的家族，虽然不像陈寅恪家族那样显赫，却也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于许德珩先生的研究有益，对于江西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意义深远。

结语

如前所说，许德珩研究经过三十年漫长时光的陶炼，成为百花竞艳的学术沃壤，这从三十年来关于许德珩先生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看出。而且，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逐年上升，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视角遍及他的生平、思想、政治、社会活动等各个领域，研究层次也不断提高，并呈现出鲜明的研究特点。因此，有理由期待，在许德珩研究的第二个三十年，相关的研究者定会经受住寂寞，潜心钻研，不辜负历史的期待，继续深耕，未来的许德珩先生研究必将一派欣欣向荣，成为标志性的成果，以告慰许德珩先生，并以嘉惠后学。

责任编辑：朱家麟

从传统到多元：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

徐 敏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海外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领域。1990年代以后，学界对海外华文教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持续至今。通过对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重点进行梳理发现：海外华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有较大的拓展；现状讨论不仅从纵深聚焦“三教”问题，还体现出关联性、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同时，在方法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更为准确地把握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动态。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海外华文教育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中实现转型升级，为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和研究开拓新的可能。

关键词：海外华文教育；涵义；现状；方法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1-0085-07

一、海外华文教育涵义的“三种观点”

何谓海外华文教育？在大陆被称为“华文教育”，在台湾则被称为“华语教育”^①。经过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有较大的丰富和拓展。大体而言，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教育的界定有三种主要观点，区分点主要体现在华文教育对象的范围。第一种定义，也是使用较多的一种，主要指海外华侨华人在所在国对华侨华人子女所进行的中华民族语言文化教育^{②③}，也有学者将教育对象表述为“华族子女”^④，其早期主要出于海外侨民与祖籍地维系情亲之需^⑤。延续此需求和功能，由侨社筹集资金建设的华校成为海外华文教育的主要载体。第二种定义，海外华文教育的对象不仅指其所在国的华族子女，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化^{⑥⑦}的情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侨联2019—2021年一般课题“缅甸华裔新生代华文教师的生存策略研究”(19BZQK251)。

作者简介：徐敏，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研究。

① 丘进：《大陆与台湾的海外华文教育比较》，《新视野》2010年第6期，第78—80页。

② 蔡振翔：《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31—35页。

③ 马兴中：《华侨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25—130页。

④ 胡春艳：《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文教育的含义嬗变及历史分期——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第64—68页。

⑤ 丘进：《大陆与台湾的海外华文教育比较》，《新视野》2010年第6期，第78—80页。

⑥ 耿红卫：《海外华文教育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6期，第63—66页。

⑦ 唐燕儿、程辰：《华文教育与华语教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40—44页。

况。在这类界定中,空间范畴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海外扩展到了中国本土。第三种定义范围最广,既包括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也包括面向世界各国的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①这一定义把海外华文教育、对外汉语教育统合在同一个范畴,同时还把“全球范围内面向社会开展的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活动”^②囊括其中,又称为“大华文教育”。

实际上,从历史、性质、处境、教育对象、教学特色、师资力量等方面来看,海外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既有共通之处,也有一些差异。^③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者都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华文教育”概念的提出适应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的新理念。^⑤由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以下文中梳理到的主要是符合第一种定义的海外华文教育,聚焦其中的“三教”、现状、方法等重点研究内容。

二、“三教”问题的研究向纵深扩展

“三教”问题指的是教师、教材、教法,是制约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重点。它主要解决的是“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即讨论施教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教师、教材、教法。既往研究多嵌入到现状分析中或是单独就“三教”问题进行讨论。近年来围绕“三教”问题,海外华文教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扩展,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对施教主体的研究向纵深扩展

海外华文教师是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关系到华文教育质量的高低,也是“三教”问题研究的重点之一。从来源上来看,海外华文教师师资主要由外派教师和海外本土教师构成。外派教师包括从大陆和台湾选派到海外开展中文教学者;本土教师群体主要由到中国等华语地区留学返乡的学生、在当地华校学习中文的学生(这些学生既包括华裔也包括非华裔)、当地有中文基础的华人华侨等构成。可见,海外华文教师师资构成多元。这种多元化的构成虽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海外华文教师队伍的数量,但又会面临业务水平差异较大^⑥的现实困境。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是华文教师的主体,学历水平较低,职业波动性较大;而欧美国家的华文教师学历水平普遍较高。同时,相关机构将教师的派遣方式、培训策略^⑦、培训需求、培训形式^⑧、培训内容^⑨、职业忠诚度^⑩等纳入到海外华文教师的研究中。事实上,对海外华文教师的研究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2000年以前)、全面探索阶段(2001—2010年)、教师主体性研究深化阶

① 贾益民:《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探讨》,《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第147—161页。

② 贾益民:《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探讨》,《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第147—161页。

③ 丘进:《对外汉语教学与海外华文教育之异同》,《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第89—92页。

④ 刘芳彬:《海外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84—87页。

⑤ 马兴中:《华侨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25—130页。

⑥ 李嘉郁:《海外华文教师培训问题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第101—108页。

⑦ 陈志锐:《“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汉语师资培训策略——从新加坡“先研—后证—再教”培训模式谈起》,《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6页。

⑧ 李嘉郁:《海外华文教师培训问题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第101—108页。

⑨ 参见唐燕儿:《海外华文教育:趋势、问题与策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年第4期;刘华、程浩兵:《近年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及趋势》,《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贾益民:《华文教育研究的重点与方向》,《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等。

⑩ 林奕高:《印尼华文教师现状调查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期,第6页。

段（2011年至今）。^①尤其是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对于海外华文教师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专业技能、培训策略等层面，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群体的主体经验、职业期望、未来规划等，即不仅仅从外部更从海外华文教师内部来看问题。海外华文教师并非当下的产物，其伴随着华文教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胡培安、陈旋波梳理的海外华文教师的历史及变迁，不仅为我们刻画了海外华文教师的群体肖像，为深入了解其产生、发展过程奠定了基础，还为当下如何做好一名华文教师指明了方向。^②

（二）对教育标准的研究向纵深扩展

教材是教育标准的重要指标。传统的海外华文教育教材较为单一，很多学者已关注到这一问题，他们既从全球海外华文教育的整体情况来把握，又以区域或国家为单位进行讨论。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其采用的华文教材陈旧，内容“本土化”不够^③；品种少、合适度低，也是华文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④。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对于中文学习的目的、范围、对象、办学模式等各不相同，导致其对教材的需求各异。首先，各国的华文教育体系不尽相同，如马来西亚以母语教学为主，柬埔寨则以补习学校为主，菲律宾和泰国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华文学校为主^⑤，印度尼西亚则国立、私立、三语国民学校三种形式并存^⑥。此外，已有调研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也会存在教材来源渠道多元、适用的质量标准欠缺^⑦等问题。这些情况对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学者们提出开发国别化中文教材，分级分类编写各类教材^⑧，加大对教材使用者的需求调研，以应对华文教育教材适用、编写面临的问题。同时，在教材的具体编写实践中，有学者发现国别化教材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的地域分离^⑨会导致国别化教材针对性不强，不能有效满足当地华文教育融入主流社会中的需求。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在教材编写者与使用者之间搭建桥梁，增进理解；另一方面，要厘清教材编写与所在国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情感之间的关系。此外，对于教育标准的研究除教材内容外，与之相关的华文教师从业标准、华文教育办学标准、教学标准、华文水平测试标准等相关指标的确立也在同时跟进，“华文教育在‘三化’（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进程中全面转型升级。^⑩

（三）对教法的研究向纵深扩展

“教法”即怎么教的问题。“教法”并非单一的问题，而是与教师的专业性、稳定性紧密相

① 黄启庆、刘薇：《国际汉语教师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7年第2期，第1—16页。

② 胡培安、陈旋波：《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遗产》，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2—102页。

③ 黄耀东：《东南亚华文教育现状和出路》，《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期，第73—77页。

④ 吴应辉：《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问题的表象、本质、措施与机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13页。

⑤ 胡春艳：《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文教育的含义嬗变及历史分期——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第64—68页。

⑥ 蔡丽：《印尼正规小学华文教材使用情况及本土华文教材编写现状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22页。

⑦ 宗世海：《简论海外华文教学的质量及其控制——以美国和东南亚为例》，《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1—10页。

⑧ 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进行过探讨，如贾益民、唐燕儿、李嘉郁、宗世海、耿红卫等。

⑨ 李嘉郁：《海外华文教师培训问题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第101—108页。

⑩ 中国新闻网：《许又声：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达成三点重要共识》，2017年12月20日，<https://www.chinanews.com/hr/2017/12-20/8405508.shtml>，2021年3月6日。

关。例如,一些学校在聘请汉语教师时只看学历不看专业,有的地方认为只要懂汉语,就可以进行汉语教学等,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教法”的研究往往在“三教”问题中得到讨论。“教法”陈旧是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的一个主要特点,体现在教学理念陈旧、教育技术应用不足、课堂教学缺乏互动三个方面。^①近年来,有关“教法”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华文教育现状中进行探讨,还有专门针对教法的深入讨论,如徐峰针对新加坡华语语法教学提出要结合华语语言环境的变迁加强语法教学以及通过情景和任务教学来提高语法能力^②;樊荣、彭爽同样以新加坡为例,关注其基础华文教学模式是如何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变^③,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教法研究提供了范例。

通过梳理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发现,传统教学模式(如面对面的讲授式课堂教学)是最主要的教育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海外华文教育活动形式愈加多样。无论是在所在国还是在中国,以作文、普通话、中文歌曲比赛、夏令营等^④不同方式吸引了大量海外华侨华人、非华裔的中文学习者。进入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教学(即时视频、录播等)被运用到华文教育中。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很多国家的华文教育在现有条件下迅速切换到网络教学模式,线上网课成为一段时期内开展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方式。

三、海外华文教育现状研究的特点

海外华文教育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广泛。尤其是华侨华人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约2300万增长到近6000万^⑤,海外华文教育也随之蓬勃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把握现状既是摸清海外华文教育发展情况的基础,也是开展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除聚焦“三教”问题外,已有研究在对海外华文教育现状探讨的基础上表现出关联性、区域性和阶段性三个特点:

一是关联性。华人社团、华文报刊、华文教育是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前两者与海外华文教育关系密切,一定程度上催生和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华文学校在各种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下,普遍兴起。之后,各国相关政策的动态调整使得华文教育几经兴衰,华文学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始终依托华人社团得以迅速恢复、发展。海外华人社团是通过血缘、地缘、业缘以及宗教等关系组织起来的,不但是各自利益的维护者^⑥,还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一些研究通过嵌入到华人社团、华文报刊等的研究中来分析海外华文教育,将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反映出来。例如,刘宏以新加坡中小学华校为例,分析了二战以后会馆对华文学校重建、新建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变迁、华校、会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⑦张继焦则从多种视角分析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如何依托华人社团成为一项华人自救自强的公共事业,并在多年后形

① 吴应辉:《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问题的表象、本质、措施与机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13页。

② 徐峰:《关于新加坡华语语法教育的若干思考》,《汉语教学》2011年第3期,第105—112页。

③ 樊荣、彭爽:《新加坡基础华文教学模式特点分析》,《外国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第64—66页。

④ 刘华、程浩兵:《近年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及趋势》,《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83—84页。

⑤ 贾益民、张禹东、庄国土:《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0)》,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⑥ 蔡振翔:《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31—35页。张禹东、陈景熙:《华人社团与中华文化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⑦ 刘宏:《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0—48页。

成了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体系。^①除华人社团外，华文报刊对于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小觑，一些华文报刊直接面向的就是华侨教师、学生。例如，印尼的《中学生月刊》《印尼教育月刊》《大公商报》等刊物要么直接面向华侨中学生、华文学校教师，要么经常报道华文教育动态，传播中华文化。^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同样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和华文教育的发展，通过创造舆论环境、出版教育专刊、开辟文化副刊、举办活动等以不同形式全方位维护和推动华文教育发展。^③

二是区域性。以华侨华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国家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当地的华文教育。传统上，以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数量居多，占全球华侨华人9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仍占全球华侨华人的85%以上，到201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60%。^④尽管比例有所下降，但东南亚仍然是华侨华人占比最高的地区，因此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文教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又是重点研究的国家。周聿娥、温北炎、严奉强、段颖、乔翔、邹丽冰^⑤等学者围绕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教育进行了探讨。随着东南亚国家周边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这些国家的华文教育也在发生变化。曹云华以国家间视角分析了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认为东南亚华文教育分为肇始时期、大规模发展时期、萎缩时期和重新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并提出今后华文教育发展应该坚持的方向。^⑥此外，不同国家、地区海外华文教育的横向对比也是现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如：宗世海以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例，比较这些国家华文教育的教学形式、教学质量等^⑦，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国家的教学水平和发展情况。

随着华侨华人在东亚、欧美国家的数量增长，近年来，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华文教育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中。例如：王智新对日本华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后指出，日本华文教育出现在在线教育等多元化的新形态，同时分析了日本华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⑧谷佳维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指出起步晚、发展迅速是西班牙华文教育的显著特点，且表现出从留根教育到综合素质教育的新趋向。^⑨严晓鹏则以意大利华文学校为例探讨欧洲华文学校发

① 张继焦：《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第126—132页。

② 黄昆章：《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③ 彭步伟：《华文报纸在华文教育中的作用——以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为例》，《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15页。

④ 贾益民、张禹东、庄国土：《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0）》，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⑤ 参见周聿娥：《东南亚华文教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温北炎：《印尼华文教育的过去、现状和前景》，《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严奉强：《东南亚华文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乔翔、邹丽冰：《缅甸掸邦东枝华文教育状况及启示》，《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等。

⑥ 曹云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家间关系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66—74页。

⑦ 宗世海：《简论海外华文教学的质量及其控制——以美国和东南亚为例》，《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1—10页。

⑧ 王日新：《在日华侨华人教育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27—138页。

⑨ 谷佳维：《从留根教育到综合素质教育：西班牙华文教育发展的新趋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19页。

展的关键因素,他发现除教育需求、政策支持、组织交流、师资发展等传统因素外,社区关系、治理结构也是影响华校发展的因素。^① 耿红卫、张巍运用比较分析,阐述了欧洲华文教育的现状,认为师资、教材、资金等是制约发展的主要原因。^② 陈倩对美国华文教育的分析则是建立在对学校体系、政府机构、各民间组织对汉语学习的政策和措施基础上,进而为管窥美国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透镜。^③

三是阶段性。海外华文教育与国际、国内背景息息相关,世界政治局势、经济力量的变化等势必会对华文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每一个时期海外华文教育研究关注的主题有所差异,并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朱宇、蔡武通过对 CSSCI 的文献统计,根据研究主题将 1998—2017 年的海外华文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华侨教育”“华社”“华文教师”等是 1998—2007 年的研究热点;“华语运动”“困境”“变迁”“对策”是 2008—2012 年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文化认同”“本土化”“一带一路”是 2013—2017 年海外华文教育新的研究热点。^④ 尽管只是近二十年研究主题的梳理,却反映了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主题的阶段性特征。从华语在一些国家从“解禁”到“汉语热”再到“一带一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热点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值得强调的是,李明欢等学者提出对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生态发展趋向与特点的了解,应当是我们开展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前提^⑤,为今后如何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找到了切入点。马峰从华文教育发展与华文文学的交叉视角来探讨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⑥ 此外,“文化认同”“互联网+”“三化”“转型升级”等相继成为当下研究的新的热点。

四、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从方法上来理解,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方法既包括对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方法,也包括对“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本身的学术史及方法论等的研究。海外华文教育研究呈现出历史学、传播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特点,文献法、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研究中。这些方法的运用,对于理解海外华文教育的历史、现状、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如严晓鹏通过五年的追踪调查,以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为个案,深入分析该校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⑦ 谷佳维通过实地研究对西班牙当地华文教育现状进行综合性的把握,以此探索新形势下西班牙华文教育发展的新趋向。^⑧ 对于海外华文教育的研究,李嘉郁提

① 严晓鹏:《欧洲华文学校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以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第29—34页。

② 耿红卫、张巍:《欧洲华文教育的现状分析与策略研究》,《海外华文教育》2018年第6期,第96—101页。

③ 陈倩:《美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4—88页。

④ 朱宇、蔡武:《华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基于 CSSCI (1998—2017) 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63—172页。

⑤ 李明欢、黄猷:《海外华人族群文化与海外华文教育》,《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第108—113页。

⑥ 马峰:《印尼华文教育的历史发展与华族身份认同调适——基于印尼华文文学作品的视角》,《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3—151页。

⑦ 严晓鹏:《欧洲华文学校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以意大利佛罗伦萨中文学校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第29—34页。

⑧ 谷佳维:《从留根教育到综合素质教育:西班牙华文教育发展的新趋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19页。

出要注重提高海外华文教师的科研能力^①，充分发挥海外华文教师在促进华文教育研究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进一步，对于现状、问题的研究也带来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不同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效果各不相同。实际上，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走出去”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了解现状，有学者提出需要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②，只有走到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去，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能摸清海外华文教育的整体情况，编写出适合当地国情的华文教材。

与海外华文教育网络化发展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及时跟进，对线上的教育活动进行观察和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民族志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致力于理解互联网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其调查点由物理田野向社会—政治领域转移，并向虚拟田野发展^③，为我们更好地把握网络社会的现实、华文教育的发展脉搏提供了路径。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④。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海外华文教育发轫于华侨华人的海外迁移和流动，几经风雨，顽强地存续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迅速。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并行的时代^⑤，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动，所在国华文教育受到其性质、政策、发展历史、教学对象、华人华侨的处境与文化认同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研究者敏锐地关注其中的“变”与“不变”，才能为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智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持续的情况下，海外华文教育该如何应对日趋复杂的形势，实现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李嘉郁：《海外华文教师培训问题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2期，第101—108页。

② 贾益民：《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探讨》，《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第147—161页。

③ 卜玉梅：《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析论及反思》，《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69—85页。

④ 新华网：《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 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2014年6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6/c_1111025922.htm，2021年1月28日。

⑤ 刘宏：《跨界治理的逻辑与亚洲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页。

云南故事

红军长征过滇西北贺龙的统战工作实践及启示

陈金星

(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贺龙在长征过滇西北的过程中损失较少,除了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因素外,与其在滇西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红军在沿途不仅秋毫无犯,还关心民众疾苦,救助穷苦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大力宣传党及红军的政策和主张,团结并教育地方宗教领袖;严惩恶霸劣绅,争取开明士绅,积极与地方上层士绅联系、交往,团结力量,因而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顺利走过滇西北。贺龙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并一以贯之,工作细致认真,灵活又不失原则,注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重视严明革命纪律和宣传工作。在新时期,应以史为鉴,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贺龙统战工作的特点和精髓,以科学合理的制度化建设来推进统战工作,切实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的人才培养和参政议政工作;搞好党建,夯实统战工作基础,争取党外人士更多的内心认同,增强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贺龙; 长征; 滇西北; 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1-0092-07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被很多党史爱好者誉为“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1935年11月下旬,红二方面军作为最晚开始长征的红军部队,出发时共一万一千余人,他们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转战湘、黔、滇数省,历时一年,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苏区,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全军仍然有一万一千余人,基本上没有大的损失,保存了绝大部分的兵力。毛泽东曾欣喜地对贺龙说:“你们基本没有亏本儿嘛!”^①当时,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没有亏本儿”堪称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卓越的军事才华、领导能力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有着直接关系。被毛泽东总结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在红军长征过滇西北的过程中,其优势和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的经验和启示,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思考。

一、贺龙长征过滇西北的统战工作实践

1936年4月初,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下突破封锁进入滇东,计划在

作者简介: 陈金星,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党建。

^① 吕锡成:《不忘初心再长征:贺龙长征路上的“神来之笔”》,2016年8月13日,http://m.cnr.cn/news/yett/20160813/t20160813_522971837_2.html,2019年10月14日。

滇中元谋、龙街一带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窥知这一作战意图后连忙调集云贵“剿匪”司令部的反动力量，在禄劝普渡河布置重兵堵截。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更改渡江的计划，从滇西北丽江石鼓镇渡过金沙江到中甸（今香格里拉市）。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穿过滇西北白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怎样才能敌军的围追堵截中顺利渡过金沙江，并获得人员、粮食、药品的补充呢？在人地不熟，言语不通，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地区，这是个大难题。这一地区，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自北向南奔腾而下，有玉龙雪山、哈巴雪山、白马雪山、梅里雪山巍巍矗立，有草原、河谷、原始森林纵横交错，有白族、藏族、傈僳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聚居，每走几公里就可能遇到不同的地形、气候、语言和民族。这里交通不便，语言不通，“外人”一直极少踏足，即便进入也是困难重重。贺龙凭借其坚定的革命意志、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优良的革命作风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红军经过滇西北，不仅秋毫无犯，尊重少数民族习俗，还严惩恶霸劣绅，争取开明士绅，救济穷苦百姓，用实际行动获得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一）做好地方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

红军二、六军团到达丽江时，当地整体氛围并不太友好，很多群众对外来的红军感到害怕、惶恐。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如诬蔑红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蒙蔽了很多边疆地区的群众。一时间，丽江古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很多人避入深山。国民党严令丽江军警就地阻击红军，在丽江县长和民团团长商议对策的时候，有纳西族前清进士和本地望族身份的时任丽江县参议长和庚吉在四方街向民众宣传：“共产党有政治纲领和目的，不会随便杀人放火，不要惊慌失措。”^① 其主张不宜阻击，而应欢迎，并令丽江的保安大队向白沙方向的深山回避。在红军先头部队进入丽江城后，贺龙直接住到了和庚吉家（今丽江古城科贡坊）。贺龙与和庚吉到底谈了什么虽无确切记载，但是和庚吉随后即表明对红军的欢迎和支持。于是，迎接红军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集在大研古城四方街。“他们当中有纳西、白、汉等兄弟民族的劳苦大众，他们兴高采烈地挥动着三角形小彩旗，浩浩荡荡地从四方街出发，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到玉龙锁脉，少数人则到达离城十余里的东元桥边，等候红军的到来。”^② 大批逃入山林的村民也都相继归来，接待红军，并帮助他们运送伤员和物资。在和庚吉的斡旋之下，长征队伍在丽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还获得了宝贵的人力和物资的支持。

在丽江古城停留一天一夜后，贺龙带领长征队伍行军至与中甸一江之隔的石鼓镇，但是很快发现石鼓江边没有可供渡江的船只，船只已在蒋介石多次的电令下被烧毁或藏匿。为保障顺利渡江，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开展了对开明士绅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贺龙亲自写信给地方开明士绅，其中写给江边鲁桥乡纳西族副乡长王缙贤的信件内容为：“缙贤先生大鉴：此次大军道经贵地，因事先未遑派员拜谒左右，以致有惊台端。兹为冰释，望希请勿疑惧。闻得贵地渡河船筏，一律隐藏东岸。此诚不幸之至。字到请阁下将渡河船筏一并派人驶来，以便大军北渡，事竣当给重重劳金，决不至误！第二路军总司令贺龙（章）阴历三月

^① 年建生：《居官活民 分也非功——晚清进士和庚吉事略（上）》，《云南政协报》2019年2月15日，第12版。

^②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五日。”^①贺龙请王缙贤动员船工，帮助红军渡江，信件语气谦虚诚恳、情深义重。本已回避在家的王乡长被这种以礼待人的态度打动，不仅送来了一条隐藏的木船，还找来了五名熟悉水情的船工，帮助红军安全过江。

（二）做好地方宗教领袖的统战工作

红军二、六军团在经过丽江到达中甸后，发现沿途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之外还有更大的困难挡在前面。位于青藏高原横断山区腹地的中甸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地区，当时还普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统治体系，沿袭着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各大寺院的活佛、堪布（执事僧）等，受到民众的崇拜和地方上层的支持，拥有武装，私设公堂、监狱、课税等，势倾一隅。当地的藏族同胞和宗教上层在国民党的蒙蔽之下，对共产党的红军极为惊恐，很多人逃往深山；对本地藏民有着很强控制能力的归化寺大门也紧闭着，对红军的到来高度戒备。

面对如此局面，贺龙在进驻中甸县城后，打开监狱，砸断镣铐，释放被监禁的农奴，但没有立即对土司头人及寺院等展开武力进攻，没有激化民族对立情绪，而是首先致力于打破民族隔阂和偏见，促进藏族同胞对外来汉族军队的了解和理解。贺龙在中甸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代表，颁布了尊重民族和宗教习惯、严守党的革命军队纪律的法令，张贴“兴盛番族、兴番灭蒋助番民独立解放”“优待少数民族、保护土司头人的生命财产”“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②等标语。通过人不进经堂、马不踏青稞、帮老人背水、公平买卖、借物奉还等举措，很多本地藏民慢慢开始了解红军。归化寺的地方宗教领袖八大老僧派喇嘛夏那古瓦与红军谈判，贺龙热情接待了夏那古瓦，向其宣传共产党的宗旨、民族政策、北上抗日主张等，并托其带回一封给归化寺掌教八大老僧的信：“掌教八大老僧台：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要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速派代表前来接洽。贺龙。”^③贺龙再次表示希望中甸僧民不要听信国民党挑拨，安心民生协助红军北上。之后，贺龙即受邀去归化寺拜访了八大老僧，向中甸归化寺赠送了“兴盛番族”锦幛以及江西瓷瓶等礼物，还给喇嘛夏那古瓦颁发了负责为红军采买物资并保障其安全的委任令。归化寺很快就命令商人和富户将粮食、盐、红糖等物资卖给红军，红军由此在短期内筹集了大量物资。贺龙又请八大老僧动员组织了若干人马的骑兵为红军做先锋，负责与沿途藏民接洽。在藏民骑兵、向导、翻译人员的帮助下，红军顺利翻越雪山，走出了康藏高原。

（三）联系、慰问和发动少数民族同胞

红军到达丽江后，主动交往、慰问、发动少数民族同胞，关心民众疾苦，救济穷苦百姓，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在贺龙的指挥下，红军烧毁了元谋县反动县长在丽江县城的庭院，打开监狱释放了因交不起地租被关押的劳苦群众，没收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并将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使当地广大贫困群众第一次感受到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第一次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财产，也第一次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红色种子”。红军还解救了监狱里长期被关押的劳苦大众，

^①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第8页。

^②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甸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③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甸县志》，第271页。

砸开镣铐，并领着他们到街上理发，发给衣服和银钱。当天被释放的四十余人中，有一个叫桑乐天的青年，为报答红军的救命恩情，他毅然告别了双亲，为红军做向导，徒步四百余里送红军到中甸县城，“红军对他关怀备至，特意送给他一匹马，四十块大洋，一顶帐篷。一床毯子，作为生活安置费用”^①。“因交不起地租而被关进监狱的土可乡青年尹学富，为感谢红军也自告奋勇，跟随红军到石鼓江边扎筏子去了。”^②“红军在丽江的举动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和履道等14名青年自愿报名加入红军。大研镇木匠、铁匠17名在王孙、和仲清带动下帮助红军修木筏准备渡江。35名裁缝师和17部缝纫机连夜为红军缝制军衣、米袋；50多名妇女主动帮助红军做饭；丽江商会的李荫候、杨自明、牛兆南帮助红军用‘滇票’兑换银元。各商铺恢复营业，并把大量红糖、生姜、盐巴、辣椒等过雪山的必需品和粮油卖给红军。”^③给红军提供援助的人中，既有普通百姓，也有不少本地大族族长、商会首领，丽江各族人民的倾力援助，是红军长征顺利走过滇西北、渡过金沙江的重要保障，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也是贺龙注重统战策略的成果。

二、贺龙统战工作的特点

（一）统战工作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一以贯之

贺龙为人豪爽好客、乐观幽默，善于广交朋友，善于团结一切支持革命的地方力量和各种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这种性格使得他对统战工作一贯高度重视。贺龙“两把菜刀”在盐税局夺枪闹革命之后，湘西各地各种起义不断，有自发的贫苦农民革命，有利用迷信组织的造反“神兵”等。在这复杂的局面中，贺龙积极利用自己的亲朋、同乡、故旧等关系，深入村寨和农民打成一片，深入“神兵”教、地方武装的地盘广交朋友，积极联系与国民党有矛盾的地方军阀，开展灵活的统战工作，说服他们弃暗投明。1928年，贺龙在召集亲友故旧谈话时讲：“我现在可算是共产党的人了，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放弃前嫌，团结起来干革命。”^④贺龙在缓和自己的处境、站稳脚跟的同时，还争取了相当多的革命群众加入自己的队伍。“桑植县八大区的八大诸侯，他争取了七个”^⑤；之后争取的还有石门县罗效之的地方武装、鹤峰县团防首领王文轩、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参谋长龚浩、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陈伯陶，以及在长征中结识、后跟随贺龙走完长征到达延安的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等；新中国成立后，还团结了四川的知名作家李劫人为党工作；等等。总之，贺龙极其重视并善于开展统战工作，使得很多可能成为红军阻力的人成了支持红军的主力，壮大了革命力量。

（二）工作细致认真，灵活又不失原则

贺龙在统战工作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贺老总每到一个地方，对地方的各种势力是很讲策略的。能争取的就争取他，不能争取的起码也要他保持中立，对他们讲统一

①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第17页。

②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第8页。

③ 李翔和：《纳西学者讲红军长征过丽江》，2016年9月15日，http://www.lijiang.cn/auto/ljylx/201609/7448_2.shtml。2019年9月12日。

④ 孙忠良、吕娟萍：《论土地革命时期的贺龙统一战线思想》，《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第62页。

⑤ 谢琳璐：《贺龙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运用及现实启示》，硕士学位论文，吉首大学，2014年，第45页。

战线。”^①在长征中，贺龙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顽固敌对势力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斗争；对地方开明进步人士主动交往团结；对待少数民族群众，则是破除偏见尊重民族习惯和维护群众利益；对待宗教领袖尊重其信仰并团结其力量。贺龙变通思想和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发挥了统一战线的活力，同时也坚持了党的原则，在拉拢地方上层人士时，既联合又斗争，绝不作无原则的好朋友，而是坚决维护底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民众疾苦，推动群众起来革命，真正做到了既斗争又团结、既灵活又有原则，极大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我们树立了统战工作的光辉榜样。

（三）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红军长征过滇西北，沿途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政治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在民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长征中，红军始终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大力支持，如动员民众做向导、抬物资、做军粮、寻找渡船、编扎竹筏、做船工，等等。贺龙带领的红军二、六军团之所以能冲破重重敌障，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顺利通过滇西北，就在于红军沿途获得群众的支持。红军所到之处，打击豪强，爱护人民，谱写了一篇篇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篇章。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贺龙长征过滇西北，犹如熊熊火把照亮了沿途穷苦百姓的心灵，播撒了革命的种子，深刻影响了各族人民，让他们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奋勇前进。1938年，在红军的影响和感召下，丽江石鼓以及金沙江沿岸不堪忍受压迫的各族农民，揭竿而起，举行了名动四方的“黄军起义”^②（起义者认为自己不如路过的红军，但是也不当白军，故称“黄军”）。1947年丽江各县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1949年丁志平在华坪县武装起义，一批批各族儿女投身到当年红军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这与工农红军经过滇西北留下的革命火种是分不开的。正是红军广泛发动和启发了群众，共产主义信仰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四）重视革命纪律和宣传工作

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经过滇西北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革命壮举却对沿途各族群众影响极大，收到极好的统战工作成效，这与其高度重视革命纪律和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红军极为重视革命纪律，尊重沿途各少数民族习惯、宗教习惯，严守党的革命军队纪律，公平买卖，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喝一碗水、一碗粥都会支付报酬。尽管沿途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矛盾复杂，但是群众只要和红军打过交道，就会为红军的高风亮节和严明纪律所感动，由对红军惧怕躲避、敌视袭扰，转变为倾其所有地支援和帮助。另外，红军长征中极为重视宣传工作，极力消除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诽谤造成的误解。正如毛泽东所讲“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每到一个县城，就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或标语，宣传“抗日救国”“抗日反蒋”“民族平等”“反对剥削”等革命理念。半个世纪后的1980年代，丽江地区依然有很多人能背诵红军书写的标语，如“抗日必须救国，救国必须反蒋”“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红军听指挥，不可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借东西，不可要半分；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吾群众，大家都欢迎”^③，等等。这些通俗朴素的语言，鼓舞革命斗志的宣传，镌刻进了沿途各族群众的心里，使得他们懂得了只有走红军的道路才能求得解放。

①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第72页。

②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第23页。

③ 中共丽江市委宣传部：《红军长征过丽江》，第21页。

三、对当今统战工作的几点启示

以历史为鉴，我们应该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统战工作的特点，增强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从历史上红军长征过滇西北的工作实践来看，统一战线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在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下，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科学合理的制度化建设推进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是多部门、多层次、多角度彼此独立分工又相互配合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有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等十二个方面。统战工作主要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统一战线工作方式方法十分机动灵活，妥协与斗争、宣传与引导等方法常常交替使用，需要多方配合协作并形成一种机制才能取得实效。扎实的统战工作首先要从制度建设层面下功夫，建立和完善统战工作机制并保证机制的有效运行。这个机制具体说来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统战工作的“目标责任管理制度”将统战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明确统战工作目标、责任、实绩，制定适合本部门、本行业特点的统战工作规划和总体部署。同时要将统战工作的各项任务逐步分解，纳入职能部门的党建年度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做到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努力使检查考核有尺度、奖惩有标准。二是要建立“分工协调机制”，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分管书记主抓、统战部门负责、党政各部门共同参与的统战工作机制，分工协调，群策群力，在重大问题决策、工作信息情报的共享、具体工作安排、重大活动的分工等方面互动互补，将统战工作扎实有力地落在实处。三是要建立完善的“宣传、活动、调研、财务、会议、干部推荐、意见征集、情报等制度”，创新统战的宣传方式方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借势开展积极向上的文娱活动、联谊活动、座谈活动、慰问活动以及各种研修、参观、培训、调查等，将统战对象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导到建言、建设、发展等方向上来，引导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上来。

（二）切实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的人才培养和参政议政工作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参政议政的热情，不能漠视、压制。在新时期，“受市场经济逐利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多以文化的形式进行，导致部分党外知识分子开始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立场发生动摇”^①。面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在新时代，有很多党外人士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中有较大影响力，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活动能力，也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在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方面，建议着力加强改进以下几方面统战工作。一是深入调查了解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积极发现人才，建立专门制度，将其中的优秀分子推荐到重要岗位上去，使其发挥能量做出贡献。二是领导干部要多关心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和生活，特别要做好其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工作，实时了解其思

^① 张璐、许焯：《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64页。

想动态和行动立场。通过座谈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同他们进行交流,寻找共识,解决其实际问题,与他们交朋友。三是重视宗教界人士的人才培养工作,“人才培养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①。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宗教政策的前提下,统战工作部门要破除顾虑,扎实工作,多关心了解宗教界的动态,培养“为党和政府所信赖、教职人员所支持、信教群众所拥护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以实际行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②的要求。

(三) 搞好党建,夯实统战工作基础,获得党外人士更多的思想认同

红军长征过滇西北统战工作成效斐然,这当然是其工作策略的胜利,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正义事业的胜利。人民知晓并认同党和红军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中华民族,因此必然能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有了民心,统战工作就有了基础。反观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一个公认的主要因素就是其非正义性,外不能抗强敌,内不能救百姓,腐败、无能,靠诬蔑、造谣、挑拨民族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阻碍红军,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地方实力派、地方知识分子、地方宗教领袖的不满,遭到抛弃就是必然。在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面临严峻考验,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抓好“四风”建设,其重要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正所谓‘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③红军长征过滇西北的历史实践也证明,只有关心民众疾苦,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才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一个执政党如果自身作风不过硬,是难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的,他的号召力也将是极低的。党内的少数腐败分子对人民利益的非法侵占,损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的形象扭曲,纪律松弛,威信下降,严重破坏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需要加以制止和清除。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加强党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消除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疑虑,坚定其信心,争取党外人士更多的内心认同,使他们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成为与党同心同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第1版。

牢记初心使命 传承善洲精神

张倩倩

(中共大理州委党校马列教研室,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杨善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 杨善洲精神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 弘扬、传承杨善洲精神, 是新时代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理性选择。我们要从理论逻辑、现实功能、践行路径三部分深入挖掘、传承杨善洲精神, 为牢记初心使命凝聚激发奋进的精神力量, 构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引领, 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制度的典型示范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 杨善洲精神; 丰富内涵; 时代价值; 传承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0)01-0099-07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精神谱系,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进。2020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 “主题教育有期限, 践行初心无穷期。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 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①充分挖掘先进人物的精神品质和时代价值, 是传承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 是激发奋进新时代的力量指引。杨善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并成为“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指引, 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生动样板。弘扬、传承杨善洲精神, 是新时代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理性选择。

一、理论逻辑: 杨善洲精神的丰富内涵

杨善洲精神萌芽于土地改革时期, 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 成熟完善于新时代。“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 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 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 以正确的事业观干

作者简介: 张倩倩, 中共大理州委党校马列基础教研室主任、讲师, 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行政管理。

^①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春节前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 2020年1月22日,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559256>, 2021年3月4日。

^②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11年4月15日, http://topics.gmw.cn/2011-04/15/content_1835301.htm, 2021年3月4日。

事，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②是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杨善洲精神的高度评价和凝练，可分别从政治站位、人民立场、工作态度、权力归属等四方面将其归结为忠诚、为民、踏实、清廉，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的外在体现与延伸，集中阐释了杨善洲精神的理论逻辑和丰富内涵。

（一）政治属性：坚持党性原则，以恪守信念、对党忠诚的世界观立身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①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共产党人经受住风浪考验的精神支柱，这首先源自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与认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科学阐释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等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更为先进，客观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终将会替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也不会因一时的曲折反复而改变方向。

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即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不懈奋斗，其过程充满苦难与艰辛。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遇到困难、曲折就动摇信念、丧失信心，就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定的信念和百倍的信心，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分析、解决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共产党的远大目标，就是要使我们的整个民族都富裕起来。”“不能让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中丧失理想信念，丢掉奉献精神，迷失了方向。”^③杨善洲同志多次表达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60年如一日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守护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高地，以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杨善洲同志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深知生活艰辛和百姓疾苦，在参加滇西抗战支前担架队时更是亲身感受到了百姓的关怀和党的事业的伟大，时刻被勇挑重担、为他人着想、爱国奉献的精神感染着。随着思想觉悟的日渐提升，杨善洲同志于1952年入党，并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很快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在工作岗位上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退休后，杨善洲同志兑现承诺，扎根大亮山，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带领群众把荒山变成绿洲，恢复生态环境，造福一方百姓。他以一生的实际行动证明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最正确的选择，体现了“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④的忠诚无畏的高尚品质。

杨善洲同志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忠诚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信仰深深地根植在他的内心深处，像一棵大树一样在他的心灵土地上扎根，没有任何外界因素能够撼动。学习杨善洲精神，“就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把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②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第4—12页。

③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编写组：《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25、33页。

④ 云南省杨善洲精神研究会：《杨善洲精神学习读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3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化作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利益奋斗终身的实际行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①

（二）人民立场：坚定为民情怀，以心系群众、牢记宗旨的群众观做人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向，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奴役和压迫，消除数千年的贫困状况，过上幸福美丽尊严的生活。

杨善洲同志生活、工作的施甸县、保山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贫困地区。他深知群众生活的不易，对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需要了如指掌。改革开放前，施甸地区粮食产量低，存在着“一人种3亩，3亩不够吃”的现实困境。杨善洲决心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秉承着“我们是党的干部，如果老百姓饿肚子，我们就失职了”的为民情怀，他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带头搞水利设施建设，和群众一起修建水库，学习、试验各种办法，推广增产效果显著的“三岔九垄”插秧法，发展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让贫苦农民尽早过上好日子。1985年，昌宁县发生水灾，当地群众受灾严重，杨善洲同志决定让保山地委办公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出来救灾，生动演绎了“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贫困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的工作信条。在回答电视台记者关于“老书记，您种的树还有十多年才能完全成材，到那个时候您都90多了，您怎么享受啊”的提问时，杨善洲同志如是回答：“我享受不着没什么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得实惠了嘛。”他的回答其实是他一辈子做人、做官的原则和信念，那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得实惠，人民的利益比天大！

杨善洲同志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心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和群众同吃同住。他认为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生活过得不好，自己好了不安逸”凝结成了他的人民至上情怀。学习杨善洲精神，“就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群众观做人，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站稳群众立场，认真贯彻群众路线，自觉增进群众感情，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②

（三）事业导向：坚持鞠躬尽瘁，以真抓实干、不懈奋斗的事业观干事

事业观是个人对工作方向和工作道路的看法和指引，决定着个人秉承何种事业态度、遵循何种事业精神、追求何种事业目标，以及如何把个人价值融入社会价值中，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杨善洲同志不图虚名，不做虚功，不急功近利。他怀着重任在肩的使命感，脚踏实地不漂浮，埋头苦干不张扬，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无声的命令，有效的指挥……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③在任时，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杨善洲总是最先出现；越穷、越困难的地方，就越容易见到杨善洲。杨善洲同志在任时，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随身带着锄头、镰刀等各种农具，

^①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2011年4月15日，http://topics.gmw.cn/2011-04/15/content_1835301.htm，2021年3月4日。

^②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2011年4月15日，http://topics.gmw.cn/2011-04/15/content_1835301.htm，2021年3月4日。

^③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编写组：《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22页。

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与群众一起劳动，了解到的情况也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来到地委书记办公室，却没有见到杨善洲。那时正是小春播种季节，杨善洲在办公室待不住，就去了板桥公社的田间，给农民群众做插秧示范。胡耀邦亲眼看到了杨善洲满身泥水的样子，感叹地说：“像你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进而吟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也成为杨善洲毕生的追求和座右铭。退休后，杨善洲同志和家乡群众一起克服各种客观存在的困难，买树苗、捡果核、除害虫、架电线，把荒山建成了万亩绿洲，为了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

杨善洲同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共产主义事业中，用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态度、遵循什么样的事业精神、追求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学习杨善洲精神，“就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事业观干事，始终保持一股艰苦奋斗的劲头和锐意进取的激情，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①

（四）权力归属：秉承权为民用，以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权力观用权

权力观是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包含对权力性质、使用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权力由何而来、权力为谁服务等基本问题。“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一切公共权力均来源于人民群众，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群众。杨善洲同志秉承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岗位上一心为民，亲朋好友没有因他的职位受到任何关照。“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不是给我们家人当！”“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②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③

杨善洲始终保持着一颗淡泊名利的心，努力践行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学习杨善洲精神，“就要像他那样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公正处事、公道用人，克己奉公、清正廉洁。”^④

二、现实功能：杨善洲精神的时代价值

科学认识事物的时代价值，有利于人们在实践中能动地把握事物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转化为推动工作开展的动力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我们学习杨善洲同志，就要以干事为责，以干事为荣，以干事为乐，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

^①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2011年4月15日，http://topics.gmw.cn/2011-04/15/content_1835301.htm，2021年3月4日。

^②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编写组：《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楷模：杨善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50页。

^③ 云南省杨善洲精神研究会：《杨善洲精神学习读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④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2011年4月15日，http://topics.gmw.cn/2011-04/15/content_1835301.htm，2021年3月4日。

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① 杨善洲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多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时代精神、价值追求和先进风采的集中体现。杨善洲同志的事迹在全国引起持续广泛关注，并在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这是杨善洲精神具有时代价值的最好证明。发掘杨善洲精神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功能，弘扬新时代“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指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导向。

（一）蕴含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实关切

初心和使命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终极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2019年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要求体现了价值观、价值追求、价值冲突、价值标准的导向功能和路径选择。“守初心”的价值导向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我们党从哪里来，为了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人民性、真实性的价值观；“担使命”的目标指向是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新时代守好初心的现实价值追求，导向、调控功能进一步展现；“找差距”就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有的放矢进行整改，体现了实践中解决个人与社会、他人与自我以及自我内部的标准与差距的价值冲突问题；“抓落实”的行动指引就是要把初心使命转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真抓实干、不懈奋斗的自觉行动。总要求体现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事业标准和目标的趋同性，构建了统一的价值标准。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为民情怀、坚持真抓实干、秉承大公无私，一辈子践行初心和使命，是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生动典型和鲜活样板。杨善洲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希望和期盼，是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的榜样力量，理应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和共同价值取向。

（二）揭示了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基本要义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② 刘少奇同志明确提出了党性的阶级性、坚定性、原则性和团结性。按照党性原则办事，自觉地改造自己，是共产党员一辈子在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毕生追求的心理历程。“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③ 党性修养的最基本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杨善洲同志无论是在任一方还是退休后为家乡父老做点事情，都以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做出了把组织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选择，“有家庭需要照顾时，革命工作根本丢不开，我当时的选择是首先服从革命需要，然后再说照顾家庭。”^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保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做到大公无私、遵守纪律、顾全大局，有信仰，讲团结，为群众。

（三）提高执政本领推动科学发展的先进范本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征程中，有来自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安全、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需要

^① 习近平：《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 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2011年4月15日，http://topics.gmw.cn/2011-04/15/content_1835301.htm，2021年3月4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4页。

^③ 祝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④ 云南省杨善洲精神研究会：《杨善洲精神学习读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不断增强本领，以抵御风险、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杨善洲同志结合工作实际提出的“山不绿，地瘦薄，这是山里的穷根子”“任何动物都像人一样是有灵性的，是我们生态圈中的一员”“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的观点，依然包含着新时代推动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强化绿色发展、抓实作风建设、重视调查研究、大兴学习之风的先进范本。每位党员干部都要从身边的事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处着眼，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升工作本领，提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以过硬的本领在新征程中奋力前进。

（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榜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文化滋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类发展提供现实关照，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精神力量。杨善洲同志对母亲有着深沉的爱，感谢妻子操持家务，呵护孩子，不忘担架队老乡的照拂……诚信知报、仁者孝悌、礼义廉耻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杨善洲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着人民的心灵，并生生不息、发展壮大，从而使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有了根和魂。因此，全面认识和了解先进人物所展现和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相互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构筑中国精神的理性选择和现实导向。

三、践行路径：传承杨善洲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激发奋进新时代的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是共产党员的宝贵品质，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与坚守。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传承中国精神的丰富载体。在新时代，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的初心使命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贯彻落实新时代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继续传承好杨善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供丰厚的精神给养，激发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

（一）坚定奋进新时代的政治定力

政治属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明确代表谁、为了谁、要干什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是认同政党的先决条件。因此，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党员干部要始终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涵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权力观，铸牢实现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精神支柱。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信共产主义终将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任何人的意志或一时的曲折而发生改变。提高把握政治方向、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促进政治能力的全面提升。永葆对全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追求，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奋进新时代的向心力和战略定力。

（二）凝聚奋进新时代的思想引力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建党，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处于什么样的阶段、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讲清楚，进而使理论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并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引领新的阶段、新的发展。因此，科学理论的产生遵循了从实践中产生、得到实践的检验、再回到实践中去的历史脉络，完全经得起时代和人民的考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奋进新时代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武装，在新时代必须一以贯之地深入学习贯彻新思想，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

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科学方法论，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并将其转化为指导本部门、本地区正确发展的思路、措施和办法，破解改革发展中出现各种风险、矛盾和问题，用新思想来凝聚共识、统一目标、统一行动、实现历史使命。

（三）提升奋进新时代的学习能力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①进入新时代，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遇到的“陌生领域”越来越多，没有专业本领支撑，不但“牵不住牛鼻子”，甚至会事与愿违、贻误发展。唯有提高学习能力，增强自身本领，才能准确看待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化危为机，善作善成。提高理论学习的能力，把对基础理论的学习转化为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力量，转化为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看待问题有高度、分析问题有条理、解决问题有成效。扩充知识学习的范围，全面学习业务知识、岗位知识、专业知识、素质修养知识，培育自身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提高服务群众、科学发展的本领。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想敢干，用发展、创新、全面的学习方法促使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坚持学思结合和学用结合，推动实践稳步发展。重视调查研究，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学以致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构筑奋进新时代的自我革命魄力

加强党的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勇于自我革命、正视问题，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严字当头，落脚于治，覆盖于全面，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把人民群众反对的、反映强烈的问题予以坚决防范和纠正，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巩固和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重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坚决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杜绝微腐败、严防小蚁穴，坚持自我完善与提高，补短板、强弱项，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切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筑奋进新时代的防火墙。

（五）激发奋进新时代的担当能力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担当。“何其为领导干部？说得直白一点，组织上让我们当领导干部，就是派我们在这里站岗放哨，这叫守土有责。”^②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局，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来推动工作，谋划发展，锤炼敢于担当的品质，激发敢于担当的力量，营造敢于担当的氛围。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紧跟时代步伐、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带头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做到敢想敢干再出发。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3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0656845>，2021年3月4日。

^②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发展问题研究

以四种思维方式把握中国当前发展机遇优势论析

艾丛潞,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 成都 610071)

摘要: 运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认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具有的独特发展机遇优势至关重要。运用辩证思维, 认识这种优势是挑战之下的机遇、变化之中的机遇; 运用历史思维, 认识这种优势是历史积淀而成的集成优势, 是承接未来的优势; 运用比较思维, 认识这种优势是相对于过去显在优势的潜在优势; 运用中介思维, 认识这种优势是未来的、间接的、过程性的优势。由此启发我们, 必须深化科学理论指导重要性的认识, 必须提高做好各项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 必须拓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

关键词: 发展机遇优势; 思维方式;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106-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 新阶段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但总体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①新时代, 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崛起过程中,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有着突出的发展机遇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 发展机遇优势是一种综合集成优势, 是一种历史承接优势, 是一种比较优势, 也是一种过程转换优势。坚持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认识这种独特优势, 能够更好地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中国如何继续举好旗, 走好路, 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进发的根本性问题, 从而开启新征程, 推动新实践。

一、发展机遇优势是一种具有时效性和预见性的综合集成优势

一般说来, 所谓机遇, 就是社会各子系统和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事物发展的新动因, 能加速事物发展的进程。^②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 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相

作者简介: 艾丛潞,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创新与评估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论;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发展。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年, 第74页。

② 许先春: 《论发展机遇》, 《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 第54—58页。

互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科学全面认识机遇优势，把握其时效性和预见性。

发展机遇优势不是一种单一优势，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综合集成优势。发展机遇优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历史地发展来的，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对接生成的。发展机遇优势往往受国家制度、治理体系、文化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等因素综合影响。立足新时代新阶段，把握发展机遇，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发展大局和战略全局的角度做深入思考。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①，就要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从宏观性、整体性视角看问题，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切实把握发展机遇优势。

（一）发展机遇优势具有时效性

新时代新阶段，“科技的发展、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赋予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内涵，也给了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机遇。”^②万物皆有时，时来不可失。机遇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生成的，稍纵即逝。发展机遇优势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优势。

横向上看，当今时代，对个人、集体和国家来说，机遇都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一方面，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为我国形成发展机遇优势提供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环境。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为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市场，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配置来发展自己。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为我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虽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短期挑战，但我国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很快控制了疫情，不仅稳住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盘，而且经济实现了复苏，为我国在新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机遇优势，提高复合思维能力，增强把控时局、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能力。

纵向上看，发展机遇优势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历史地发展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之路，认识把握机遇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充分利用了革命发展的机遇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抓住二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的机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热情度很高、期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强烈，以及苏联“老大哥”大力支持的优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也是充分认识和把握了世界发展和中国革命发展特殊机遇优势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发展机遇优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难关，中国走上了国际大舞台，各方面获得飞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冲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大，但同时也存在着特殊的发展机遇优势，我们要敏锐洞见并聚合发展机遇优势。中国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多方面优势，率先克服了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带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② 陈江生：《科学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学习时报》2019年9月11日，第1版。

动经济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①，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作用更加明显。中国不能满足于这些成绩的取得，还要抢抓机遇，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充分发挥跨境贸易平台的优势和作用，为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贡献，促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将继续聚合发展优势，充分利用优势，坚定推进改革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发展机遇优势具有可预见性

列宁指出，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②。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神算子，但是能够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做出预测。“预见”一词，顾名思义即指对未来事物发展之推断，有着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预见是基于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而对事物发展趋势所做出的推断，是有客观根据的，是能够实现的。非科学的预见则缺乏客观依据，通常带有主观色彩。从预见性看，机遇应与预见相结合，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和把握客观机遇，以充分利用发展机遇引领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杰出代表人物在关键时刻总能深谙科学预见的重要性，审时度势做出科学预判，合理进行战略布局。毛泽东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由人做成的。行动之前就要事先做出计划、订出方针、方法、步骤，这就要求有预见性。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有中国革命的图样。”^③ 修建房屋之前，脑海中要有房屋的样本。这“图样”就是预见，是进行实践的依据。不管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先有个“图样”在心中。当然，“可能性现实性是两样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④。预见这种超前思维活动必须植根现实，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由此就产生科学预见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就是这样有根据地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及内在发展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坚持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形成科学的预见，并不断在实践过程中加以校正，进而推断革命的发展趋势。无论是针对我国革命实际形成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科学认识，还是在抗日时期提出抗战是“持久战”的科学判断并以此反对“速胜论”和“亡国论”，都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客观规律做出科学预见的重要性。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他文化。作为一代伟人，他解决问题的战略思维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超强的预见能力。他曾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⑤。事实上，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罢，都需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剖析形成这种状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⑥。

新时代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抓住机遇促发展，就是这种科学预见能力的体现，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发展规律，善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策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继承发展。新时代新阶段，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复

①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1年1月1日，第1版。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2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7页。

⑤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危中转机的思维意识，充分发挥危中转机的优势，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① 面对新时代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能否科学应对，抓住机遇，关键在于我们提出的思想理论是否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要看我们能否从战略全局上对世界发展和本国发展做出科学预判。我们要对发展大势和变化规律进行科学预判预见，并且自觉将这种预见预判运用于实践中，坚持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的战略眼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要立足新时代新阶段发展大势和任务要求，始终基于对社会历史的回顾，立足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要求，形成对社会未来的超前性预见和预判。要有超前谋事的思维，科学谋局的能力，认真分析和研判各领域出现的变化和关联因素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理性、合理的决策，顺势而为，有所作为。

二、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四种思维方式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但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和发展，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成长上升期，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③ 因此，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下，增强忧患意识，强化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在战略上积极应对机遇和挑战的变化。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有利于我们有效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把握大势，顺应时势，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在变局中开新局。

（一）坚持辩证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挑战性和变化性

辩证思维是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所谓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过程及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即用辩证法的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运用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认识把握发展机遇优势，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全面而非片面、运动而非静止、本质而非现象、普遍而非孤立地看待事物。坚持辩证思维，要求以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关键在于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坚持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看问题，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④。

坚持辩证思维，认识把握发展机遇优势，一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根本性质，把握发展机遇的实质。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在凝结，属于内核，深藏于现象背后，必须借用理性思维予以掌握。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应透过“危”的表象，抓住“机”的本质，洞悉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理论逻辑，努力抓住机遇、塑造发展机遇优势。二是要洞察新时代发展的趋势，而非停留于事物现状。一切事物都处于动态发展中，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切不可陷入形而上学的绝对静止观。国内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7页。

^③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第6页。

^④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年第2期，第9—11页。

外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在历史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增强预见性、主动性,制定应急预案来应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针对新时代新阶段,就是要抓住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的本质要求。三是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聚合更多的发展有利因素和条件。一切事物都是“支流”和“主流”的统一体。在复杂的形势和大势面临,我们不能只看支流,不看主流,更不能主次不分,要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之中,抓住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的机会和条件,聚合更多的发展有利因素条件。立足新时代新阶段发展实际,分析问题应首先注重主流,兼顾解决好支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做的工作也是在发展形势和国际大势面前,把主流和支流统一起来,既抓重点,突出主流,也兼顾一般,统好支流。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但要看到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制度优势越来越显著,发展韧性强劲越来越明显,继续发展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立足新时代新阶段实际,要客观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牢固树立机遇意识,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发展机遇优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二) 坚持历史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历史积淀性和未来承接性

以史为鉴,才能知兴替。坚持历史思维,才能把握大势,看清形势,运用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世界历史进程中,15世纪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深刻变化,无论是利用航海机遇迅速发展的海上强国葡萄牙,智慧性地开创一系列金融和商业模式的西班牙,聚集了大量资本的荷兰,还是紧抓机遇率先进行技术革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和善于抓学习机会重视科技与教育进而实现崛起的日本,都高度重视对历史大势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把握。20世纪初,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深入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发展的变局,顺势而为,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带领苏俄走向世界强国,开创了世界新格局,也凸显了正确认识世界大势和发展机遇优势的重要性。

对中国而言,在历史发展维度上认识发展机遇优势,无论对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至关重要。形势决定任务,认识决定行动。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往往都形势逼人,使命逼人,而关键在于是否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准确把握历史机遇优势。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提供了契机。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抓住了这个机遇,顺势而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历史思维分析革命形势发展,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和形势变化,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针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情况新问题,认识到历史机遇的重要性,果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研究,重视历史思维的运用,并就研究历史、把握历史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①“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②旨在让我们尤其党员干部树立历史思维。

事实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过世界历史潮流,对世界整体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第3版。

^②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1版。

多多少少都得益于准确抓住发展机遇，从而夺得发展先机。党的十八大前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①。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历史思维，即把握事物发展演变全过程的思维，既要求以历史角度分析思考问题，又要求在发展规律中把握前进方向。运用历史思维把握发展机遇优势，既要以往历史经验总结和历史教训进行深刻反思，也要看到在历史不断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新发展机遇和挑战，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坚持以历史思维认识发展优势，就是在总结历史中不断积累经验。

进入新时代新阶段要全面深刻认识新时代新阶段的机遇优势。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仍然甚嚣尘上，我们必须在大的历史格局和视野下认识历史发展进程，要不断提高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不断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历史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的交汇中把有利因素和条件聚合提升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支撑条件和显著优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倡导和促进世界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就要求我们要将世界变局置于历史发展大势之中来观察和认识。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抓住发展机遇优势，在变局中开新局。

（三）坚持比较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显在性和潜在性

所谓比较思维，简言之，就是运用比较方法和比较思维看待事物，对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事物，发现其中异同，揭示事物现象的共性与个性、联系与区别、现象与本质。“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做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国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这样的认识判断，是基于比较视野下的一种客观全面认识。

新中国成立时，持续多年的战争刚结束，中国经济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村地区人口众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以手工业为主，经济极其落后。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既有受苏联影响的因素，也有自身实际需要的客观情况。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如何在历史比较、现实比较之中找到中国的发展路子，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经过横向比较，中国选择加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发展。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中国通过比较分析，扩大了对外交流合作，与周边国家发展互利合作关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有所缓和，美苏争霸和两极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通过历史纵向分析和现实的横向分析，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交往关系。通过比较思维的运用，党中央针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采取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举的方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抓住发展机遇优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及时开放沿海经济特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格局结束，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动，中国也受到不少冲击和压力。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最终成功冲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在比较之中寻找机遇，在比较之中认识

^①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第2版。

和把握机遇，顺势而为。

当前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虽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困难重重，但是，挑战之中也孕育着机遇，变局之中可以开新局，这是与过去长期存在的显在机遇优势相对应的潜在优势的开掘。从历史纵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如今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种判断的深层逻辑就在于，我党始终在正确把握发展机遇的前提下，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在横向比较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经具备逐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能力，已经具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已经具备一定的反对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能力。中国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越是不能退缩，越要通过改革开放解决自身的问题，抓住发展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相较疫情肆虐期间西方国家的状况，我国各方面发展依然有诸多机遇优势。中国坚持自身独特路线，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采取有力防控手段有效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各领域逐渐恢复发展势头。正是在比较思维的视野下，中国看到新挑战下的发展机遇优势，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一最大实际，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从而抓住机遇，奋勇前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这是从比较思维出发，对国际疫情发展新势进行观察比较、深入分析，准确认识历史发展新机遇、开辟发展新道路的体现。形成新发展格局不是应变求变、因势利导的权宜之计，而是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逐步从外向型经济向增强内生动力的发展模式过渡的深远战略抉择，不仅是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更加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使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国方略。

（四）坚持中介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阶段性和中介性

现代人类的认识活动、思维活动从客体性原则向主体性原则转移，从而扩大了认识的中介系统。^①所谓中介，就是从这方过渡到对方的“桥梁”，是客观事物相联系的中间环节。中介思维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中介”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中介概念表示的是从“绝对理念”过渡到对方的桥梁，是彼此联系的中间环节，它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改造了中介概念，主要是“通过中介连接对立”，并上升为认识事物之间关系和存在方式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②

一方面，中介思维是一种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过渡或转化，因此，要看到机遇优势是一种过程性变化的优势。把握中介思维的内涵，有助于促进辩证思维的形成与发展，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运用中介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就是要看到这种优势既是现成的、直接的、显在的优势，也是未来的、间接的、潜在的优势，需要转化与承接。另一方面，中介思维是一种关系思维，运用它认识发展机遇优势就是要看到这种优势是一种关系范畴下的优势。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并通过中介相关联为统一整体的。认识发展机遇优势，就是要看到这种优势本质上是多种有利因素的集成，而各种因素的内在变化会影响优势的消减。因此，要抓住这种优势形成的有利时机和条件，促成优势的积极维持，推动不利方面向有利方面转换。

① 张耀灿、邵献平：《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思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0期，第48页。

② 平章起：《中介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71页。

从根本上说，发展机遇优势是一种阶段性的理论思维，即事物如何通过中间环节或以此为媒介达到融合。树立中介思维，能够在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既看到新变化带来的新矛盾，又发现存在于挑战和机遇之间的合理张力。中介思维是一种辩证思维，这一思维方式有利于策略方针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克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运用中介思维考虑问题，关键在于看到从一个事物发展、转化为另一个事物存在着一个过渡期。要把重点放在寻找两者之间的连接点，通过这一点，向两边延伸。运用中介思维看当今的世界格局，虽然新时代新阶段起始可能是我国各类风险矛盾集中爆发期，各种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但只要持续增强机遇意识，坚持长远战略眼光，打好主动仗，不断发挥优势，克服困难，积累成果，消减负面因素，必将逐渐形成显著优势和有利局面，迎来可持续的发展，确保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向前推进。坚持中介思维，必须反对那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不能对现有的本身比较单薄的某些条件和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的使用，要挖掘潜力，坚持综合集成发展。同时，要在发展中看到各种利弊因素的转换，看到新的发展变化趋势，实现远期与近期、整体与局部的对接和整合，尽力发挥各种条件优势，促成优势转化，顺势而为。

三、运用多种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重要启示

发展机遇优势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综合集成优势。要明确目标任务和根本要求，切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做好各方面工作，开创新时代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错综复杂，我们必须提高思维能力，深刻理解把握发展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一）必须深化对新时代新阶段科学理论指导重要性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 应对新时代新阶段的各种风险挑战，抢抓机遇，顺势而为，就要牢固树立科学思维，加强科学理论指导。一是宏观上，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格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国内外严峻形势，要想在实践中取得突破性发展，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明确它是政党的精神旗帜，若背离或放弃，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方法，科学分析当前阶段发展机遇。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制度优势聚合发展机遇优势。作为我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是全国各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继而也是新阶段带领人们运用多种思维，认识发展机遇优势的核心领导力量。因此，要强化“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② 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党领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维能力、预测能力、决策能力，从而能够更好把握发展机遇优势，承担好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历史任务。三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必须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把握利用机遇优势的一项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9页。

^② 江泽民：《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福建理论学习》2000年第4期，第496页。

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实现了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跃升，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根本上讲，这来源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大限度地认识和利用好各种机遇优势。新时代把握发展机遇优势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迈进。四是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把握利用好机遇优势必须要创新理论和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强有力的理论创新武器。能够认识机遇优势，抢抓机遇优势，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使这种优势转化为效能和成绩，体现我国发展的独特优势。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但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意识层面树立起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中介思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发挥优势，实现“危”中见“机”，化危为机，于变局之中开新局。

（二）提高预见性、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

历史的鼓音总是在时代转折的关键处播响。习近平总书记以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明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核心要义。辩证把握“危”与“机”，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于变局中开新局”就是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顺势而为、赢得主动，既要善于顺势而为，会开顺风船，又要勇于逆势而上，会开顶风船；在危机中育先机就是要善于化危为机，以系统观念推进发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①

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突破思维方式，对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发展机遇优势加以科学把握，需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全面贯彻“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立足国情、着眼发展看发展机遇优势。立足最大实际，坚持用发展解决我国现实问题，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发展机遇优势必须成为实实在在、摸得着、看得见、能见效的优势。二是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树立忧患意识，强化中介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比较思维，加强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世界发展大势的研判，从全局上予以应对，及时调整战略策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利用好有利的历史机遇。三是要落脚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上，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落实创新。面对国际竞争激烈的局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② 必须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强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加快走出一条创新发展新路径，加快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是切实利用发展机遇优势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之一，是最大化认识利用优势的一项根本要求。

（三）拓展时代和国际视野

树立科学的思维意识，有利于开拓视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① 何星亮：《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伟大复兴》，《人民论坛》2021 年第 7 期，第 16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1 页。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这一发展格局是结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的，对抓住发展机遇优势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敏锐抓住机遇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逐步改善了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近年来，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剧，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促进良性循环显得至关重要。树立辩证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抓住国内外环境发展的机遇，在“危”中见“机”。树立历史思维方式，有利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导我们对发展机遇优势形成更深入的把握，进行新的探索，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用好发展机遇优势，就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引行动，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入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投资引领的示范作用，促进各方协调联动，培育如“地摊经济”等各色消费新业态模式，改善消费结构，挖掘消费潜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举措，突出了“双循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和内生发展的重要性，借以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公共服务短板，应该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兜底职能，优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资源配置，达到资源共享。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升级消费。二是要促进供需有效衔接，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中高端供给，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需求。补足先进制造领域短板，兼顾生产效率和安全，注重在关键领域、核心环节发力，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突破产业技术瓶颈，提高供应链的可控性、安全性。三是要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开放，推进“五大计划”专项行动，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发挥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发展经济。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以稳健的内部调整来应对外部变化传递的冲击，站在时代视野角度，充分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是长期战略，是国际国内双循环，不是国内经济单循环。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页。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论析

钟启超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图书馆, 云南 昆明 650111)

摘要: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建设不再是以藏为主, 开放获取已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的有效途径。但现实中,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影响了图书馆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 加强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与科学管理是未来图书馆发展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 文献资源; 开放获取; 馆藏资源

中图分类号: G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1-0116-06

当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出现了许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何使不同层次的读者群能通过图书馆迅速而便捷地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是图书馆适应当今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重大课题。为探索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相关规律, 找出有关服务中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笔者对党校图书馆进行了文献资源利用与服务评价的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笔者对如何开放利用和科学管理图书馆文献资源提出若干建议。

一、调查情况分析

此次抽样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 50 份, 收回 50 份。调查采样对象为在校教师, 样本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26—45 岁之间, 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其中硕士 8 人, 博士 2 人。上述年龄段的教师常常处于事业上升阶段, 对知识的需求量较大, 是对图书馆服务需求较大的读者群,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 调查情况梳理

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主要提炼获取到如下信息。

1. 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类型的需求。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读者对图书、期刊、电子资源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 其中以对电子资源的需求为最多。在回答“你对哪种图书馆资源需求最大, 是否经常使用该种资源”的问题时, 选择对电子资源需求最大者占比达 50%, 其中, 经常使用电子资源者占比为 41.6%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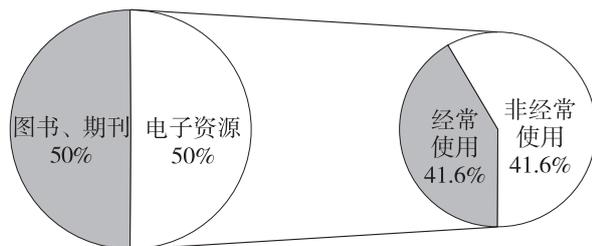


图 1 图书馆资源类型需求复合图

作者简介: 钟启超,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行政学院) 图书馆综合管理部主任、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档案学。

2. 对图书馆资源需求的满足程度。问卷显示,对图书馆资源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占20%,基本能够得到满足的占62%,不能得到满足的占比为18% (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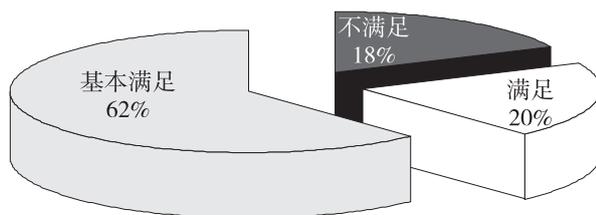


图2 图书馆资源需求满足程度

3. 图书馆资源不能满足的读者需求。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图书馆资源不能满足的读者需求,主要集中在教学、科研及拓宽知识面等方面。其中,认为科研及拓宽知识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读者占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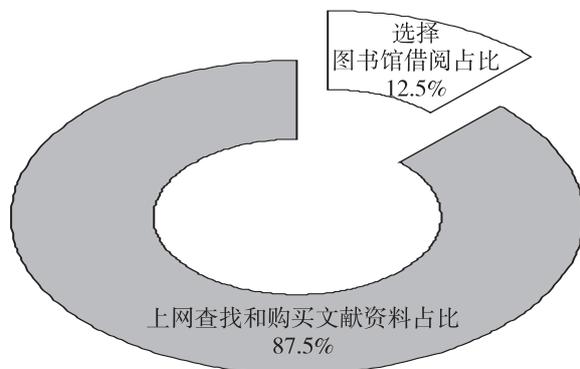


图3 获取学术资源途径示意图

4. 教师获取学术资源的途径。问卷关于获取学术资源途径的调查显示,87.5%的人选择上网查找和购买文献资料,其中,选择“上网查找”者居多;只有12.5%的人选择到图书馆借阅 (见图3)。

5. 教师利用图书馆的目的。问卷调查显示,在选择“利用图书馆的目的”问题答案时,58.4%的人选择的是“科学研究”,41.6%的人选择的是“撰写论文” (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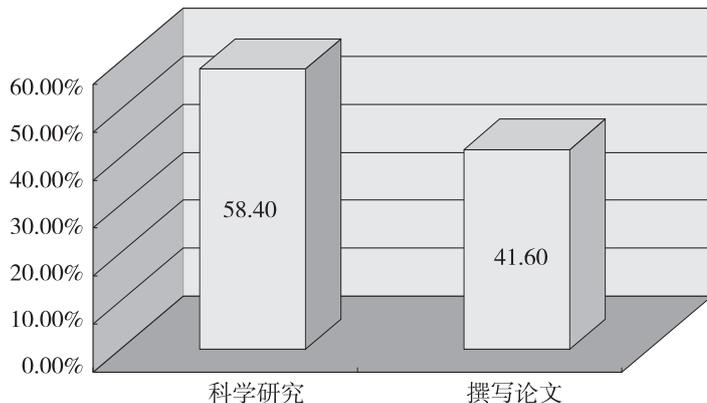


图4 图书馆利用目的分布

(二) 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当前读者对图书馆藏书的利用率并不高,多数人更愿意选择利用互联网方便快捷地查找所需资料。选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人群主要是出于科研及拓宽知识面的需要。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延伸阅读发展。即阅读不止于阅读,对文献资料的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流讨论是阅读的延伸。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阅读交流和讨论渠道。而交流和讨论的内容、用户的活跃度,又反过来成为数字阅读平台吸引用户的重要竞争力因素。

二是出版企业服务转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一些出版企业不满足于传统的图书出版业务,希望将业务延伸到更广泛的新媒体领域。这些出版社活跃于各社交平台进行内容发布,并通过与作者、文化名人合作积极开发衍生文化产品,合作制作视频和音频节目,从而打造更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和内容服务。他们还与其他领域的优质企业合作,实现优质作者和创作内容的孵化,以及文化IP的精细化运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三是阅读有声化发展。近年来,以微信读书和掌阅等为代表的数字阅读APP,加入了听书功能和音频板块。有声书和音频导读可以减少读者视觉疲劳,帮助其灵活运用碎片化时间,实现阅

读活动与其他场景兼容。由此,听书成为看书的重要补充,并为更多人所接受。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多元化的文献资源类型给读者带来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建设目标、内容及评价文献资源建设的标准都必须进行深刻变革。

二、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制约因素分析

毋庸置疑,在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正受到若干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资金不足是制约文献资源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出版新版新书24.7万种,重印书27.2万种,共计出版图书51.9万种,数字阅读市场规模达到254.5亿元。以笔者所在图书馆为例,近20年来,图书馆的纸质书购书经费一直维持在15万元左右。而近20年间,随着物价的上涨,图书价格也在不断上涨。20世纪90年代末期,15万元可以买到图书10000册左右,而现在只能买到图书3500册左右。2018年,笔者所在的图书馆购买的图书是2687册,仅占当年全国出版物总量的0.53%。从数字资源购买的情况来看,近10年来每年数字资源的购买支出基本维持在60万元左右,能够买到8—10种电子(数据库)资源。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及文化消费升级,图书行业经历了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图书种类、印刷册数、销售码洋不断增长。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等社会因素的变化,带来了国民阅读需求的分化,图书行业逐渐形成若干特点显著的细分市场。面对这种市场变化,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配置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

(二) 图书馆之间缺少文献资源的共享

文献资源的共享一直是图书馆界热烈探讨的问题。文献资源的共享在内容上通常表现为协调藏书布局、编制联合目录、开展馆际互借、联机检索,等等。在途径上往往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方式把各个地区、各个系统的图书馆连成一个相互连通,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协作的共享网络体系。从理论的角度看,相关的论述已经很多,也比较成熟。但从实践方面看,推行的难度比较大。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图书馆是分系统进行管理的。如文化部主管公共图书馆,教育部主管高校图书馆,还有科学院、党校以及军队等系统的图书馆,其上级主管部门都不同,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自身的馆藏体系等也不尽相同。各系统的图书馆工作往往会侧重于自身所服务的读者群,很少有不同系统的图书馆之间的沟通交流。这就造成文献资源难以在系统与系统之间形成共享。即使是系统内的资源共享(例如文化部在公共图书馆系统内推行的文化共享工程),基本上也是在政府规划下进行的,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整体规划目标和下达指令,具有强制性,不能根据各个图书馆实际开展资源建设,常造成重复采购,资源浪费等情况。由于各系统的图书馆间缺乏共享,一些高校图书馆为了丰富本馆资源,保障本校学生的学习,不得不增加独立采购产品的类目,由此又出现所购资源重复的情况。

另外,从文献资源供应商的角度看,为了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并不希望图书馆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一个图书馆采购的资源,尤其是电子资源,通常不能分享给其他图书馆使用。供应商总是以版权保护和使用范围规定等为由,要求图书馆只能将所购资源提供给本馆读者使用。其他图书馆,即使是与其归属于同一系统,要使用相同的资源,也必须自己购买。由此,进一步造成了相同资源在不同图书馆的重复采购。

（三）文献资源缺乏科学管理

当前，大多数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都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和开放式服务。而且，经过多年的积累，不少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家底深厚”。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藏书多年未能利用，一直处于“藏书”状态。在如何进行图书科学管理与开放利用方面，亟需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一些图书馆经过多次倒库或搬迁，图书摆放混乱、错架情况比较普遍，这给图书查找及利用带来很大的不便。此外，每个图书馆的馆藏都有一些相对特色资源，对特色资源的整理开发也是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工作做得好的图书馆并不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没有很好推动图书管理方式从“藏”向“用”转变。图书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书籍管理方式从“藏”转变为“用”上下足功夫，推动图书馆实现功能转变。当前图书馆的大开放空间只是解决了让读者看到图书馆有很多书的问题，但面对几十万、上百万的藏书，读者要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并不容易，使得有很多书本应有适合的读者，却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不畅通而无法实现书与人的对应。

二是在开发本馆资源的过程中，既呈现出图书管理人员文献工作能力不足，又存在经费支持不足的情况。例如，要建设一个特色资源库，从选取资料、素材，到框架、栏目设计、数据录入、扫描以及平台搭建，都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即使是简单的特色资源或专题文献展示，也需要围绕相关主题对馆藏书籍进行甄别、遴选、排序、上架。要抽取某本书中的内容进行专题编辑，更需要馆员具备专业资料的识别评价和甄选编辑能力。在人员管理激励方面，要促使图书管理人员做好文献资源的管理工作，必须引入绩效管理机制，鼓励馆员积极投入主动服务中。

三、开放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途径

（一）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提高文献采购质量

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笔者所在的图书馆为例，由于相关经费投入与购置文献所需的资金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导致当前的文献资源建设水平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图书馆需要加大相关经费的投入力度，建立数字资源和纸质资源并重的文献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加强重点学科的文献资源信息需求分析，加大对重点学科文献购置经费的支撑力度。

文献资源建设的质量，直接反映图书馆的地位和价值，也影响着服务读者工作的有效开展。图书馆应加强与出版单位、馆配商的联系，多方收集出版信息。从馆（图书馆）、商（馆配商）、社（出版社）三方跨界合作入手，建设馆配资源交互平台，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加强图书馆资源建设，提升馆藏质量的有效途径。此外，在采选某些专业文献时，可咨询研究馆员和专家，还可向读者开展问卷调查，对读者反馈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及时调整采购方向。

（二）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图书馆资源共享，是解决信息剧增与馆藏不足的矛盾，缓解图书馆经费短缺的问题，避免文献资源重复建设的重要举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提供了技术条件。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使图书馆的资源基础从文献资源向电子资源、网络资源转化，扩展了信息服务的空间。

当前，一些机构致力于图书馆资源共享，正在不断探索。“开放获取”成为非赢利性文献资源供给的关键词，这是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这个活动旨在打破学术交流中的人为壁垒，让使用者可以免费获取文献而不需要考虑版权和授权的限制。如全国图书馆

参考咨询联盟。该平台拥有 230 万种以上电子图书, 4000 万篇以上中文期刊论文, 2600 万篇以上外文期刊论文以及大量的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数字化资源。加入该联盟即可免费使用其所有资源, 条件是加入者必须把自己的资源与其他联盟成员共享。又如 CALIS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 收录了全国 100 所高校图书馆馆藏联合目录、61 所高校的学位论文, 成员馆可免费使用。查询结果可以显示文献资源基本信息和国内收藏地, 本馆没有的资源可以进行文献传递。当然, 也还有无条件免费使用的数据库, 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提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全文数据库》, 得到了广大机构及个人用户的一致好评。对于中小型图书馆而言, 要想获取更多资源提升读者服务, 加强图书馆间的合作, 积极参与到开放获取的活动中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三) 探索文献管理方式, 深度开发馆藏资源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 应充分利用现代方式和手段科学管理文献资源。对于纸质文献而言, 首先, 合理的馆藏划分与布局是提高图书馆藏书利用率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引入人性化的导读与借阅提示, 能使读者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献。要尽可能使每本书都有其读者, 每个读者都有其需要的书, 既提高读者到馆查找文献的成功率, 又提高所采购文献对学术研究的针对性和贡献度。其次, 应对馆藏文献进行甄别, 挑选本馆的特色、优势文献进行集中展示和二次开发, 把文献中的精华内容抽取出来, 以文摘、综述、专题或文库形式进行汇编, 以电子版形式推送给读者。也可以根据读者需求, 对馆藏文献进行定题查找、整理, 然后推送给读者。

电子文献应在现有的检索条件下进行整合, 实现统一平台检索, 使读者在一个界面下即可完成查询需求。可以对电子文献进行开发, 以学科为基础, 集中检索该学科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并推送给读者。还应适时举行各种阅读及培训活动, 向读者宣传、推广本馆文献资源, 不断提高文献资源的使用效益。

综上所述, 图书馆是通过控制自身馆藏目标和特定服务群体的互动而达到文献服务效果的。因此, 重视文献资源建设是“源”, 利用各种信息服务手段用好馆藏资源是“本”。在开放获取的环境下, 文献资源建设打破了空间的概念, 使文献传递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实体, 中小型图书馆应抓住图书馆联盟资源共享的机遇, 不断充实本馆资源, 保证“源头”, 在资源开发利用上下功夫。

责任编辑: 杨松禄

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与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省级统战团体恳谈会召开

1月22日，为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中共云南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恳谈会，就充分发挥社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职能，推动云南社院更好服务云南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省级统战团体的意见建议。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徐彬，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涛出席恳谈会并讲话，恳谈会由徐彬主持。



恳谈会上，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蔡勇介绍了中共云南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出台的背景、文件起草过程及特色亮点。省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通报了学院2020年教育培训工作完成情况及2021年工作安排。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省级统战团体的负责人李兴华、马夏林、白良、郭光萍、王洪涛、解丽平、李志强、王志荣、潘庆明、王曦宁、王文华先后发言。大家对《实施细则》的出台表示祝贺，对云南社院2020年的工作完成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实施细则》，围绕云南社院2021年工作安排，从班次安排、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统战智库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涛肯定了云南社院2020年的工作，对云南社院贯彻落实好《实施细则》，做好2021年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实施细则》出台的重大意义，深入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二是坚持“社院姓社”，深化共识教育，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三是推进联合办学、开放办学，努力开创新时代我省社院事业发展新局面。

徐彬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一一做出回应，要求省社院认真研究吸收，使之成为办学的实践、工作的动力和发展的基础。他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省级有关统战团体继续关心支持社院发展，真正把“联合党校联合办”落到实处。

徐彬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省社院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中共云南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作为首要任务，把学习作为永恒主题，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等方面出实招、见实效，通过自己学，带动学员学，发挥好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要坚持联合办学、开放办学，加强纵向沟通、横向联合，汇聚优质资源，形成办学合力，将“联合党校联合办”做深做实。要按照“五个是”的职能定位，始终坚持“社院姓社”，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办学能力和服务水平，科学编制好“2021—2025年发展规划”，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供稿：杨松祿 责编：朱家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1年3月第1期(总第89期)第23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1年3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Mar. 2021 No.1 (Sum.89) Vol.23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March 20, 2021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10

定价: 9.00元